

中共党史资料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追忆“一二·一”运动
军事学院八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央档案馆

62
总第六十二辑

1997年6月出版

D239
6-50

98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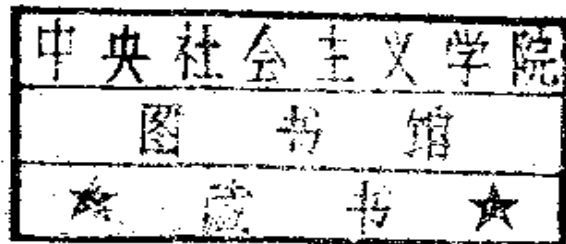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资料

第六十二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央档案馆 编



200041365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主 编：韩泰华
副主编：杨公之
陈 夕
本期责编：傅 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62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北京:中共
党史出版社,1997.5

ISBN 7-80136-083-4

I. 中… I. 中… III. 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 N.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06306号

中共党史资料(62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 央 档 案 馆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1929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35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地质印刷厂

850×1168毫米 32开 7印张 160千字

1997年5月北京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3000册

ISBN 7-80136-083-4/K·73

定 价:6.00元

DH94/27

目 录

***** 特 约 专 稿 *****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熊向晖(1)

***** 回 忆 录 *****

抗战胜利时我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 谭天度(55)

追忆“一二·一”运动 郑伯克(70)

军事学院八年..... 萧 克(102)

***** 专 题 资 料 *****

南昌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部分参加者

 脱险行踪考..... 王玉强(125)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 田浩存(139)

毛泽东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王 骏(144)

人物介绍

-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160)
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 郭洪涛(163)

译文选登

- 1941年日本对苏联的立场 …… 姜 杰 左凤荣译(169)

研究动态

-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 张会才 韩凤琴(186)

- 新书选介…………… (200)

封面照片：谭天度同志近照

封底照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真相

熊 向 晖

《中共党史资料》第 57 辑刊载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始末》一文，像描述此事的其他作品一样，讹误颇多。但该文首次指出，“我方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熊向晖作为周总理的代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代表高氏同赴香港处理此案，这倒合乎事实。此案发生在 42 年之前，众说纷纭。在香港即将回归祖国之际，作为知情者，特为文披露真相，并藉此缅怀遇难的烈士，鞭鞑谋杀的元凶，揭露港英对蒋特的包庇纵容，特别是宣传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这一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外交斗争、情报斗争中所展示的崇高风范。

中国代表团准备参加亚非会议

1955 年 4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是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和巴基斯坦发起召开的。五国总理在联合公报中阐明亚非会议的目的是：一、促进亚非各国间的亲善和合作与共同的利益；二、讨论与会各国社会、经济与文化问题和关系；三、讨论对亚非国家具有特别利害关系的问题，诸如民族主

权、种族主义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四、讨论亚非国家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它们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所能作出的贡献。

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总理，代表5个发起国政府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参加。2月10日，周总理复电印尼总理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意亚非会议的目的，而且对于能够有机会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为这些目的而努力，也感到荣幸”，“决定应邀派遣代表团出席”。

出席亚非会议的共29国。在与会国家中，同我国建交的只有6国（阿富汗、缅甸、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越南民主共和国），其余23国大都同蒋帮保持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害怕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会前极力挑起一些与会国家对我国的疑惧，散布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的谎言。蒋介石叫嚷现在是“我们外交最危险的时期”，加强在沿海和大陆对我的军事侵扰。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关于台湾地区局势的声明，把矛头指向我国，胡说“对世界安全和稳定的眼前威胁集中在亚洲”，煽动亚非会议“谴责以武力实现国家野心”的共产党政权。《印度尼西亚新闻报》早在2月中旬就发表一连串消息，揭露在印尼的蒋帮特务分子正忙于同受到美国援助的印尼武装匪徒取得联系，将对中国代表团采取恐怖行动。印尼报纸还着重披露了蒋帮在印尼的秘密组织“铁血团”的活动。

为了保密，延至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新华社才宣布：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

议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为王倬如。

经慎重考虑，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准备从香港包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印航）C-69 型星座式客机飞往印尼。原因是：一、当时我国没有远程飞机，而印航的星座式客机能连续不着陆飞行 8 小时跨越南中国海。在同我国建交的亚洲国家中，只有印度有这种远程飞机。中印两国政府最先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周总理乘印航飞机出席亚非会议，具有政治意义。而香港机场设备优于内地，适于大型飞机起落。二、1954 年 6 月中旬，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停战问题的磋商进入技术阶段，由副手（我国为李克农）参加讨论，苏、美、英、法的首席代表暂时回国。周总理藉此机会率随行人员访问印度、缅甸，乘坐的就是印航星座式飞机“孟加拉公主号”。访问结束后，周总理一行续乘该机飞抵香港，停留 1 小时，飞往广州。三、印航星座式客机有往来于孟买至香港的定期航班，中间在加尔各答、曼谷起落。我有关单位与印航商妥，在亚非会议前，由我方按印航正常航期，指定从孟买起飞的某一航班，对外照常营业，在加尔各答和曼谷照常上下客货，到香港后临时改为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在港清舱加油等只需一小时左右即可起飞。由中方适时通知香港当局采取安全措施。

蒋介石批准进行的政治谋杀

3月中旬,我情报部门侦悉,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所属“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策划在香港、印尼暗害周总理。毛人凤即命香港情报站(以下简称港站)负责在香港执行。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立即指示所属尽快探明蒋特的具体计划。

4月初,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总理率中国代表团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仰光,与应邀届时去仰光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周总理让我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但下列8人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万隆。他们是:记者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沈建图、杜宏、李平、郝风格;外交部新闻司干部李肇基;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钟步云;外贸部干部石志昂。另有3名外国人亦需先到万隆:奥地利记者严斐德,波兰记者斯塔列茨,越南民主共和国官员王明芳。为此,我有关单位通知印航,4月10日自孟买起飞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照常营业,4月11日到香港后即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迳飞印尼(此外,外交部亚洲司的干部钱嘉栋、林兆南及英文翻译冀朝铸已在4月初从香港乘船去印尼)。

4月7日,刚作完阑尾手术尚未完全康复的周总理乘中国民航伊尔—14飞机离开北京,途经重庆,于8日

抵达昆明。离京前，周总理指示李克农和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香港蒋特动态，及时向他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及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的《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1991年8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载有史实写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事件》一文，现先抄录该文的两段：

（1955年）“4月9日晚，外交部办公厅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欲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并备有定时炸弹。与此同时，昆明长途电话传达周总理的紧急指示：要外交部将此情况火速转告香港新华分社和我国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香港当局提出交涉，并请香港当局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在北京向英代办进行交涉。”

“办公厅主任董越千当晚将周总理的上述指示转告了香港新华分社和我代表团。次日一上班，又向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作了汇报。张闻天副部长随即指示欧非司副司长张越向英国驻华代办处进行交涉。”

4月11日下午，周总理在昆明收到急电：蒋特香港情报站报保密局称，周恩来已不过港，但对其代表团随员的打击，也会影响其在亚非会议上的实力，乃令检理飞机人员按原计划进行，惟因时间仓促，未及将定时炸弹置入油箱，乃绑于油箱底，预计下午4时可望爆炸。

不久，路透社新加坡电称：印度国际航空公司C—69型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位乘客，包括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

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事件发生后，周总理非常愤怒和悲痛，让王倬如打电话问董越千，接到4月9日晚的紧急指示后是如何处理的。董答，他当夜即将总理指示打电话通知香港黄作梅，让黄即告香港当局，保证安全，黄即让分社干部潘德声通知印航驻港办事处。10日上午8时，他报告了张闻天副部长。因英国代办杜维廉去上海未回，10日上午9时半，张越副司长约见英国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以上述内容。

章汉夫、乔冠华向总理建议，请张闻天副部长主持拟定外交部的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查究，将参与此事的蒋特逮捕。总理表示同意，但要张越再问艾惕思，在他4月10日得到张越通知后，香港当局采取了什么措施。总理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及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所采取措施的答复。在照会中，要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4月12日下午，新华社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声明说：

“参加亚洲非洲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工作人员、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外记者共11人，乘坐由我国代表团包用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一架，于北京时间4月11日12时一刻自香港起飞，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该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西北的海面时，爆炸起

火，机身坠入海中，机上全部人员下落不明。

“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早在这批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启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机关正积极布置对我国代表团将要包乘的印度飞机进行破坏，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4月10日9时半特将这一情况通知了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要求英国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注意，并采取措施以保障上述代表团人员和新闻记者的安全。英国代办处的官员问明了这些人员准备乘坐的客机的所属航空公司后，答应用电报通知香港英国当局。尽管如此，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仍然得逞。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害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

但因声明中没有说清张越4月10日通知艾惕思的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的答复，周总理要王倬如即让董越千查告原记录。不久，董越千复电：

一、4月10日张越同艾惕思谈话记录——这里引用上述史实所写《“克什尔尔公主号”空难事件》的一段：

“欧非司副司长张越于10日上午9时半紧急约见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告知中国记者等一行11人明日(11日)上午由香港乘飞机去万隆采访亚非会议，我们

获悉国民党特务将从中进行阻挠和捣乱，故请其转告香港当局注意，并务必对他们的安全予以照顾。艾惕思询问过我代表团有关情况后即表示，他将尽快将这一情况电告香港。还对张越副司长说，以后再有情况，请及时通告，他可随时电告香港。”

二、4月12日外交部声明发表前，艾惕思交给张越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一接到杜维廉的电报，香港总督即安排警察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飞机在香港降落后，警察一直在看守它，没有见到任何未经核准的人进入或接近该机，没有任何企图制造困难的迹象。

后来王倬如告诉我，当时总理非常难过，他说了两点，一是没有及时查询张越同艾惕思的谈话记录；二是没有事先了解外交部声明的内容。

1985年4月24日，为纪念亚非会议召开30周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并影印了“周恩来同志参加万隆会议前夕写给邓颖超的一封信”，并附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者按”和“邓颖超附记”。这封信全文如下：

超：

你的来信收阅。感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面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再见。

周恩来

一九五五.四.一二

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飞机失事幸存者卡尼克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一书。这本书写于1958年，卡尼克在书中讲到，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到达香港，他负责检修飞机时，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的一位办事员跑来对他说：“卡尼克，要注意周围的陌生人。你知道中国政府代表团要乘这架飞机，可能有坏人要破坏。”当时卡尼克并未在意。当飞机在空中发生爆炸时，卡尼克才突然想起在香港那位印度航空公司的代表对他作的警告。“一定是什么人在飞机上放了一枚致命的定时炸弹，现在爆炸了。”

不言而喻，香港当局事先必然已得到黄作梅的通知，印航驻香港办事处事先也已得到潘德声的有关通知。

案发后有关各方的态度

一、4月12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飞机失事事件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哀悼。”他说：“这次灾祸有某些十分异乎寻常的特点。在飞机坠入海中之前十分钟，我们还接到了飞机上发来的正常电报。过后不久一定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对于这一切必须进行充分的调查。”

4月1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责我外交部声明“荒谬”，“没有丝毫根据”，“有一种强烈的宣传动机”。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说，“如果这一事件涉及破坏行动的话，那大抵是来自共产党中国内部，可能是来自中共党内的分裂分子。”《纽约先驱论坛报》诬称，“中共为了在亚非会

议上引起亚非国家反对美国和英国的情绪而破坏这架飞机并不是不可能的。”

台湾蒋帮官员说，飞机“绝非被人破坏”，“此种推测，荒谬无稽，不值一驳”。“中共的‘破坏’叫声未免太迅速，几乎在飞机还未落海前就大呼‘破坏’。”又诬称，“飞机是中共破坏的，旨在鼓动反美并为‘解放香港’打下基础。”

美联社4月13日东京电称，一位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自孟买到香港的意大利商人皮诺拉抵东京后说，该机在孟买准备起飞时，机长和地勤人员激烈争论后，“宣布这架飞机发生机械故障，不宜飞行”，为了进行修理，延误4个半小时。“这架飞机从香港起飞后，可能毛病又发生了。”印航负责人对此严加驳斥，他说“这架飞机在离开孟买时，一切完好无损。截至失事时止，航行没有故障，没有掌握真实就发表据说是一位旅客的谈话，是极不妥当的。”

二、在接到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发出的紧急求救的信号后，印尼派出两架飞机进行搜寻，新加坡英国当局亦派出多架飞机及快速护航舰“丹皮尔号”进行搜寻。4月12日晨，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机身坠入离海岸一公里的水中。有3位机上人员在一个小岛上被“丹皮尔号”救出，他们是：副驾驶员狄克西特，领航员帕塔克，地勤机械师卡尼克。“丹皮尔号”还找到3具尸体，一具是飞行机械师顿哈的，一具是飞行事务员皮门塔的，另一具则无法辨认。

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国际民航法规，由印尼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调查委员会主席是印尼民用航空局空运处处长伊马汪。印尼和英国船只打捞飞机残骸。

三、4月13日晨6时，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召见英国代办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杜维廉对照会中所说“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出抗议，声称尚未确定飞机失事的原因，应该等待调查的结果。他还说，4月10日张越通知艾惕思时只讲到可能会有人捣乱，而未说有人企图进行破坏，但香港当局仍然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他要求中方提供所掌握的详细证据。

张闻天指出：英方的抗议我们不能接受，我们的指责是有充分理由的。香港当局知道机场上有美蒋特务在活动，从那里可以找到足够的证据。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同日上午，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时说，香港机场地勤人员中就有美蒋特务，非常可能在机内放了定时炸弹。

4月13日下午，艾惕思将香港总督在当天下午1时15分对报界发表的声明函送张越，声明说：“香港政府于上周末接到英国代办处的一封电报说，中国外交部曾经得到情报说，中国国民党同情分子可能对搭乘印度航空公司即将离开香港飞赴万隆会议的一批记者进行捣乱，请香港政府采取适当的预防办法。”

声明说：“在4月11日即星期一上午，新华社有一位代表打电话通知高级警官说，11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即将于该日下午搭乘一架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启程离开香港。”“该新华社代表当日及此后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政府“仍按照北京代办处的电报采取了行动”。

声明的第二段欲盖弥彰。第一，如上所述，董越千在4月9日夜应即将周总理的紧急指示打电话通知黄作梅，香港“新华社的代表”绝不会在4月11日上午才通知港方。第二，如果“一点也没有提到怀疑有人捣乱”，香港“新华社的代表”为何要打电话给“高级警官”？第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是11人。香港新华社作为接待单位，知道他们的国籍和职务。怎么会通知“高级警官”说“11名记者及一名越盟代表”要乘印航飞机离开香港？怎么会把11人说成12人？

四、4月17日，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在孟买发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坠毁事件的声明。声明说，据3位生还的乘务人员提出的报告，使飞机失事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本身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原因造成的。”

“截至爆炸和起火时止，飞机在各方面都飞行得很正常，”声明说，“这次悲剧的确切原因必须由正式调查委员会在详细检查飞机残骸后肯定。”

五、4月17日，英国代办处送给我外交部一份“备忘录”，作为我外交部4月13日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的答复。

备忘录说,英国政府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故不接受任何责任,对于中国政府没有给予时间去进行任何调查之前即对英国当局提出控诉一点,提出强烈的抗议。

备忘录说,4月10日中国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副司长通知英国参赞,国民党分子可能要对一批中国记者于次日离港前赴万隆会议时进行捣乱,请求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通知并未在任何方面予以详述,也不含有破坏的意思。英国参赞询问此批人员的数目、居留地点、有关航空公司的名称和出发路线,当时这位副司长不能对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予以答复,而是在此后以电话通知的。

备忘录说,在4月11日11时20分左右,新华社代表一人以电话通知香港警察署特种事务处长称,11名新闻记者及越南代表一人将于同日午后不久乘印航飞机离港,但并未提到有任何扰乱可疑之处。香港当局鉴于来自北京方面的讯息,在飞机于12时15分到达香港后,随即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以保证该批人员在机场上不受骚扰。当该飞机在香港时,一名警官指挥警察守卫,未经许可之人不准接近或登上该机。飞机约于13时26分(香港时间)起飞,并无事故。因此,在全部调查完成之前断言失事原因实属过早,香港警察方面在香港正在进行调查中。如使此项调查能够确定真实失事原因,“有关方面势须供给其所能获得有关此项失事情况之全部材料。英国政府兹料中国政府将准备如此合作”。

六、4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蒋元椿的《英国当局一定要负起责任》一文,对英国政府在17日向我国外

交部提出的备忘录作了批驳。蒋文指出：英国政府拒绝承担对这次不幸事件应负的严重责任，要求我国方面事先对特务将要施行破坏的情形予以详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而这正是香港当局有责任加以多方面研究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的问题。

蒋文说，英国备忘录表明，香港当局在10日得到我国政府警告以后，在足足24小时以上的时间内，并未采取预防措施，直至11日中午12点左右，在印度飞机到达香港之前不久，香港警察当局才采取所谓“进一步的预防措施”，而其目的也仅仅是“保证该批人员不致在机场受到骚扰”，对飞机也只是作了一般的警戒，并没有像备忘录所说的“采取了一切措施来保证乘客和飞机之安全”。

文章说，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证实飞机的爆炸和起火“是由于同飞机的构造完全无关的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外来的原因”只能是当飞机停留在香港的时候发生，而这个“外来的原因”只能是美蒋特务在飞机从香港起飞以前在飞机的什么地方安置的爆炸物。

该文说，我国政府在事先向英国驻北京代办处提出的警告和事后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英国备忘录硬说我国政府断定失事原因“过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我国政府有一切根据作这样的判断，并且有必要及时向全世界揭露美蒋特务分子的这一罪行。

4月24日，《人民日报》以《香港英国当局迄今没有进行认真查究》为题，刊载新华社22日讯：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19日说，英国将在香港对飞机失事事件进行

“充分的调查”。然而，香港当局一直没有进行麦克米伦所说的“充分的调查”。相反地，香港当局一再传讯了在香港的新华社人员，向他们提出同飞机失事毫不相干的问题。有消息说，香港当局人士在 15 日说，香港警察局的特别部门的调查人员“花了很多时间”来讯问一个所谓“属于共产党”的工会的一些机场工人。香港当局的这些行径，只能说它是别有用心。

电讯说，香港当局一直没有认真地对启德机场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彻查和追究。杀害我国人员的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有消息说，破坏飞机事件被揭露后，在香港的美蒋特务曾经担心要被逮捕。但是由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纵容的态度，这些特务人员放心了。

七、我国传媒连续发表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谈话，中国和外国报纸的报道和评论、波兰外交部和越南外交部的声明，谴责美蒋特务的罪行，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调查破案，还连续发表了许多国家的总理、负责官员、外交使节以及外国新闻团体、新闻工作者的函电，表示对我国遇难烈士的吊唁。

4 月 16 日，新华社发表了以宋庆龄为首的“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筹备委员会名单”。4 月 17 日下午，首都各界 5000 多人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四·一一遇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上悬挂了 11 位烈士的遗像，摆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送的花圈。大会致电印度国际航空公司转“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遇难人员家属，“表示吊唁和慰问”。此外《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烈

士,誓必解放台湾》的社论,还刊载了揭露美蒋利用香港进行特务活动的材料。

八、4月26日,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伟接见了英国代办杜维廉。杜维廉说,中国的报纸、广播电台、甚至高级官员都继续指责英国当局。英国政府对此很不满意。希望中国政府能将失事前所说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可能找麻烦以及事件发生后断定飞机是被破坏的所根据的情报供给我们,以便利香港当局的调查。何助理表示他可以报告政府。

周总理亲自交涉“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

4月14日上午,中国代表团飞抵仰光。周总理除与吴努、尼赫鲁、纳赛尔、纳伊姆商讨亚非会议有关问题外,还与尼赫鲁就“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进行了交谈。周总理说,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促使英国政府指令香港当局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周总理希望尼赫鲁致电英国首相艾登。尼赫鲁表示同意。

4月16日,周总理率团由仰光乘坐包租的印航“空中霸王”式客机去印尼。这种飞机已陈旧,爬高能力不够,中途遇到雷雨,冒险迫降新加坡。天气好转后继续飞行,当晚抵达雅加达。周总理连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的名义致电“北京石志昂等烈士追悼大会”,电称:“我们以无限愤慨的心情对4月11日在美蒋

特务制造的飞机爆炸事件中牺牲的烈士们表示沉痛的悼念,并对他们的家属致衷心的慰问。和平事业决不是卑劣的阴谋所能破坏的。为和平而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4月17日周总理飞抵万隆,在机场发表谈话说:“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会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机会在一起讨论共同有关的问题,这个事实就说明这次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我们不能不指出,有些人是不喜欢我们这个会议的。他们正在力图破坏我们的会议。大家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同样,印度、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国家在这次破坏事件中也遭受了沉重的损失。但是,和平友好的正义事业是破坏不了的。”

在印尼期间,周总理每天睡眠平均不过3小时,但他仍然为“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操劳。

4月26日,周总理告诉尼赫鲁,中国政府获悉,蒋特是利用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破坏飞机的。香港当局应从机场地勤人员中查明凶手。当晚,尼赫鲁函告周总理,他指派调查飞机案的R. N. Kao(当时译为高氏)已到雅加达,即去香港,他已将周总理所谈的意见告诉高氏。函中称,他于4月19日曾致电艾登,刚才收到新德里转来艾登4月22日的复信。

艾登致尼赫鲁信中说,香港当局已进行“最全面的查询”,结果“只不过证明了香港政府4月13日向记者发表的声明中业已公布的各项事实”。信中说,“如果要使香港的这些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

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信中重申 4 月 10 日中国外交部对英国参赞的通知“没有提到破坏”，希望尼赫鲁施加影响，使中国政府提供“进一步的细节”，并要求“印度政府把生还者的谈话或其他来源所获得的情报转告我们”。信中最后说：“飞机在到达香港之前，曾在曼谷停留”，请考虑是否“应请泰国当局在那里进行类似的查询”。

4 月 27 日，周总理会见尼赫鲁和高氏。周总理告诉高氏两点，第一，在飞机失事前，中国政府获悉，由美国庇护的蒋介石驻香港特务机关准备对我代表团人员和记者进行破坏和阻挠。中国外交部事前通知了英国代办处参赞，并请他转告香港当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代表也在事前告诉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第二，飞机失事后，中国政府获悉这次破坏是通过香港机场的地勤人员进行的。香港当局应据此进行调查破案。周总理重申，如果英国政府真有破案的决心，中国政府准备提供艾登信中所要求的材料。尼赫鲁同意周总理的看法，破案的关键在于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合作。他表示将再次致电艾登。周总理邀请高氏在香港调查后于 5 月初到北京，尼赫鲁立即同意。

遵照周总理指示，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派参赞申健及译员居坤道前往新加坡，负责处理善后事宜。他们到医院看望 3 位生还的机组人员，并向葬在新加坡的两位遇难的机组人员的坟墓献花致唁。从另一具遗体的遗物看是中国人，但已无法辨认是谁，火化后由申健将骨灰盒

带到万隆。周总理仔细询问后说，他将亲自把骨灰盒带回北京。

5月7日回到北京的周总理，于次日下午约见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总理请赖嘉文电告尼赫鲁，感谢尼赫鲁在仰光和雅加达时的合作，请尼赫鲁再电艾登，希望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在调查飞机失事一案上给予合作。

5月9日下午，周总理接见英国代办杜维廉。总理说，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破坏事件，现在我们又获得了足以破案的材料，中国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同我们密切合作。如果英国政府愿意这样合作，我们提出下列5点：第一，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将经由印度政府的代表高氏直接转告香港总督；第二，中方提供的材料不得透露给港英当局的华籍职员和与美国有关系的外籍职员；第三，对材料中所提人员应予监视，以防逃跑；第四，对关键人员进行审讯；第五，在进行这种审讯时，我们希望像印度政府所派的高氏一样，也有代表列席旁听。总理说，我们刚解放南京时，曾迅速查清蒋介石特务暗害并重伤埃及代办的案子，捕获了凶手。1954年海南岛驻军辨查失误，击落英国民航机，我们迅速道歉并赔偿。如果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合作，查清这一案件，我们愿尽力帮助。当然，担负责任和行使权力的是香港当局，我们只是处于协助和合作的地位。如能破案，对香港当局有好处。因为蒋介石特务在香港凭借美国的金钱和势力作出各种肮脏卑鄙的事，给香港当局制造许多麻烦。这次事件后，香港

当局更有理由清除蒋介石特务分子。如果让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香港成为蒋介石特务活动和破坏活动的中心,成为对中国大陆进行颠覆活动的中心,这将妨碍中英关系,而且不利于世界局势。我们有诚意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我们不是无事生非,而是要帮助香港当局解决困难。

杜维廉问,周总理提出的5点,是不是作为提供情报的先决条件?总理说,我们提出的5点,是工作发展的步骤,英国政府指示香港当局同我们合作破案才是先决条件。我们希望这些步骤能够实现,否则也不会有什么好处,反而可能使有关的人逃走。

周总理还嘱李克农将所侦悉的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情况进行核实整理,他亲自审定后定名为《向香港当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日期为1955年5月11日,由浦寿昌译成英文。5月12日,周总理将这一份材料的中文本和英译本交给高氏。中文本内容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于1955年3月即已获悉: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准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的人员途经香港时进行暗害。截至4月10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虽未能获悉此一暗害阴谋的细节,但已确知美蒋特务机关正在香港积极布置此项暗害活动。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乃于4月10日9时半通知联合王国驻北京代办处转告香港英国当局采取预防措施。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包乘之印

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式客机坠海事件发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不久即获得确实情报,知悉蒋介石集团驻在香港的特务曾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装定时炸弹,使该机在航行途中爆炸起火。

(三)截至5月10日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方面陆续获得下列情报:

(1)此一暗害活动系由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机关“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所策划,主持此事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具体执行者系香港启德机杨检修飞机的地勤人员周驹。

(2)用以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炸弹是美国供给的小型定时燃烧性炸弹,此批炸弹于4月5日由台湾“保密局”交由基隆开出的太古轮船公司航轮“四川号”秘密运往香港,交与该局所属“香港情报站”,开始时将此批炸弹存放于香港西营盘第三街178号2楼张祖顺处,后由“香港情报站”派特务李益民前往领取,最后转交周驹。

(3)“香港情报站”曾于事先指令特务许缜训练周驹安置此项炸弹的方法。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前,在极为短促的时间内,将此炸弹暗置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

以上情报是完全确实可靠的。

.....

5月15日晚,周总理接见杜维廉。杜说:“艾登首相感谢周总理的口信,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情报,愿意全心全

意地合作。英国政府的目的是要查明真相。”

周总理欢迎艾登首相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进行破案。总理说，高氏后天(17日)到香港，把我们的材料交给香港总督，希望香港总督当天就见他。中国政府准备派一位代表去香港。他将通过高氏向香港当局联系。如果他能见到港督，我们将很高兴。

周总理派我去香港

5月15日夜，周总理叫我到西花厅，罗青长在座。总理简要地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后说，英国政府同意合作破案，明天你作些准备，后天就同高氏去香港。高氏代表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这样便于执行任务，把新的情况经过高氏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来。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的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不要错过时机。

总理说，给你配个助手和译电员，带上密码去香港。所有给你的电报都由我批发，你发回的电报都抄送给我一份，重要的抄报主席和政治局。

总理说，这个案子非常复杂，不但涉及蒋介石集团，而且涉及英国和美国，所以我们一定要联合印度，共同促使英国破案。印度和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是对这个案件的看法和态度也不会完全一致，要参照统一战线的原则来

处理。外事无小事，你要多动脑筋，认真细致，争取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5月16日，李克农、罗青长、章汉夫、黄华分别向我介绍情况，董越千告诉我，已指定亚洲司专员张文廉作我的助手，译电员是王德三，英国代办处给我们3人在香港为期一个月的签证。当晚总理约见赖嘉文和高氏，让黄华和我参加。总理对高氏说，你代表尼赫鲁总理，熊向晖代表我。你们两位要像尼赫鲁总理和我一样，相互信任，友好合作。希望香港当局在审讯时，同意你们列席旁听。总理还一再提醒高氏在香港要注意安全。

5月17日，我及随行人员和高氏乘中国民航飞机到广州，住在迎宾馆。高氏约我谈话，不让助手参加。他说，周总理多次接见他，对他如此信任，给他如此重大的委托，使他深感荣幸。周总理一再要他注意到香港后的安全，使他非常感动和感谢。他说，印度政府对飞机案极为关注，现在中国政府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情报，英国政府承诺全心全意地合作，使这件事前进了一大步。我表示，周总理提出的5点是破案的必要步骤。高先生说要推动香港当局积极行动起来，我完全同意。如果高先生认为需要向香港当局提出其他建议并愿意先和我商量，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意见。我在香港住在新华社招待所，我不准备外出，高先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找我。

我将香港住处的电话告诉高氏。高氏给我两个电话号码，只要拨通其中之一，就可找到他。双方约定会面的地点就在我的住处。

5月18日,我们由广州乘专列到深圳。新华社香港分社干部罗干、潘德声陪同过桥到罗湖。香港警察署政治部主任威尔考在罗湖接。他说,已指定电报局英籍人员轮班收发给我和我发出的密码电报,给我的电报将及时送达。他要求我外出时,及早通知他,以便保护。我和高氏乘新华社汽车去住处,港方派便衣警察专车护送,沿途要地也布置了警卫。

新华分社在摩星岭有3栋楼房作为招待所,我和随行人员专用中间的一栋,新华分社派4人轮流日夜值班。港方派持枪警察日夜在楼外保护,每班4人。威尔考偕便衣警官2人到我住处进行安全检查。此后未再见到他。经与新华分社同志商量,我拍发的电报由分社派2人乘专车送电报局,不要港方保护。北京发给我的电报由电报局派专人乘摩托车送达,没有延误。

因张文廉不懂广东话,体弱有病,改由潘德声作助手,参与记录和翻译工作。

错综复杂的斗争

一、凶手周驹逃往台湾

高氏5月18日下午抵港后不久,即将我方提供的情报面交港督葛量洪。港督及港警察长均认为很好,当晚即派英警偕华籍译员按我方开列的12人姓名住址进行搜查。据称其中5人无法找到,对其中4人分别予以拘留、逮捕或监视。周驹在18日上午10时16分从机场下班后

迄未回家，家中有其父及其叔和同住的两人。另称，18日15时45分，港警署接到美国人陈纳德经营的航空公司(CAT)保安官琼斯电话说，在该公司18日上午10时自启德机场飞往台北的飞机上，发现一潜乘者(stowaway)，系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夫，名周梓铭。经港警查证，周梓铭即周驹，乃告琼斯，周梓铭是香港警署调查对象，希即送回香港。但不久又获悉，周驹已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港警长请求中国方面在目前调查阶段不要公布这一消息，以利工作，并称追回周驹希望不大。因按国际法，交通工具业主有责任将潜乘者送回原地，但到达地之政府愿意收留则不送回。香港当局认为，这是一件大规模的谋杀(mass murder)，周驹好赌好色，有二姘妇，经常负债，最易成为这类罪行的工具，其后必有主使人。港方决心把这些坏蛋一网打尽，请求中国政府继续提供情报。港方深信中国必有可靠的情报来源。

19日23日，高氏将上述情况当面通知我。我说，高先生转告的情况以及香港当局的请求，我即报告本国政府。现在我个人指出两点：第一，这证明中国政府提供的情报是完全正确的，证明“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确实是蒋介石特务机关指使周驹破坏的。第二，香港当局仍应竭力追回周驹，并应加紧审讯已捕人犯，追捕其他人犯，使案情大白。此外，有几个问题，请转告香港当局查清：第一，为什么周驹恰巧在5月18日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的这一天逃走？第二，飞机和火车、轮船不同，怎么会有潜乘者？第三，按国际法，美国人陈纳德的航空公司有责任把

潜乘者周驹送回香港，为什么周驹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第四，香港当局说，周驹在5月18日上午10时16分从启德机场下班，又说周驹5月18日上午10时潜乘美国飞机逃走，为什么所说的这两次时间和事实不一致？

高氏说，他将尽快转告香港当局。高氏走后，我连夜赶写了发回北京的电报。我想，总理让高氏传话，这一着的确高明。这样一来，印度政府也会了解实际情况，使香港当局无法赖帐。

5月20日上午，我收到了北京回电。总理认为我的表态完全正确，并请高氏转告港方，只要香港当局继续合作破案，中国政府将继续提供有关情报，周驹逃台的消息可以不予公布，同时要求港方将周驹引渡回港法办。

5月21日，高氏来告：港方称，香港和台湾并未缔结罪犯引渡条约，不能要求引渡周驹。港方不知道周驹为何恰好在18日逃走，周驹可能从某一两面分子处获悉中国政府已掌握了该案的详细情报，惧而逃走；5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印度《闪电》周报社论摘要，详细叙述了飞机失事的原因，周驹有可能看到，惧而逃走。我对高氏说，港方对周驹18日逃台的解释完全不能令人满意，这不是弄清问题的态度。我保留进一步评论的权利。

我问高氏：《闪电》周刊和印度一些报纸似乎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发表了中国报刊所没有披露的消息。高先生对此有何看法？他笑而不答。现将新华社转发的部分摘录如下：

4月23日，《闪电》周报发表了以《破坏万隆》为题的

文章。文章说：制造失事事件的组织名叫“中美联合署”（Sino—American Joint Administration）设在台北，在香港和日本的厚木有分支机构。另一破坏活动的组织名叫“铁血团”，设在万隆市及其周围。

文章说，据可靠方面消息，在万隆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就制订了这个行动方针。但是在美驻香港总领事指挥下行动的中美联合署特务估计失误，爆炸了一架没有搭载周恩来的飞机。据这里的内幕新闻称，造成这个错误的原因是阴谋制造者看了发自加尔各答的一条消息，说周恩来将乘坐印度空中霸王式飞机，自昆明启程，特务认为这是印度故意转移视线，周恩来一定是乘坐星座式飞机自香港起飞。于是，他们用定时炸弹炸了这架飞机。

文章说，来自一个方面的消息称，这个爆炸任务是“由负责飞机的检查和加油的工作人员中的特务执行的。香港机场工作人员中有两个工会，一是亲北京的，一个则是由美国特务领导的、来自台北的煽乱者所把持。”

5月14日，《闪电》周报主编卡朗吉亚在题为《空中谋杀》的社论中写道：这是一个预先计划和预先组织的破坏事件。定时炸弹是放在右翼后边的油箱后面，那里没有灭火设备，因为这个地方不可能起火。

社论说，很明显，定时炸弹是飞机在香港停留时被置放的。在香港并没有采取特殊的安全措施。在飞机场周围没有看到额外的警察。当飞机在香港着陆加油时，两个负责例行的中途检查和加油工作的机械师卡尼克和德索纳的皮包神秘地被人从机上取走了。皮包上都有机组人

员的标帜。在布置让这两个机械师去寻找他们的皮包的15分钟时间内,某一熟知星座式飞机结构的地勤人员就在右边支架的轮舱里放了定时炸弹。

印度报业托拉斯5月27日报道,在香港机场检修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职员已经逃往台湾。5月28日,印度《政治家报》也报道了这一消息,并说“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此人应对飞机被破坏事件负责”。

二、印尼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及引起的反应

5月27日印尼调查委员会发表调查结果的报告(摘要)。经过一个多月在纳土纳群岛、新加坡、印度、香港等地的调查,委员会根据对残骸进行的检查显示出肯定的证据,“断定这次失事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

5月27日香港政府新闻处发表了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的特别公报。公报说:在飞机残骸受到技术专家的检查之后,香港政府即接到通知说,飞机失事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于右翼的爆炸而造成的。鉴于时间的因素(因为通常类型的定时炸弹是要在12小时以内爆炸的),看来最有可能的是,爆炸物事实上是当飞机在香港停留的时候被安放在飞机上的。港方表示他们将以最大努力进行侦察,使肇事者归案法办。

英国外交部发言人2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英国政府同意香港政府发表的关于印度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事件的声明,并说这个声明说明了英国政府的意见。

5月28日,《人民日报》以《蒋匪特务谋杀罪行得到证实》为题发表社论,社论说,印度尼西亚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摘要,以及香港当局的特别公报,“充分有力地证实了我国所一再提出的飞机失事事件是由蒋介石特务分子所蓄意破坏的指责。”“中国人民对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和从事这一调查工作的各方面人士的努力表示深切感谢,对于香港当局所表示的‘决心作一切努力来调查事实’,‘决心尽全力来使肇事者归案法办’的负责态度表示满意。我们相信,经过这些公正调查之后,蒋介石特务组织所进行的卑鄙的谋杀罪行,定将在全世界人士面前完全暴露。”

印度总理尼赫鲁5月31日在新德里对记者发表谈话。他谈到“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破坏事件时说,没有疑问,定时炸弹是在香港放在飞机上的。在航空史上,他不知道任何比这更可怖的事情。

《政治家报》专栏作家维迪5月29日发表文章说,在印尼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摘要发表以后,印度国内再度掀起了愤怒和嫌恶的浪潮。印度人民怀着焦急的心情注视着美国政府,看它是否打算对蒋介石使用它的影响力量。对这种可怕的破坏行动负责的人不是一个普通的罪犯。因此他不能够作为政治难民受到保护。

三、香港当局使用蒋特“处理”破坏印机案

北京5月28日电告:尼赫鲁派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来京会见周总理,想在中、美关系中牵线搭桥。在他离京前,总理托他经过香港时向港督面告以下各点:

(1)现任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国民党调查组帮办的李福基,为台湾重要特务,属于“保密局”香港特别组,李过去在青岛国民党警察局任职,到港后与“保密局”发生关系。1953年台湾“内政部”调查局以蒋经国的名义与李建立联系。1954年以来,港方取缔在港蒋特非法活动的历次行动,由于李福基充当耳目,蒋特组织未受大的损失。

(2)此次印机案发生后,李奉蒋特之命探听港方动态,在侦知港方已注意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并监视周驹后,李即唆使周驹逃台,并将中、印官员秘密抵港事报告台湾。李还将港方搜捕情况通知蒋特。

(3)李福基近向台湾报告,他现为印机案主审,暗嘱已捕案犯坚不吐实,销毁案犯之文件帐目等罪证。李还建议台湾要美国方面疏通港方将案犯递解台湾。

(4)英国政府在答复中国政府愿意合作破案时,曾保证不将中国政府提供的材料告知华籍职员。现蒋特分子李福基竟参与审讯,对破案极为不利。切盼港方对李福基采取紧急措施,将处理情况通知我们。

北京来电让我将此事告高氏。高认为此事十分严重,除亲告港督外,还将以慎密方式报告尼赫鲁。

我于5月30日电告北京,港督向高氏表示:(1)李福基虽参与审讯,但非主审,不知此案全貌,所获文件均由高级英警官保存,李无从销毁;(2)现即采取步骤,保证不使李影响破案。在梅农告知此事时,港方即对李注意,但尚不便逮捕,以免引起惊异。港方早知李曾在国民党政权

下做过事，但数年来他为港方调查国民党情况颇有贡献，未疑及他对港府不忠。港府不知李与蒋特仍有关系，现将认真调查此事；(3)港方从未将中国提供的情报材料透露给华籍职员，破案均由英人负责。但因下层警员均为华人，在具体工作中必须使用他们。华人不知意图和全貌，但搜查某地和逮捕某人，则无法保密。今后仍须使用华员，但只限于具体工作。此点请中方谅解。港督还向高氏表示：美国方面并未就印机案和港府有任何接触。

6月2日北京电告：梅农告我驻印大使袁仲贤，他过港时已将李福基事转告港督，港督表示调查飞机案将不用华人，而用正式铨叙之官员。梅农说他请示尼赫鲁后又发一私人电报给港督，促港督注意此事对破案之重要性及应具的警惕。梅农说他去英时还要把上述情况通知英政府。梅农并称，他向港督提出通过美方向台湾要求引渡周驹，但恐难有结果。

我6月2日电告北京，高氏告，港警长已不使李福基接触印机案工作，并已对他进行调查。

6月4日北京来电告，周总理今日对赖嘉文说，港府虽将李福基调开，但在港警署中尚有蒋特分子。我们已查明，港府政治部华籍帮办李洛夫，很早就属于蒋特系统，在审理印机案中担任审讯和翻译，经常向台湾报告港方侦察搜捕情况，并在设法减轻案犯罪行。现李洛夫每天都与香港特务曾汉元联系。中国政府认为这一情况非常严重，务希港督采取措施。

赖嘉文告诉周总理：梅农来电话，关于在港进行调查

问题，已同艾登谈过。艾登说，英国政府已要求美国政府进行斡旋，把逃台的人送还香港。赖说，高氏认为港方不可能全部去除华籍译员，因懂中文的英籍译员不多，而需要审讯的人约在 500 至 600 人。此外还有大批中文文件要审查，但香港当局将注意可疑分子。

周总理说，李福基被调开后就由李洛夫取代，但他同蒋介石分子关系更为密切，不仅向蒋介石分子提供更多材料，且还销毁了一些材料。港方必须采取措施。

周总理及时解决同印方合作中的问题

一、鼓励高氏留港

到达香港不久，高氏就想返回印度。5月18日他对我说，中方已向港方提供详细完整的情报，使港方不能不采取行动。为此他已向港督建议，在此案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港方就与中国政府代表熊先生直接接触，届时他的中间人的任务即可结束，他就退出。我说，中印两国政府和人民都非常关心此案，现在工作刚开始，你我都是各自政府委派的代表，你不应以中间人自居，更不应中途退出。我与港方接触，一定要通过你，这是双方政府决定的，这对破案工作有利。

5月23日高氏又对我说，港督及港警察长向他重申，他们对印机案系由蒋特破坏及中方提供的材料之正确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已作出周密计划，并正考虑采取法律规定以外的特别侦讯措施。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心在

更大范围将香港国民党特务坏蛋搞干净。他们在开始时采取公开搜捕手段，系恐案犯逃跑，今后需转入秘密侦讯，不是短期内所能结案。印度对印机案舆情激昂，印机航线经过香港，香港不安全，印度也不能放心。他感到责任重大，希望早日破案，但过去尚少信心。现港方一再作了坚决表示，非他始料所及，使他信心倍增。同时感到此案非短期可破，而中国提供的情报已足够使港方据以破案。他对破案已无可帮助，是否继续留港，完全取决于我是否需要他。他建议我信任港方。如别无新的情报，不如让他回国。我说，我们的行动都应听从本国政府的指示，我无权答复他是否现在回国的问题。作为朋友，我个人建议他在印度舆情激昂的形势下，不宜急于摆脱印度政府交给他的任务。

我将以上情况电告北京，并提出务必争取高氏不先我而回，否则我留港诸多不便。建议向印方作些表示。

5月24日北京来电说，你在港与高氏合作，通过他转达我们与港方之间的情况和意见，比我们直接与港方发生关系较有回旋余地。你可告高氏，奉周总理指示，感谢他在这一案件上的努力，周总理希望他在已经取得成效的基础上，继续在港与你合作，直到破案为止。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作法。

5月25日我约高氏及其助手在寓所晚餐，将北京24日来电内容告诉他们。高氏说，周总理对他的夸奖及要他继续留港与中方代表合作直到破案，是对他的极大信任，

同时也是对他的莫大荣誉,他将立即报告政府。高氏对周总理所说“这是中印友好相互信任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印双方争取改善中英关系的一个实际作法”这句话极感兴趣,要我允许他以适当措辞告诉港督,以便从中英关系的角度加强港督破案的决心。26日,北京来电表示同意。

二、要尼赫鲁澄清印方的态度

5月31日北京来电告,赖嘉文通知我们,为督促“印机案之进行”,尼赫鲁总理将派最高级情报人员马利克赴港。同时,高氏告诉我,马利克是他的上级,将于6月1日抵港,要他安排和我见面。6月2日马利克(似为印度情报保卫机关负责人)由高氏陪同,偕古玛尔(加尔各答移民局副局长,原印度驻英使馆三秘)来我处谈话。

马利克说,印机案有政治和法律两方面,政治上可相信是蒋特破坏,但法律上如无证据即不能成立,请中方继续提供情报和证据。

马说,已捕人犯迄未招供。但从法律上看,即使本人承认,也不能定罪,而且也不能依据这一案犯的招供定另一案犯之罪,因为被控者不能同时成为证人。他估计周驹的罪行在法律上可能成立。因为周曾接触印机,有人证;周已逃跑,形成间接证据。周父及堂兄已被捕,可能成为证人。但其他人犯定罪的可能性只有50%。如无法律上的证据即无法定罪,由于他们是蒋特分子,英方从政治上考虑,为了向中国表示善意,可能将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驱逐出境。但此事亦不能同印机案联系起来,因为此案的公布将依法庭判决为准。印度对香港法庭的判决不会有

任何异议。

马问,周总理曾通过印方建议港方,在审讯此案时有中国官员参加,如港方同意,印方准备参加,问我是否参加。我说,周总理曾希望中方能派员列席旁听,但英方没有表示同意,现在案子审讯已经半个多月,我们一直没有得到详情,中途列席是否适宜,我要请示政府。

6月2日,我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并称:(1)现英方从法律问题着眼,后面可能有美国的压力,很可能缺席判决周驹个人的罪行了事。建议通过外交途径向英、印上层做工作,争取大部破案,至少应争取港方公开确认此案系蒋特所为。(2)目前列席旁听审讯应以婉拒为宜,以防港方一旦不能破案时,藉此推卸责任。

6月4日高氏对我说,因尼赫鲁即赴苏联访问,马已于今晨返印。港方将案犯分为两类:一类为破坏印机嫌疑犯,另一类为特务嫌疑犯。港方试图发现后一类人与破坏印机案的关系,但迄无所获,他说,马和他只对破坏印机案犯有兴趣,对特务案犯无从过问。我表示,港方这种分类不对,因所有上述人犯均系蒋特,且均与破坏印机案有关。高称,尚待从侦讯中求得证据。高说,港方可能将破坏印机案(指第一类人犯)的调查(而非审讯)详情提供给我们。他和古玛尔奉命根据我的需要无限期留港。

我即将上述情况电告北京。4日当晚北京回电说,同意我对马利克来港接触中的意见和我对情况的分析;周总理得知电报后,即于6月4日下午接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

总理对赖嘉文说，有一件事要请你转告尼赫鲁总理。在侦破飞机案中，从高氏和熊向晖到港后的最初一个时期，香港当局所给予的合作我们是满意的。但最近情况有些变化，熊向晖至今未与港方直接接触。港方除告我一些名单外，侦讯详情迄今未告我们。这只是单方面的合作，不是双方面的合作，这样的合作是无法继续下去的。

总理说，港方既已承认事情发生在香港，一再认为我方提供材料可靠，从捕获和侦察到的人犯中联系起来加以追究，即不难获得充分罪证。而港方现在还要我们提供法律证据，这是非常没有道理的。根据已有材料来破案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总理说，马利克告诉熊向晖，除已经逃跑的凶手，其他人因无证据，不能判罪，只能驱逐出境。如果港方这样做，就说明它想把此案草草了事。我们得到材料，蒋介石通过美国对英国施加压力，要香港政府把逮捕的人驱逐出境到澳门，并交还文件。否则对在台湾的英国领事馆将不予保护，还要派人到香港来捣乱。此外，美国也在施加压力。看来这个材料是正确的，而港方过去否认这一点。马利克说如果香港政府只判周驹一人有罪，印度政府将无异议。这使我们很诧异。我们怀疑，这是否代表印度政府的意见。印度政府是不是派马利克先生到香港去向我们解释的呢？请大使把以上各点告诉尼赫鲁总理，我愿意听取他的意见。

赖嘉文表示，可能其中有误会，马利克不能代表印度政府说话。不管中国方面是否提供材料，香港政府都有责

任破案。印度同样是受害者，而且以后还要利用香港的飞机场，不能坐视这件事过去而不予追究。他将把周总理所说的事转告尼赫鲁总理。

6月5日，我将外交部来电告诉了高氏，高氏说马利克是他的上级，他不能正式表示意见，他核对了我与马利克的谈话纪录，认为并无出入。他说：熊先生，我们相交不久，但我对你十分钦佩，希望和你永远作朋友。

到了6月8日，赖嘉文见到周总理说，关于马利克突然离港，是因为他急于赶往孟买亲自向尼赫鲁报告。尼赫鲁总理认为，周总理不必有任何怀疑。中印都关心这件事。印度一定尽一切力量使调查彻底地继续下去。尼赫鲁说，对周总理表示的焦虑，他有充分同感。

经过周总理坚决的表示，印度政府澄清了态度。当我把总理和赖嘉文交涉情况通知高氏时，他很有感触地说，你们的效率真高啊！你在这里跟马利克谈，你们总理又找我们驻华大使谈了，连我们总理也知道了。

从政治上考虑我留港或回京

一、第一次延长签证

6月10日我致电外交部称，我和译电员留港签证至6月15日到期。请示是否需要延长。

第二天北京回电说，印机案经过这一时期的斗争，我方提供港方的名单大部已被侦捕，印尼调查结果已公布，港方已公开表示态度，我们在政治上已取得初步胜利。如

果这一案件能获得有利结果,不仅使这一暗杀阴谋得以揭露,而且暴露了香港的藏污纳垢,特别直接打击了蒋介石匪帮,对解放台湾斗争在政治上有配合作用。你现在回北京,可能会成为港方的藉口,虽然港方尚未供给侦讯材料,但你留港经过高氏与港方接触,比在北京直接的外交接触更便利。你和译电员的签证请向港方交涉延长一个月,将来视情况发展再指示你的去留。

外交部要英代办处通知港方延长我们留港期,经新华社分社代办,我们的签证延至7月18日。

二、建议向港英施加政治压力

6月28日,北京来电,问我案情有什么进展,并问我有什么看法和意见。当日我回电讲,从6月初至今,港方始终拒绝告诉情况,我常请高氏催询,但港方均称侦讯无进展,并称是否供给我情况及供给哪些情况均由伦敦考虑处理。实际上已撇开我和高氏,将此事推到外交途径解决,这与我们来港初期情况已不同。我在联络和交涉方面均已无可致力。高氏因无事可做,思归心切,见面时屡表无奈。因此我建议将我召回,经过外交及宣传途径向英方施加压力,并可考虑邀高氏和我一块去北京,共同草拟一份向两国政府的报告,以便必要时作为宣传斗争的资料。

6月30日,我又致电北京称:6月28日来电告英代办处艾惕思同章汉夫副部长的谈话要点,艾说港方未能提供侦讯情况系因侦讯尚无结果。我认为这是遁辞。因为:(1)5月底高氏告我,港方准备将周驹等犯的照片及调查记录送他一份。当时我要高转请港方也送我一份,港

方推称尚须请示,但迄无下文。事后我问高是否拿到这类材料,高氏避不作答。

(2)当我方提出李福基的问题后,港方答称,李无从销毁所获案犯文件,因这些文件均由英籍高级警官保存。当时我对高氏说,由此说明港方已从案犯处搜获重要文件,请他转告港方将这类文件的名称及内容告我,但为港方所拒。

(3)据北京6月28日电示,证实港方已从周驹姘妇及其弟处获得案情,但港方迄今未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们。可见并非侦讯无进展。

(4)港方屡次表示关于是否提供侦讯情况事须由伦敦考虑处理。高氏也曾表示此案关系重大,港警在未得高级决策者审查批准前,不便提供侦讯情况。可见港方拒告侦讯情况系出于政治考虑。

(5)英方一再强调法律证据问题。据新华社同志谈,近年来港方逮捕和驱逐我方工会领袖多人,并未经过任何审讯,亦无任何罪证。我认为公开定罪不再需更多证据,案犯的文件就可能构成物证,但港方却秘不告我,在已捕人犯中只要加以适当诱导,不难使他们供出案情。依据港方法律,可以将招供者作为公证人而不作为罪犯,则他们的招供即可构成法律证据。港方推称难获罪证,很可能是借此拖延。

(6)港方是否提供侦讯情况是判断港方和我真诚合作及愿否彻底破案的重要根据。照目前情况看,港方今后仍不会将侦讯情况告我。我们在此只能等待他们提供侦

讯的最后结论，而无从获悉做出这一结论的过程和依据，因而难以改变或影响这一结论，港方由此可以保持主动，以便根据他们的意旨来决定此案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我们继续留港已无意义。

三、再次延长签证

7月6日，高氏转来香港政府给我的非正式备忘录。高氏说，这是在他多次催询后，港方给我的答复，明确表示不能提供侦讯详情。备忘录说将审讯的详细记录提供给另一方违反英国警察程序；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确定的证据将周驹定罪；经过调查，未发现我提供材料中所提的赵斌成、金健夫、许缜等是特务。

我即将这一情况电告了外交部，7月13日周总理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欧念儒，对港方给我的备忘录表示不能同意，并逐条进行了批驳。

总理说：香港当局根据香港警察程序，不把侦察情况通知我们的说法，这是一种法理态度，这叫“打官腔”。根据英国政府和艾登首相的多次请求，我们将有关情况提供给香港当局。按照中国国内法，我们也不能把我们的材料告诉另一国家的政府。但是中国方面并不采取这种法理态度，而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们对港方的态度表示不满；我们已提供了许多材料，主要线索都有了，一个能干的政府应该能够追查主谋者，虽然直接执行破坏的罪犯已逃到台湾，但主谋还在香港。因此，找不到主谋不能破案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周驹在高氏和中国代表到香港的同一天乘飞机逃到台湾，英国要

求蒋介石引渡，蒋介石不给。周是检查机翼的人，根据印尼的报告，定时炸弹就是安在机翼下的，这些都说明了周驹的罪。而香港当局现在却说不能判罪，这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显然有政治原因使港方改变了态度，在这方面港方倒不是从法律上来考虑，而是从政治上来考虑了；最近20几天，港方没有告诉我方代表任何消息，他的签证在本月17日就要满期，我们让他等到月底。我们的态度是继续同英国政府合作破案，但破案是香港当局的责任。香港当局也需要破案来洗清由于发生在香港机场的案件所造成的污点；香港当局政治部有许多蒋介石分子充任这一案件的翻译和审讯人员。他们破坏证据，翻译中该翻的不翻，问话中可以问出的说问不出，甚至连蒋介石特务凶犯的银行存款都由他们中饱。这对香港当局的信誉没有任何好处，希望香港当局采取切实有效的处理措施。

欧表示将把周总理所提各点立即报告其政府。

7月15日，北京来电说，由于必须视四大国会议情况的发展来部署整个外交斗争，我和译电员的签证延长到7月底。接电后我才知道，在香港的工作联系着外交全局。报载，苏、美、英、法四国政府首脑会议定于7月18日在日内瓦举行，旨在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在办理我和译电员的延期签证时，由于港方承办人员未听清楚，顺延了一个月，至8月18日止，港方发现后也没有更正。

四、周总理将我召回并邀高氏到北京

7月26日北京来电告诉我，总理同意将我召回。周

总理对赖嘉文说，如果本月底情况还没有进展，熊向晖就只能回来。我们邀请并欢迎高氏来北京。赖嘉文对周总理说，安排高氏在熊先生之后几天来北京，这样可以把最后的消息带来。

8月2日，欧念儒向我国提交关于印机案的备忘录，内容仍是“证据不足”等老一套。8月13日外交部回他一个备忘录，予以全面驳斥。备忘录最后说，中国政府认为，我方派赴香港的代表熊向晖先生继续留在香港已无意义，我们不得不决定把他召回北京。我们重申破案是香港政府的责任，中国政府期待这一重大政治谋杀案能够早日破获，一切有关罪犯能够受到应有的惩罚。周总理当天召见欧念儒，在严正驳斥英国备忘录中所说的“不能破案”的谬论后说，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的代表熊向晖先生召回，他将于本月15日离港回京。

8月14日凌晨我接到北京来电，让我即经高氏转告港方，我已奉命偕译电员返京，要港方在罗湖边境沿途采取安全措施。同时我还代表周总理感谢高氏的努力，并欢迎他再次到北京来。

8月14日午夜我致电外交部，行期已告高氏转达港方，并要港方保护。按照港方意见，我们决定在15日午前乘汽车赴罗湖，中午可抵深圳。高氏对周总理盛情表示感谢，在向政府报告后，争取月底前到北京。

结 局

一、周总理要我先向外交部汇报

我于8月18日回到北京。总理办公室的陈浩告诉我，总理到北戴河休息几天就回来，让我先向外交部汇报“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的主要情况，同时谈谈对香港工作的看法和建议，总理指示让廖承志参加。

汇报时，由张闻天主持，章汉夫、乔冠华、黄华、龚澎、董越千等出席，廖承志和陈浩参加。乔冠华首先说，“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不用汇报了，这件事拖的太久，参照8月13日给英国代办处的备忘录，由外交部发一个声明就可以结束，已经报告了少奇同志，少奇同志已经同意。我说，少奇同志同意是尊重外交部的意见。这件事是总理亲自处理的，而且以总理的名义邀请高氏来北京，高氏还没有来，就单独发表声明了结，这不合适，应该先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廖承志说，对，应该报告总理，这不是不尊重少奇同志。章汉夫说，我不知道报告了少奇同志，应该先报告总理。

关于“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我说，英国的腹案就是不了了之。现在把我召回，又邀高氏来北京，这是对英国施加政治压力，英国可能要有所交代，只要它承认破坏飞机的凶手已逃到台湾，这就是我们的胜利。究竟如何，等高氏来北京以后就可能看出名堂，因此，现在发表声明告一结束的办法似乎过急了。

二、周总理指示我写一份书面工作报告

8月26日高氏到北京。27日周总理接见他。总理说，高氏先生同熊向晖一起在香港工作了三个月，两人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共同性。熊向晖通过高氏得到香港当局的通知，又通过高氏通知香港当局。因此，我提议，高氏和熊向晖写一个共同的书面报告，提交中印两国政府。这个报告中不需要琐碎的和不相干的事实，而是纯粹客观的叙述，作为两人三个月工作的记录，以便于中印两国政府今后进行商量。中国政府的意见将向尼赫鲁总理和印度政府提出，那将是两国政府之间的事，不再涉及高氏和熊向晖两人。

高氏说，希望能给他时间，以便报告印度政府，并请求政府指示。周总理表示同意，并说这个报告可以很简单，只要提出几件事实，作一个纯客观的叙述。这个报告不必太长，因为高氏在北京的时间不能太久。这个报告将成为中印两国政府商量对破案态度的基础之一。

8月28日，总理请高氏在颐和园听鹂馆餐叙，章汉夫、乔冠华、龚澎、浦寿昌和我都参加了。

后来，高氏对周总理说，他请示了印度政府，感到和熊先生一起写一份报告有所不便。总理表示理解。于是，总理让我单独写了一份报告，题目就叫《熊向晖向中国政府的报告》（见本文附录）。经总理审阅后，让浦寿昌译成英文，由我交高氏阅看，他作了几处修改。总理指示我加注“这份报告曾给尔·纳·高先生看过”，把中文本、英文本各打印一份交高氏。

三、英代办送交《周驹的罪证》摘要

9月2日，英代办欧念儒向章汉夫副部长提交《周驹（别名周梓铭）的罪证摘要》，列举了周驹的7个罪证。

其中“证据五”称：1955年3月，有一姓吴的人（未查获）通过一名叫张耀灵（未查获）和另外3人（关就记、关懋公和周钻如——已被拘留）的关系介绍给周驹。张耀灵常出入于庙街113号1层楼的就记电料行，此店是被国民党作为一个联络站设立的。吴说，他正在物色一名在飞机场内工作并愿意干一件有国家性重要意义的事的人。周驹被说服去破坏一架共产党的飞机。吴告诉周说，将会给予奖金。

“证据六”称：周驹向周仕学、周国辉、周瑞维（周驹的父亲）和周钻如承认了他的罪行。其中包括以下细节：他曾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他曾被允诺可得60万元的奖金；他曾用了—一个轻微滴答声音的小型定时性炸弹；他企图逃到台湾。

四、香港当局宣布缉拿周驹

香港当局在9月3日发布声明说，“对4月11日印度航空公司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进行4个月的深入调查后，警务处今天自香港法官处获得对被控有阴谋谋杀罪的周梓铭（化名周驹）的逮捕状”。声明说：“据悉周梓铭在5月18日搭乘飞机赴台湾，因此要求该地当局将周梓铭交回香港受审”。

此外，新华社香港9月4日讯：据美联社报道，英驻淡水领事赫尔曼要求蒋介石集团台湾省“主席”严家淦把

香港当局宣布缉拿的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蒋帮特务周梓铭交回香港当局受审。

虽然台湾当局不敢交出周驹，但这一案件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

五、“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1956年1月16日，英国代办处照会我外交部称，港英已将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送往台湾。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进行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但“不能提出有关破坏事件的控告”。现港方继续拘留13人。

2月17日尼赫鲁说，英国正设法引渡周驹，但台湾拒绝交出，印度已向英国转达对此事的关心。

6月24日，英代办处照会我外交部称，由于无充分证据交付审讯，港英已将拘留的13人驱逐出境。

8月4日周恩来以外长的名义照会英代办处，对港英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严重抗议，并再次郑重声明，此案尚未破获，“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历史不会忘记，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里矗立着周总理亲自书写的“参加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墓碑的基石上刊刻周总理核定的“殉难经过”，墓碑背面刊刻着“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简历”，这都使“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附录：

熊向晖向中国政府的报告

(这份报告曾给尔·纳·高先生看过)

1955年9月3日

我奉命于1955年5月18日和印度共和国政府指派的尔·纳·高先生同到香港,执行下列任务:

(1)将我国政府所获得的有关我国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所包乘的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星座机于1955年4月11日在香港被破坏案件(以下简称破坏案或该案)的情报材料提供给香港当局,以期有助于香港当局履行其破案的责任;

(2)将香港当局处理该案的进行情况报告本国政府;

(3)代表本国政府就该案的有关问题向香港当局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出发以前,我和高先生了解到:联合王国政府欢迎中国政府提供有关该案的情报,并表示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

我和高先生在香港共同工作了89天,直到8月15日我奉命离港回京为止。在此期间我一直没有能够和香港当局就该案进行直接接触。我和香港当局之间的联系是通过高先生保持的。

谨将我和高先生自5月18日至8月15日在香港共同工作期间的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一)

在5月18日到达香港的当天下午,高先生即将我国政府于5月11日在北京交给他的关于该案的综合情报材料面交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这份情报材料指出:“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失事,是由于香港启德机场地勤人员周驹,遵照台湾“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的指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从启德机场起飞前,在该机一个机翼的油箱附近,放置了小型定时燃烧性炸弹,致使该机在飞行途中起火坠海。这份材料列举了和此案有关的11人的姓名并附有一部分人的详细住址。

在我居留香港期间,又先后经由高先生将我国政府陆续获得的有关该案的情报及时提供给香港当局。截至8月15日止,一共提供了与该案有关的40个人的材料。这些材料表明,这40个人都住在香港政府的辖区,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破坏“克什米尔公主号”有关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或其代理人或者是知道破坏案内情的人,其中包括这一破坏案的主使者赵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建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运藏炸弹者张祖顺,具体执行破坏任务者周驹,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者李瑞元,发放这一破坏活动的经费及奖金者蔡渭清等。

(二)

香港当局根据我国政府提供的材料,于5月18日夜间开始搜查、逮捕等措施,并于5月19日、21日、25日、26日、31日、6月7日先后将他们进行搜捕的情况和结果经由高先生通知我。根据香港当局给我的被捕人犯名单,破坏案的要犯沈齐平、张祖顺、李荣芳(即李瑞元)、蔡渭清等已先后就逮。

但是，具体执行这一破坏任务的凶犯周驹，则已于5月18日逃往台湾。关于此事的始末如下：

(1)据香港当局5月19日下午4时告称：他们在5月18日夜间搜查了周驹的住宅，但未找到周驹。经查周驹在5月18日早上还在启德机场工作，当日上午10时16分下班后迄未回家，现仍继续搜捕中。

(2)据香港当局5月19日晚10时告称：香港警务处于5月18日下午3时45分接到美国人陈纳德所办的民用航空公司(CAT)保安官(SEcurity OFFICER)美国人尔·琼斯(R·JONES)电话称，该公司台北来电，在该公司5月18日上午10时自香港启德机场飞往台北的飞机上，发现一潜乘者(STOW-AWAY)。自称是香港航空公司职员，但不知姓名。香港警备处要求琼斯查询。5月19日下午4时半琼斯通知称，该潜乘者名周梓铭。经香港警务处查证，周梓铭即系周驹，乃要求琼斯将之送回香港。未几琼斯回答称，周梓铭已落入台北保安队(PEACE PRESERVATION CORP)之手。

(3)5月19日晚11时，高先生将周驹逃台的消息转告我时，并转达了香港当局的下列请求：

(甲)请求中国政府在目前调查阶段不要公布周驹逃往台湾的消息；

(乙)追回周驹的希望已不大，但香港当局认为“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破坏案件是一经过周密计划的集体谋杀罪行，周驹是一个好色之徒和赌棍，平日负债累累，最易被利用为此类罪行的工具，他的后面必有主使者，香港政府决心“肃清这批坏蛋”(Smash the whole gang)，恳求(beg)中国政府惠予合作，继续供给有关情报，香港政府深信中国必有可靠的情报来源。

当时我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

(甲)上述消息及请求当即报告本国政府。

(乙)周驹逃往台湾的事实，证明“克什米尔公主号”确系蒋特

破坏,证明中国有关该案的指陈和提供的材料完全正确。

(丙)香港当局仍应竭力追回周驹,并应努力侦讯破案。

(丁)香港当局应查清下列问题:为何周驹恰好在高先生和我到达香港的同一天上午逃走?飞机不同于火车和轮船,怎样会有潜乘者?为何周驹会落入台北保安队之手?香港当局初称周驹在5月18日上午10时16分自启德机场下班,继称5月18日上午10时潜乘美国飞机逃走,为何两次所述的时间及事实不一致?

(4)5月20日我遵政府指示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只要香港当局继续合作破案,中国政府将继续提供有关情报,周驹逃往台湾的消息也可以不予公布,同时要求香港当局将周驹引渡回港归案法办。

5月21日香港当局回答说,香港和台湾未缔结罪犯引渡条约,不能要求台湾引渡周驹。关于周驹在5月18日潜逃的原因,香港当局解释说,可能是因为5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印度《闪电报》的电讯摘要,其中详述“克什米尔公主号”失事的原因,周驹可能看到,惧而逃走;也可能是因为周驹从某一两面分子处获悉中国政府已掌握了该案的详细情报,惧而逃走。当时我表示,这样的解释不能同意。

5月22日我遵政府指示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周驹之能由香港逃往台湾,是因为香港当局事先对在启德机场工作的地勤人员未采应有的措施;但现在不是争论责任问题的时候,应该继续合作,以求彻底破案。

(三)

在6月初旬以前,香港当局经由高先生将他们处理破坏案的进展情况通知我,并一再表示了他们的破案决心。例如,5月18日香港当局看到中国政府所提供的第一份情报材料后,就认为这个材料是“翔实”(WELL-ESTABLISHED)“具体”(SPECIFIC)

的，决定据此进行工作。5月22日香港当局表示，他们完全相信中国所提供的情报之正确，决心破案，并已作出周密计划；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心在更大范围将潜居香港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坏蛋加以肃清。5月23日香港当局重申，他们对“克什米尔公主号”之为蒋特破坏及对中国提供的材料之正确毫不怀疑，决心破案，并正考虑采取法律规定以外的特别措施。5月26日香港当局表示，他们的行动计划包括两重目的，直接目的是搜捕这一破坏案的全部人犯，长远(LONG-RANGE)目的是将潜居香港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坏蛋加以肃清。他们表示，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在中国所提供的材料的基础上，依据现有的搜捕成果，假以时日，这两个目的都有希望达到。

但自6月初旬以后，高先生和我几乎没有从香港当局处获悉有关处理破坏案的任何情况。我请高先生转请香港当局继续提供调查和审讯该案的材料，以利合作，但香港当局回答说，此事需要考虑。我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为了体现合作，中国政府已将有关该案的情报无保留地供给香港当局，香港当局关于处理该案的情况也不应对中国政府有所保留。香港当局回答说，是否提供侦讯情况及提供哪些情况，需由伦敦外交部考虑审查。其后又经过多次催询，到7月6日，香港当局经由高先生送给我一份备忘录，其中说明，将审问的详细记录供给另一方，是违反英国警察程序的，但香港当局愿意继续经由高先生使中国代表获悉调查的进展。但直到8月15日为止，香港当局经由高先生告诉我的调查进展情况，只是：调查在继续进行中，进展无可奉告（这句话是高氏改的，原文为“调查尚无进展，但在继续进行中”）。

(四)

遵照政府的指示或根据个人的看法，在和高先生在香港共同工作期间，我还曾就下列问题经由高先生向香港当局提出建议或

交换意见(这句话是高氏改的,原文为“我和高先生在香港共同工作期间,还曾就下列问题向香港当局提出建议或彼此交换意见”):

(1)在5月28日、6月2日、11日及14日,我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曾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参与破坏案的调查、审讯、搜捕等工作的香港警务处政治部帮办李福基和李洛夫,都是蒋介石集团的特务。中国政府获悉,他们在处理此案时销毁证件,篡改口供,并且不断地把香港当局处理此案的情况报告蒋特组织。中国政府要求香港当局立即采取措施,保证不使他们影响破案。同时并将这两个人与蒋特组织联系的具体情况通知香港当局。

5月31日香港当局回答说,李福基参与破坏案的审讯,但不知该案的全貌。香港当局早知李福基曾在蒋介石政权下做过事,但不知他与蒋特组织仍有联系。至于从已捕人犯处搜获的文件,均由高级英籍警官保存,李福基无从销毁。

6月2日香港当局通知说,已将李福基调职。关于李洛夫的问题,香港当局于7月6日表示,已注意到中国方面所提供的材料,但未说明已否对之采取措施。

(2)6月2日香港当局表示,从政治上看,可以相信“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由蒋特破坏,但从法律上看,需要证据才能定案。他们要求我国提供证据。他们把案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破坏案有关的,一类是与蒋介石特务组织有关的。据他们说,后一类的人中已有人承认与蒋介石特务组织有关系,但尚未能发现他们参与破坏案的证据。香港当局还曾暗示,如果没有证据,则后一类的人将予驱逐出境。

我曾就这一问题表示下列意见并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

(甲)香港政府负有破案的责任,要求我国提供证据是不合理的。

(乙)香港当局根据我国提供的材料所追查、拘捕的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与破坏案有关的蒋特或代理人,因此将案犯分为两类

小
白
車

是不对的。

(丙)香港当局在回答关于李福基问题时,已经承认从被捕人犯处获得文件。而且香港当局说过,根据香港法律,只要被拘者中有人供出案情,可以不把招供者做为被控者而将之做为证人,则其供述可以构成法律性的证据。因此找到证据是不困难的。

(丁)如果不弄清究竟,甚至仅将案犯驱逐出境,则正是蒋介石集团所希望的。香港当局将无法向中国、印度及全世界公正舆论作交待。

6月10日香港警务处长表示,在未弄清全案前,保证不对被拘者采取驱逐出境措施。7月6日香港当局给我的备忘录中说,虽然迄今为止的破案是明显的不成功,但仍将竭力继续调查。

(3)6月1日至4日,印度的马利克先生到香港了解破坏案的处理情况。在他和香港当局讨论以后,于6月2日向我叙述他的印象说,基于下列因素,周驹的罪行在法律上可能成立(这句话是高氏改的,原文为“周驹的罪行在法律上可能成立,因为”):

(甲)周驹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自启德机场起飞前曾擦拭该机,这是有人证明的;(乙)周驹的潜逃形成间接证据;(丙)根据中国提供的材料,周驹的父亲周瑞维和堂兄周荣福,都知道周驹参与破坏案的详情及其潜逃台湾的经过;现在香港当局已找到周瑞维和周荣福;据香港当局说,周荣福表现十分合作,对破案很有帮助。但7月6日香港当局给我的备忘录中说,虽然嫌疑是在周驹身上,但迄今的调查未发现充分的确定的证据足以将他们提交法庭判罪。

(4)据5月21日香港当局告称,李荣芳(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者)系香港出生,因未找到他的犯罪证据,已于被拘48小时后释放。当时我曾对此表示遗憾,并要求香港当局在弄清全案前不再放人。

7月21日香港当局经由高先生告我称,因未发现冯汉和刘国栋的罪证,已予释放。当时我请高先生转告香港当局说,香港当

局迄未提供侦讯详情,即使并无证据说明冯汉和刘国栋有罪,但
也无证据说明他们无罪,在弄清全案前,至少应将他们视为嫌疑
犯,并无理由予以释放;而且香港当局在释放以后始行通知,这不
是合作的态度,不能不引起我的诧异和不满,而且不免使人感到
香港当局的破案努力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希望香港当局采取积
极态度,努力侦讯破案,在结案前不再放人。

(五)

遵照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于8月15日离港回京。我和高先生
在香港的共同工作也就到此为止。

抗战胜利时我 与港督代表的一次谈判

谭 天 度

编者按：谭天度同志，广东高明人，生于1893年4月，是目前健在的、年龄最大的、党龄最长的革命老前辈。他早年在广州参加了党的宣传、教育、统战、工运、农运、学运等许多开创性工作。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以后主要在香港、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抗战时期，在广东参加抗日宣传、游击战争、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以后进入粤赣湘边区，参加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在广东主要从事民族事务和统战工作。“文化大革命”时遭受迫害。1977年，重新担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1983年离休。谭天度同志的这篇文章，记叙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情况。

香港问题是中国的主权问题，同时也是国际关系和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筹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国、共、英、美三国四方立即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制定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方针，并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一系列的工作指示。当时

我任广东东江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主任，9月上旬至10月中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广东区党委派我为中共代表，到香港与港督代表举行了有关香港问题的谈判。

一、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战略决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被划为中国战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北纬16度以北的越南北部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大陆除东北外（东北归苏军受降）的所有地区，香港属广州受降区。但当时国民党军主力都在大后方，被安排参加广州受降区的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都在广西及粤西的湛江，直到9月15日，张发奎司令才乘飞机到达广州，参加了16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的受降仪式。

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演讲，指出蒋介石要下山来摘桃子，要与我们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提出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反对国民党篡夺抗战胜利果实。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开展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抗日游击战争，占领了九龙、新界的部分区域。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延安总部在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出了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

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8月15日，朱德总司令下令给侵华日军统帅冈村宁次：“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在接到延安总部8月10日24时的命令后，东江纵队于8月11日8时40分发出了《紧急命令》。14日，广东区党委又发出了《对目前时局的紧急指示》。据此，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开展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鉴于国民党军已向粤北和江北（东江北部）解放区进攻的局势，东江纵队决定以江南（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地区作为受降的主要地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基本上解放了上述广大地区。在宝安县，我们于8月20日收复深圳镇，24日成立了深圳特别市，委任了市长；23日收复沙头角镇；随后，又迫使县城南头镇的日伪军投降。在港九新界地区，我们于19日解放了大屿山全岛；25日进驻长洲岛；随后，收复了大埔、西贡、元朗、粉岭等地，我们还接收了个别仓库，并接受零星日伪军的投降。此时，日伪军只能龟缩于香港和九龙市区一隅之地，其周围的陆地和海岛几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装占领。

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军队迅速光复了大陆各沦陷区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收复了各大城市租界，并在中国本土和越南举行了日本受降仪式。与此同时，随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

中国政府收回了东北主权。刹那间，“光复一切被占国土！”“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复全部租界！”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由于收复租界，光复被占国土，国民党捞取了颇大的政治资本。当时，国民党的大部分军队在西南等大后方，它急于抢夺抗战胜利果实，急于发动内战，并妄图消灭共产党，因而无力分兵它顾；此外，鉴于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领导人在雅尔塔会议上签署了关于苏联对日作战条件及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协定等原因，这就使国民党在收复香港和澳门的问题上，出现了举棋不定的局面。即使如此，国民党仍加紧与英国争夺香港的步伐，寻机收复香港。

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香港，他们早在1942年就由麦道高组织了一个重占香港的研究小组。由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英军兵力远在欧洲，于是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舰，在缅甸运载了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港岛登陆。然而这点兵力是远远不够接收香港使用的，它需要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当抗战胜利时，香港总督杨慕琦仍被关在东北的集中营，直到1946年5月，他才由英国重返香港复职。此时的香港实际上处在“半真空”状态，英国人既惧怕国民党收复香港，也不愿意中共在香港继续扩大势力，同时对美国表面上支持自己收复香港、暗地插足香港事务的野心十分不满，它苦于要在这三方中权衡利弊。

至于美国，原本同意香港属于中国受降区，但在英国

重新强占香港的事实面前，又转而支持英国，并与英国达成了秘密协议。实际上，无论美国支持哪一方，目的都是想染指香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在华利益，实现它的太平洋总体战略设想。

面对这一局面，如何保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为中国共产党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

中共中央原计划是：能够收复的失地尽量收复，故此在1945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央拟电致广东区党委，要求我们在贯彻延安总部广播命令的同时，在华南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我们在接到中央的各项指示后，力求收复一切失地，包括向港九地区发动攻势。

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这一重大方针的确定，中央向各地党委发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决定放弃收复大城市的原定目标，但却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派出强有力的人员，进入大中城市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党中央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尚无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初步形成了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中央就我党在香港工作问题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

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

中央分析指出：收复香港是英国的既定目标，但它将面临与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必须有所取舍。在公开宣传上，我们不能反对国民党收复香港，以免在政治上处于被动。但是只要我们能香港站稳脚跟，就可以对其长期打算，长期利用。因此，中央指示我们，应利用国民党、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我党于抗战期间在香港打下的基础，迫使港英当局同意共产党在港合法地位，大力开展共产党在港公开工作局面，促使港英当局实现若干民主改良，造成便利民主分子活动之条件，并将其建设成为华南民主运动的基地。中央同意港九独立大队撤回内地，以便于我们与港英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央指示后，委派我为中共代表，黄作梅为英文翻译，到香港本岛与港督代表举行谈判。以后，由于英方已派出翻译，黄作梅不再继续参加。我是在8月下旬到达香港的，9月初开始谈判，内容是准备收复香港；但紧接着我们就收到中央关于不收复香港的电报指示，谈判内容也改变为保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港利益。全部谈判直到10月中旬才结束。

二、与港督代表初次交锋

在与港督代表的初次谈判中，我主要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立场，指出：香港、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是靠发动侵略战争及当时腐败的中国政

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我们总有一天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们暂时同意英国重占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在港利益。

为使谈判向有利于我方的既定目标转换，我将话题转到了抗战内容。

首先，我提到双方的一次失败合作。我指出，1941年冬香港沦陷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我们曾派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夏衍、乔冠华与港督杨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及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举行了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以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与我方合作的良机。

其次，我概述了秘密大营救。香港沦陷后，我们在营救中国文化精英和爱国人士的同时，积极营救了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可惜的是，当时被关在集中营中的香港警察总监依云士目光短浅，以为战争很快结束，担心越狱有危险，下令不准任何人参加我们组织的越狱行动，致使大多数人不敢出逃。否则，我们的营救工作将取得更大的成绩。接着我又指出，仅据不完全的统计，在香港沦陷后的一年中，我们就营救了英国人 19 人，印度人 26 人，其中有港府和汇丰银行的高级职员、军官、义勇军及其他各类人员。在此一年中，我们仅为营救英国人和印度人就耗费了 5 万余元港币。我同时指责港英当局不守信誉，原来曾答应我们每救出一人，除提供全部营救费用外，另给 2000 元港币奖励金，但至今都未兑现。以后，我

们与英军服务团合作,英方才提供了1000元港币慰劳金和3万元国币,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这些款项还不够其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开支。1943年8月,英军服务团单方断绝与我方联系。即使这样,我们仍继续营救英方人员,并给英军服务团以工作上的援助。在香港沦陷后的3年中,我们共营救英国人42人,印度人54人,以及美国、丹麦、挪威、俄国、菲律宾等国人员上百人。我们所作的这一切都是在自己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在秘密大营救工作中,我们的人员出生入死来往于港九与东江游击区之间,有的人还为此献出了生命。

再次,我提到了军事情报合作。我指出,在香港沦陷期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我们利用自己200余人的情报网与盟军开展了情报工作,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东江纵队的上述工作,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及英军服务团最高负责人赖特上校都曾给以高度评价,并多次诚挚地向我们表示感谢。

最后,我又略述了港九抗日游击战。我特别提醒他们注意,当日军进攻香港后,港督杨慕琦率部投降,而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却在港九地区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我们炸机场,断桥梁,袭舰艇,打日寇,除汉奸,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并解放了港九大部农村和海岛。

随即,我让黄作梅出具了事先准备好的有关材料,其中包括东江纵队与英军服务团合作的报告、东江纵队营

救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的统计材料等。我同时还要英方代表注意：中国也是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共的董必武等人现在正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出席美国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我正告英方谈判代表：历史证明，在中国的领土上，合作，对双方有利，不合作，最终吃亏的还是你们。

港督代表听了我的这一番议论后，态度变得明显和缓，他对我所谈及的各项事实均表赞同。

三、确立中共在港合法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锋后，我们即转入了谈判的实质性内容，这就是中共在港地位及中国人民在港利益。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我们应通过谈判迫使英方同意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允许我党以半公开形式在港从事各项活动，即不论是秘密和公开活动均不以共产党名义出现，我们的活动也不以推翻港英政府为目的。

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我们曾在本世纪 20 年代发动过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港英统治当局。但在此后的二十几年中，共产党在香港的几乎所有活动均属非法性质。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驻港的南方局、广东省委、两广省委、香港工委等机关就迭遭破坏，其中省级领导干部被捕的就有蔡和森、章汉夫、陆更夫、郑怀昌等十余名，其中绝大多数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本人在此前的香港地下工作中，

就曾3次被捕，两次入狱。在抗日战争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了港九地区的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现在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香港占有一席之地。

为此，我在以后的谈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条件：①承认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②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③同意我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④同意并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⑤在我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我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⑥我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⑦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⑧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⑨非经我方同意，英军不得进入我控制地区等。

港督代表当时从心里很不想接受上述条件，但碍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各方力量格局，最终还是全部同意了我方提出的要求，只是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至此，我们与港英当局谈判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我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诺，中共今后不在港九地区从事非法活动，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将在近期内全部撤出。

这次会谈后，由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政委的名义起草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该部将在一周内全部撤出香港地区，并油印成传单于9月28日在港九

各地散发。

当时香港治安紊乱，百废待举，驻港英军兵力严重不足，而港英当局又不敢请国民党军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以恐引狼入室。港英当局为了维持香港的社会秩序，从战乱中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我们的力量。鉴于东江纵队驻港部队在广大群众中有良好的声誉，港督代表提出请求，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缓撤出，帮助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港九民众建立自卫武装和筹建警察后备力量等。我经请示，同意港府请求，答应港九大队在港继续驻扎5个月，经费由港方负责。

为协调工作，并表示友好，驻港英军最高负责人菲士廷将军曾提出会见东江纵队曾生司令员和王作尧副司令。在此期间，应驻港英军的邀请，东江纵队司令部还派出袁庚和黄作梅到九龙半岛酒店与驻港英军夏瑟海军少将商谈港九独立大队推迟撤退及双方军队的具体合作事宜。

10月间，广东区党委将这些谈判的结果陆续电报中央，告知：对我方提出的条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我数年来坚持斗争之精神及成绩，深表钦佩感谢”。随后，中央批准了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

1945年9月，东江纵队300余名伤病员分别住进大埔康乐村等数间英军医院。根据谈判协议，我方伤病员在医院治疗期间的一切费用及人身安全均由英军负责。10月，国民党新一军到香港时曾想劫走这批伤病员，被英军以应“遵守红十字会精神”而加以阻止。以后在军调谈判

期间，国民党又想来“接收”这些伤病员，均未得逞。

当国民党在广州接受日军投降后，广大民众和社会舆论强烈要求收复港澳，广东省参议会还发表了收复港澳宣言。10月下旬，国民党在广州地区受降主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派参谋处处长李汉冲为代表、上校参议骆来添为译员到香港，与菲士廷陆军司令举行谈判，以图寻求机会收复香港。但他们达成的协议，内容仅为过路香港的国民党军队应遵守的规则等。此时，国民党军纪败坏，驻港国军在香港大肆违法乱纪，他们强用国币，并发生抢劫商店、汽车撞死人、殴打警察致死等重大案件，但港英方面都不敢处理。在此历史重要关头，蒋介石仍视共产党为大敌，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断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军队大批北运，他们高喊的“收复香港”终成泡影。

四、全面开展中共在港半公开工作

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和谈判决定，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和半公开两大工作系统，分别由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及连贯、饶彰风负责。1946年1月15日及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6月，设立了半公开工作机构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书记。根据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之间，党的大批专业干部

章汉夫、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乔冠华、廖沫沙、龚澎、冯乃超、邵荃麟等人陆续由内地转移至香港，我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1947年5月，成立中共中央香港分局（1949年4月改称华南分局），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章汉夫、梁广、潘汉年、夏衍、连贯为委员；随即港粤工委改称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章汉夫为书记；广东区党委城委改称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梁广为书记。香港成为华南人民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1945年11月13日，广东区党委机关报《正报》在香港创刊；同年年底，建立了新华南通讯社；1946年1月4日，在香港复刊了《华商报》；随后，成立了新华社华南分社（后改称香港分社）；出版了《群众》周刊、《今日中国》英文半月刊、《经济导报》等。

1946年9月1日，我们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该校得到了香港政府劳工司、教育司及社会的广泛支持；以后这间学校不断发展，并延续至今。1946年10月10日，广东区党委与民主人士共同创办的达德学院开学。与此同时，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相继开学。1949年2月，香港工委财经委创办的建中工商专科学校开学。这些学校为解放战争时期的游击区及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培训了大批干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区举办了二十几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了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

将许多期学习班转移到香港举办,刘晓、方方、刘长胜、钱瑛、许涤新等领导亲自授课。

1947年,香港爆发了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香港城委遵照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改称统战部)的指示,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取得了大罢工的胜利。通过这次大罢工,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争取了广大工人群众。

在我们的发动下,进步港商冲破国民党的阻力,开展与北方解放区的易货贸易,大量的药品、胶鞋等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生产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销路。我们在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断被输送到华南游击区。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许多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和完成的。在此期间,我们还发动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等25个经济机构起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以后,我们接收了这些机构的大量资产,其中绝大部分员工也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

参加这次中英谈判后,我被党组织留在香港从事上层统战工作,任中共港粤工委(后改称香港工委)统战委员会委员,港英政府则任命我为渔政司官员,以便于我在港从事渔民和华侨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叙伦、彭泽民、邓初民、陈其尤、李章达、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密切合作,向他们宣传中共中央统一战线思想,批判“第三条道路”主张。1948年秋开始,我

协助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将云聚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输送至解放区，筹备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1948年12月11日上午，我到香港工委副书记连贯家开会（此时连贯已到河北省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正好碰上港英政治部的警察来搜查，他们将我当嫌疑犯逮捕。我被捕后，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方方指示香港工委外事委书记乔冠华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党组织还派人向香港基督教会督何明华及港大校长交涉。当审问我的港英警察知道我的真实姓名后，立即向我“赔礼”“道歉”，责怪我为何不早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随即，他们拿出牛奶和面包请我吃。13日，他们“礼送”我出狱。这次港英当局的行动，实际上是想获取我们输送民主人士的证据和有关资料，打击我们在香港开展的新政协运动，破坏我们输送民主人士的工作，但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我与港督代表的这次谈判已经过去50多年，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关于对香港长期打算、长期利用的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我们将香港作为战略基地，使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的各项工作开展及今天的香港回归，打下了坚实基础。

（高宏的 整理）

追记“一二·一”运动

郑伯克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规模巨大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这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并取得胜利的。

逆流而进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准备在内战期间有可控制的稳固的大后方，于1945年10月3日，指使昆明警备司令杜聿明以军事政变的方式，逼迫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下台，另派CC分子李宗黄到云南省任民政厅长，代理省主席，妄图在云南建立蒋介石嫡系直接统治。李宗黄来云南之前，蒋介石曾多次秘密召见他，要李到云南后消灭民主堡垒、学生运动、地方军政势力等。李宗黄上台后就叫嚣要全力镇压民主运动。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以查户口为名，逮捕进步人士。邮局非法扣留的《新华日报》堆积如山，反共不积极的学校校长被撤职，白色恐怖又严重地笼罩着昆明。

面对险恶的局势，我和华岗商量，要他及时撤离昆明，设在龙云“绥靖公署”的电台也及时撤离。华岗临行

前,我要他向南方局反映:省工委已按照隐蔽精干政策作了可进可退的两手准备,几年来积蓄并发展了力量,在民主运动中,由于有了严密的部署,布置了一线、二线、三线,组织没有暴露,我们当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中“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谨慎地应付各种复杂险恶的局面。

为了以防万一,省工委也作了一些调整和准备。

当时联大已接上关系的共产党员,由省工委分别联系,我联系的有第一支部的袁永熙、洪季凯、王汉斌等同志,以及由他们领导的民青一支;第二支部的马千禾、何志远、齐亮、许乃炯、李明、许师谦、陈彰远(刘新)、李凌等同志,以及他们领导的民青二支部;皖南事变后,没有暴露而留下的郭沂曾由我个别联系;一度疏散出去又返校复学的吴显钺,由我经张文澄和他联系。由侯方岳联系的李祥荣(李德仁),已回昭通工作,由李联系有唐祺尧(陈光远)等仍由侯方岳联系,联大工学院从重庆转来的王世堂、方复由刘清联系。

云大学生自治会是由民青二支部的侯澄负责,云大民青第三支部归潘汝谦等领导,潘由我直接联系。

局势逆转后,由于民青一支部的绝大部分党员和干部不大暴露,仍让他们留校工作。而二支部比较暴露的马千禾、齐亮、李晓、许寿澍等,则转移到滇南等地,民青第二支部重新调整,何志远调昆明市,主要负责中学工作,

李明因病休养,由许乃炯、王树勋(王刚)、侯澄、陈彰远、汪子嵩等组成支委,联大学生自治会于1945年进行改选,程法伋、杨邦祺、李健吾组成常委,程法伋抓总,他属民青一支,杨、李属民青二支。

当时,昆明中学以上学校学生支部的工作,由何志远、卢华泽等分别联系,大学教职员的工作,由殷汝棠等负责。在全市大中学中,党员虽然较少,但民青成员却分布各校,至“一二·一”运动前盟员发展到300多人,全市各大学和35所中学里分别建立了民青的支部,分支部或小组。党的政策、决定,由省工委直接传达到联大一、二支部,再由他们经民青向下布置贯彻,昆明市职工方面的工作,分别由岳文彬、詹猛然(王斗光)、萧松等负责,我分别与何志远、岳文彬、詹猛然等联系,萧松仍让袁永熙继续联系。

鉴于当时昆明处于白色恐怖下,省工委主要采取个别联系,分别交换意见方式,进行组织联系以防敌人破坏。

时 事 晚 会

1945年《双十协定》后,国民党动员80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1月19日,重庆反对内战联合会成立,号召各地成立反对内战联合分会。11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号召国民党统治区的同胞,起来响应

重庆反内战联合会所发起的运动。延安广播在联大、云大等校学生中传播时，许多同学已有组织反内战分会的要求。

11月中旬，我同联大第一、二支部的袁永熙、何志远等同志分别碰头，再同省工委其他同志分别交换意见，都认为应以行动响应中央号召。11月22日，我分别同联大支部及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就全国形势看，抗战胜利后，和平建国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亦为云南人民群众的要求。12月初蒋介石以军事政变改组云南统治，即内战的一种形式，鉴于云南目前局势险恶严峻，既要响应中央号召，又应因地因时制宜，争取合法，开个温和的晚会。遂决定召开一次以反内战为内容的时事讲演会，请几位敌人不注目的教授讲演后，发表一个通电即散会。大家都同意，分头具体布置落实，先在学生群众中酝酿。

11月22日至24日，联大冬青社、文艺社、社会科学研究会、南院女同学会等15个团体，联名请求联大学生自治会，通电反对内战。

联大支部经民青一、二支部向学联提议，以联大、云大、中法、英专4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召开一次时事晚会。4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在25日晚上请老国民党员钱端升教授、伍启元教授，无党派人士、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中国民主同盟成员潘大逵教授讲演，联大党支部向我汇报邀请这4位教授讲演时，我认为这样安排很好。省代主席李宗黄等闻讯，惶恐万状。24日，李主持的云南省国民党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凡

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军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李宗黄并派人前往云大威胁校长熊庆来,要他不借礼堂(即至公堂)作会场,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又函告联大当局,不得举行任何集会。

按照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同联大第一、二党支部同志商量,学生情绪很高,4个教授已请并答应讲话,要尽量避免硬碰硬。党支部经民青一支部王瑞沅与民青二支部侯澄商量,决定将会场移往大西门外联大新校舍,改为以联大学生自治会的名义主办的校内集会。按当时情况,课余校内集会已成习惯,地方政府从未干预,群众认为是不成文法的合法。为稳慎计,让联大党支部经学生自治会请张奚若教授向关麟征疏通,同时也将上述决定向联大当局作了说明,此时联大已收到省府和警备部的公函。代常委叶企荪认为,学生开会一事,“似无劝阻必要”,表示同意学生在校内举行时事晚会。

晚会7时在联大开始,除4大学同学外,有昆华、天祥、南英、五华、联大附中等中学同学参加,还有一部分新联和工盟动员来的工人和职业青年以及各界人士,人数约6000人。大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常委王瑞沅主持,4教授分别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论述中国不能打内战。晚会进行中,国民党中央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派军队把联大新校舍层层包围,多次向会场低空发射冲锋枪、小钢炮,子弹从人头上飞来飞去,群众伏地听讲,讲演照常进行。特务又将电线割断,灯光熄灭。主持大会的立即点燃原来准备好的汽灯,群情镇定,晚会仍坚持下去。这时有一

一个人自称王老百姓，不顾讲演程序，要上台讲话，跳上台后大放厥辞，说是“内乱”不是内战。当时，台下云南昭通籍学生孙志能（党员）就递一个条子给主席台，说此人不是老百姓，是昭通人，叫查宗藩，是云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统局云南调统室主任，大会主持人王瑞沅就在台上揭露了这个特务的真面目，他在群众的怒斥声中被学生纠察队带出了会场。大会通过了昆明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反对内战的通电，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派军队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散会后，国民党当局在会场外面紧急戒严，不许行人通过，约两小时后与会群众才绕道由云大后门进城，至深夜才得回家。

总 罢 课

学生在自己校内举行反对内战、呼吁和平的集会，竟然遭到国民党军队包围并以枪炮进行威胁，这是对《双十协定》规定的人民享有的最起码的民主权利的最粗暴的践踏。时事晚会结束后，学生们无比愤慨，多数同学彻夜未眠，纷纷要求罢课以抗议。联大第二党支部党员、民青二支李凌和吴鸣锵等在新校舍发起要求罢课的签名，当夜签名的达 500 多人，各种抗议书贴在民主墙上。一夜间，学生到处酝酿串联，联大新校舍、南院女生宿舍，联大师范学院都纷纷响应罢课的要求，理学院的学生为响应罢课，凌晨把上课号令敲击的半截钢轨藏了起来。民青第一、二支部及党的第一、二支部先后召开紧急会议，分析

形势,都认为群情愤慨已极,须支持群众的罢课要求。

26日《晨报》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说:“本市西门外白泥坡附近,昨晚七时许,发生匪警。当地驻军据报告,即赶往捉捕,匪徒竟一面鸣枪,一面向黑暗中逃窜而散。”这一造谣,更增加了群众的愤怒情绪,罢课的要求立即传遍全校每个角落。

26日晨,我从住处福照街华兴巷出发到磨盘山黔灵中学同联大第一党支部的袁永熙碰头,详细听了袁的汇报,经考虑,决定支持群众的要求,同意罢课。分析情势的发展,估计云大、中法等校很可能亦将罢课,风声传出,有些中学亦可能响应,如此,25日晚会前的布置,亦将改变,决定由昆明市学联(以联大为首主持)派出联络员到各校联络全市总罢课。接着我去金碧路业余中学与联大第二党支部的许乃炯碰头,再到绥靖路何志远当家庭教师的一个大商人家与他碰头,他们都同意总罢课的意见,并立即向各校传达。我与省工委委员也分别碰头,向他们通报有关情况 and 意见,刘清说,拓东路迤西会馆的联大工学院已于今日中午一致通过罢课。我们估计全市党和民青能够控制的学校约占全市学校近1/2,少部分学校当局属于进步势力,在野的地方实力派以及地方开明人士等,经各种渠道可争取其支持,有些学校还有党员和进步分子当教师,当会发挥其作用。这些力量都用上,约占全市学校的大多数,国民党能控制的学校是极少数,近一年来,党所领导的以联大为中心的学联,在全市学生中已有号召力,只要我们充分发动学生,就能够达到总罢课的目的。

标。

当时昆明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共 45 所(包括中技校), 学生自治会、班联会、报联会、罢委会为党员或民青所掌握的有:

西南联大:王瑞沅(民青一支)、李健吾、杨邦祺(李定)(民青二支)

云南大学:侯澄(党员)、李济昌(李艺群)(民青二支)

中法大学:朱润典(丁江)、陈炳均(安阳)、王健(民青二支)

英 专:万若愚、罗应仙、田培宽等(民青二支)

联大附中:罗广斌(民青二支)

云大附中:温宗姜、阎士颐(民青二支)

昆华女中:徐菊英(徐淑贞,党员)、范映霞、史锡如(史坚)(民青二支)

中山中学:毕恒光(党员)、赵春和(向克勤)、王家栋(王伯林)(民青二支)

天祥中学:张国土、甘娥(甘廷芳)、屈翠云(民青二支)

龙渊中学:杨性聪、张从龙、赵春锦(赵以群)(民青二支)

昆华工校:王以怡(党员)、李云、王绍荣(民青二支)

昆华商校:刘永富、张家俊(吴祺)(民青二支)

昆华中学:王立政、杨益民(均党员)

市立女中:舒莲玉(舒彬)、段菊芬、杨剑辉(民青二支)

学生自治会、罢委会主持人为民青成员，姓名不详者为：

长城中学：(民青二支)

五华中学：(民青二支)

中法中学：(民青二支)

昆华女师：(民青二支)

以上共计 18 所。

学校当局或教师、学生中有党员或民青成员或进步分子者：

金江中学：董事长龙奎垣(龙云之侄)

教师党员：潘明、陆子英(陆光亮)

学生自治会：钱在兴、李培基、唐肇槐、张芸华(进步分子)

求实中学：校长苏鸿纲(民主人士)

黔灵中学：校长汪颂鲁(开明人士)、校务主任孙仲宇(党员)

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刘振寰(开明人士)、校务主持人白麦浪(裴黔农，进步人士，以后入党)

中华业余中学：校长孙起孟(民主人士)、教师许乃炯(党员)

昆华师范：校长倪中方(开明人士)

昆华农校：教师王云(党员)

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党员)

昆
明
大
学
史
料
选
编

建国中学：教师岳世华、郭用（党员）
护国中学：教师宋启华（宋树言，党员）
天南中学：教师何志远（党员）
峨岷中学：小学部主任祁亮珠（祁山，党员）
昆华护士学校：护士、学员吴世华（进步分子，以后参加民青）
惠滇护士学校：外科主任任天锐（任慰农，党员）、护士戴凤仙（进步分子，以后参加民青）
培文中学：教师党员袁永熙等
实用女子职业学校：学生施佩珍（党员）
南英中学：教师，联大毕业生刘克（进步分子）
建设中学：教师屈容（党员）
以上共计 18 所。

属于中间状态者：

明德中学 衡岳中学 市立中学
大同中学 粤秀中学 省立体专
以上共计 6 所。

属于国民党三青团控制者：

云瑞中学 富春中学 中正中学
以上共计 3 所。

26 日起，即由联大、云大、中法等学联常委派出联络

员分赴全市各大中学联络,展开了罢课斗争的高潮。

从11月26日起,每天罢课的学校不断增加,计26日有18所,27日有27所,28日达31所。

联大罢课后,全校班级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授权学生自治会理事会扩大组织罢课委员会。11月28日昆明市学联组成了昆明市中等以上学校罢课联合委员会(简称“罢联”),选举联大、云大、中法大学、昆华女中、云大附中5校为罢联常委,各校学生自治会也相继成立了罢课委员会(简称“罢委会”),统一领导罢课事宜。

《告全国同胞书》

11月26日晨,我约袁永熙碰头时,他交我一份他们起草的《罢课宣言》稿要我审改,我让他下午来取。我回到住处,正巧,南方局派来的交通员王时风来我处,他见着《宣言》稿,建议态度明确地下笔。我考虑,现在理较充分了,但环境仍然险恶,大规模的战斗打响了,要及时休战,把《宣言》标题定名为“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修改后的正文第一部分,指出国民党发动内战违反全国人民意愿,激起全国人民愤怒。第二部分,控诉学生关心国事在校内自由集会武装镇压、造谣诬陷,因此,被迫罢课。最后提出要求:

第一类,关于全局性的:(一)立即停止内战,要求和平;(二)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三)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四)切实保障人身自由。

第二类,关于昆明事件的,要求云南省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一)追究射击联大的责任问题;(二)取消11月24日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三)保障同学人身自由,不许任意逮捕;(四)要求中央社更正诬蔑联大之荒谬谣言,并向与会师生道歉。

第一类全国性的为长期奋斗目标,第二类是地方性的,罢联在《罢委会通讯》里,明白提出:第二类要求得到相当结果后即可复课。

《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在全市已罢课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主持下,由全体学生逐字逐句地充分讨论。

11月26日下午,联大国民党三青团开紧急会议,据建国后查档案,国民党中央直属西南联大分团部书记长姚从吾教授12月11日给陈雪屏的信说:“对罢课不但不能挽救,且只有随声拥护”。“决定采取分化方略。”国民党三青团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重心转移至《告全国同胞书》所提要求,他们在群众中提出:要求重庆、延安、张家口、成都都罢课;昆明、重庆、延安都要反内战;要求罢课第一类第二条改为反对美苏助长中国内战,要求美苏撤退在华驻军。

在联大新校舍,曾以“政治系一九四六级”名义招人签名。参加签名者到27日达350人,联大工学院全体学生26日晚对罢委会所提出的《告全国同胞书》表决时,曾出现138票(赞成“无党无派”主张)对73票(赞成罢联会要求)的比例。工学院驻院代表王世堂向刘清反映,刘清

把情况告诉我，袁永熙也向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并谈到支部认为，为争取多数同学，所提要求建议改为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撤退驻华美军，我当即同意这个意见，并告联大第二支部及何功楷等，决定修改口号。关于停止内战部分，重点说明：谁发动内战，我们就反对谁。其次，反对美国助长中国内战，改为：“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要求撤退在华美军。”理由是任何一个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我们都反对。但现在事实是苏联已宣布撤军，由于中国政府要求延期，苏联才改为延期撤军，而美国却在昆明及许多城市派驻军队，毫无撤退迹象，因此要求撤退驻华美军。修改的要求条件，在联大工学院重新表决。结果，工学院以 109 票对 5 票通过。

11 月 28 日参加罢课的学校都讨论通过后，罢联会以昆明市 31 所大中学校的名义公布了《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

同时，省工委经过交通员把《告全国同胞书》设法送到重庆，再转送到延安。《新华日报》（12 月 2 日）、《解放日报》（12 月 22 日）都全文发表。对所提要求，12 月 5 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这几项要求，实在非常温和而合理”。《社论》暗示南方局同意所提要求。

针 锋 相 对

李宗黄、关麟征等贯彻国民党中央的指示，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妄图把学生爱国民

主运动镇压下去。“以宣传对宣传”，即指使各报发表反动社论：“不是学潮是政潮”，“不是内战是内乱”；国民党中央社又以通讯、读者来书种种方式统发新闻，强令各报刊登，对学生罢课极尽诬蔑之能事。

针对着敌人造谣，罢联会出版发行《罢委会通讯》（由工盟金永康等主办的地下印刷厂印），驳斥国民党诬蔑，指出国民党当局以武力威胁反内战晚会的师生为“匪”，这正好证明国民党当局反对和平坚持内战。昆明党所领导的以及民主同盟的期刊，例如《妇女旬刊》、《民主周刊》、《昆明新报》、《自由论坛》、《人民周报》都发表文章，驳斥国民党的造谣诬蔑。罢委会还开展不听中央社造谣，不看《中央日报》的运动；在近日楼等处张贴罢委会大壁报，并派出宣传队、宣传组，向市民宣传，以粉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李宗黄所谓“以组织对组织”，是指国民党嫡系第五军军长邱清泉 11 月 27 日在小东门灵光街薛家巷警备总部某部召开会议，组成“反罢课委员会”。邱任总指挥，下设行动、情报、破坏、撕毁等组，机构设在如安街三青团云南省支团部。并盗用联大滇省籍以及川陕晋冀鲁等外省籍学生名义，反对罢课。学联争取了多数学生，联大云南同学会发表《驳斥宵小盗用名义发表谎言并告同胞书》，不承认这个所谓的反罢委会；外省籍同学会亦纷纷发表声明否认有所谓反对罢课之事，争取了滇省籍及外省籍学生。

李宗黄等还“以行动对行动”。11 月 27 日至 30 日，

有组织的特务每队 5 人、10 人、30 人、50 人、100 人不等，到处横行，殴打学生，捣毁学校。仅 29 日，学生被打事件就有 25 起，被捕事件 15 起。30 日，联大师范学院、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的壁报及罢委会办公室均被捣毁。

从 11 月 28 日起便有大批武装特务闯入各罢课学校强迫上课。粤秀中学门外架起机关枪两挺，对学生进行威胁；市立中学门外停有吉普车一辆，见学生会负责人即绑架而去；昆华中学则被军人驻扎，关上校门，禁止与外界联络；昆华女子师范亦被关起大门，强迫复课。

11 月 27、28 日，李宗黄以国民党省党部主委名义密令各级党部选派打手并集中到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五分校聆训后，分别化装出发至街头行凶。

各校学生在我地下党员、民青盟员带动之下，团结一致，机智勇敢地向敌人展开斗争。中山中学校长郅重魁威逼利诱学生反对罢课，被学生一致拒绝；昆华女中校长召集学生训话，强迫复课，学生一轰而散，关麟征警备司令部派特务到该校索取罢委会负责人名单，全体学生一致拒绝；五华中学、粤秀中学等校学生密约：如特务进学校时，大家静坐教室，继续罢课；昆华中学、昆华商校照常摇铃吹号，实则没有上课；市立中学、黔灵中学、天祥中学等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把守校门，会客须经过正当手续，以抵制特务入校。

在特务密布的情况下，有的学校组织校工传送信息，有的学校组织附小学生担任交通员，校与校之间，互通情报，联系从未中断。

为了保证街头宣传的顺利进行,避免学生被打被捕事件,罢联将身强力壮的男学生组成若干个纠察队,跟随宣传队行动以保护。

得 道 多 助

李宗黄等的迫害,更坚定了广大学生的斗志。在群众积极性高涨之下,一种“左”的倾向潜滋暗长。此种倾向表现为部分激进学生甚至包括一些党员和民青成员提出“罢工、罢市”等宣传口号;在行动上不同意罢联会复课标准(即第二类要求获得相当结果),主张直至内战停止时罢课方告结束。商校、昆华女中、市立中学等校部分学生一再要求举行游行示威。

针对这种情况,11月28、29日我几次分别同联大第一、二支部以及何志远等同志反复研究认为:我们是地下党,应保存自己发展自己,打击敌人。在当前反动派压力太大情势下,应竭力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不宜硬碰,群众以至党员中高涨积极情绪要爱护,不必过多责备,必须加以启发,以理说服劝导,联大党支部和中学的民青支部尽量说服群众不要游行。29日联大剧艺社演出《匪警》等活报剧,欢迎各中学学生观看。国民党便衣特务集中在翠湖边中央军校第五分校,待机出动,一部分同学跃跃欲试,要求即刻游行。我听到汇报后,立即通知联大党支部经罢联会派人分别说服,因而未发生事故。通过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学生的口号和行动没有超出广大普通群众能够接

受的限度,他们的行动始终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了多数同学。

教授们对学生遭受迫害,尽管有不少人是同情的,但在反动派高压之下,也有所顾忌。联大教授会出于对学生学业和安全的考虑,29日在图书馆前召集学生,劝学生复课,一些教授在谈话中告诫学生说,如继续罢课,将危急学校前途,荒废学业。对教授们出于同情和善意的关怀,学生们是理解的,他们表示,在当前条件下,无条件的复课,将会增加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会使民主运动遭到严重的挫折。事后,罢委会分别访问了几位有影响的教授,向他们说明,学生本不愿意罢课,现在的罢课是不得已,只要当局接受学生提出的一些起码的要求,就可以立即复课。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左派教授更加积极地支持学生,中间派教授态度也有了改变。

11月30日,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发表声明:“认为罢课是正当的唯一的抗议手段”,认为学生“所提的八条不但合理,而且合乎人情,合乎国法。”“完全同情这一运动,声援这一运动!”11月29日,联大教授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书》,认为云南省国民党当局11月25日晚间的暴行“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全体一致决议,“对此不法之举,表示最严重之抗议。”11月30日,联大工学院全体助教捐款法币5万元以支持罢课;针对特务到处殴打学生,捣毁学校设施,联大教职员68人联名发表声明:反对武力威胁,维护学府尊严;维护各种自由;反对内战,要求立

即停止军事冲突；请全国各党各派人士共商国事。

罢课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自罢课以来，罢联会每天都要收到无数的捐款和慰问信。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来信说：“我等受了一班（般）贪官污吏的压迫，只得忍奈（耐）。一定要我去打内战，就是自杀，也绝对不拿枪屠杀自己的弟兄。”联大新校舍门口一个小贩，把他一天卖豆腐干的收入，全部捐出；有一对新婚夫妇捐献了他们的结婚戒指，来信说：“让它干些更有意义的事。”云南省政府有5位下级公务人员来信说：“看见你们罢课，恨不能马上用行动来响应你们，不幸我们所服务的机关是成天灌输只准拥护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因此只有凑了五千元表示声援。”中央电工器材厂一个职工来信说：“野蛮的军事当局法西斯党徒摧残青年，蔑视自由的卑鄙手段，诚令人愤恨之极。”

惨 案

自罢课以来，特务到处殴打学生，形势很险恶。我与联大支部及市里的同志商量，如何复课，结束此战役。而当时学生的情绪很高，反动派的压力越大，学生的反抗越是激烈，社会各界和昆明市民对学生的行动热情支持，极大地鼓舞了学生。

从11月28日起，李宗黄、关麟征等对学生的迫害逐步升级。计29日学生被打事件25起，被捕事件15起，至30日情势更加严重。29、30日中，在武成路、南屏街、华山

西路等处，即发生学生被便衣特务打伤、刺伤、手枪击伤事件多起。

11月30日，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张濯域、中统云南调统室主任查宗藩、三青团昆明市书记长高云裳等密谋镇压学生。三青团云南支团部秘书周绅，率领特务在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演习投掷手榴弹；辎汽十七团用美国卡车满载石块砖瓦，倾倒在联大新校舍墙外；《新华日报》营业处、联大师范学院、云大、中法大学都被武装特务闯入。

11月30日下午，我同联大党的一、二支部负责同志分别碰头，分析情势，认为应作最坏的估计。经罢联通知各校加强戒备，暂停上街宣传，要求同学不要单独外出。

12月1日上午8时，国民党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宗黄在五华山省政府参加卢汉就任省主席仪式后，即匆匆赶往华山南路省党部，同已集中的国民党骨干和便衣特务讲话，他说：学生又向我们进攻了，“这是大家效忠党国的时机，我们要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暴徒们各自携带凶器，由国民党省党部科长杨灿带队前往如安街三青团省团部集合。

国民党省党部一个同情学生的会计员，立刻把这个消息告知云大民青支部一成员，云大党员和民青支部立即向党反映并经罢委会采取紧急措施，并很快通知了联大，罢联会立即决定：整理内部，加强防御，准备战斗。党员和民青成员把秘密材料收藏起来，以防不测。

12月1日上午10时左右，查宗藩率领近百人，暗藏

凶器攻入云大。云大校门大门内有高台阶，同学居高临下，与特务对抗，特务不能得逞。同日上午11时，国民党政政府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学员一百多人由一军官率领，进攻联大新校舍，学生罗纪行、向大甘、张君平等被打伤。暴徒攻击联大大门时，袁复礼教授前来劝阻，竟遭暴徒的野蛮毒打。共产党员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和南菁教师张人鹤路过联大门前，见军人横蛮无理攻打手无寸铁的学生，前去劝告，亦被打伤，于再见一军人正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线准备向校内投掷时，不顾个人安危，强忍伤痛，上前劝阻，手榴弹在其身旁爆炸，于重伤牺牲。

同日中午12时，周绅带领三青团骨干、第五军便衣队数十人向龙翔街联大师范学院猛攻，女共产党员潘琰英勇牺牲。联大同学李鲁连、昆华工校同学张华昌，亦于此时殉难。联大工学院、联大附中、昆华女中、南英中学亦于同日被捣。总计当日牺牲师生4人。被打伤的，教授有袁复礼、马大猷等，还有云大医院护士马静成。共计重伤25人，轻伤30余人。

大 反 击

惨案发生后，全市大中学生群情愤慨，斗志更加高昂。在联大新校舍，罢委会组织学生修理校门，加强巡逻，学生纷纷自动组织起来，参加保卫校园的斗争。工学院吃饭时全院默哀3分钟，向死难同学致敬。昆华、惠滇护士学校学员听到学生被暴徒打死打伤的消息，立即携带药

品到联大主动担任救护工作。郊区龙头村的云大附中学生,全部搬进云大,积极参加战斗。各校原来未参加罢委会工作的学生,现在自动参加了。原来对罢课不积极的学生,现在也积极起来了。

在社会各界的一致谴责下,关麟征到联大假装慰问,道歉。以后又派人送花圈一对,法币 50 万元,棺材两口,被罢联会严词拒绝。当时,关、李之间内讧,国民党与三青团,中统与军统互相推诿责任,凶手中一些人当街互相争吵殴打。12 月 1 日晚,关麟征招待各报社时说,希望大家不要刺激学生情绪。公开横行的特务销声匿迹,反罢委会的公开文字宣传暂时收敛。重庆国民党中央被迫电令云南反动当局:“暂停武力镇压,以免事态扩大。”

12 月 1 日下午,我分别同联大一、二支部的同志收集有关情况,和昆明市何志远等同志碰头,并在省工委会上汇报,我们经研究一致认为:反动派竟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打进最高学府,屠杀师生,这就激发了广大学生的义愤,激起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同情,我们便处于更有理的地位。关麟征道歉,尽管是假意,但也明显表示敌人缺理,乘此敌人互相矛盾时机,我们应当大举反攻,向社会控诉反动当局的罪证,以争取更有利的地位。决定:加强并扩大以学生为主的战斗队伍,争取工人、职业青年、教师及公务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援,利用反动派矛盾,集中一切力量,向以李宗黄、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大举反攻。在宣传方面:公布惨案事实真相,做到有理有据地揭露反动当局残暴罪行,争取社会多数的同情,孤立国民党中央

嫡系的反动派。

为加强战斗队伍,我同联大党支部负责同志碰头研究,调整领导机构,在民青一、二支部执委会中选拔互相未打通关系的党员干部(以民青面目出现),成立行动委员会,负担运动指导责任,实际起党组作用。罢委会设常委,以王瑞沅、程法伋、王树勋 3 人组成,由王瑞沅抓总。另设治丧委员会,以王树勋、施载宣、李新亭三人主持。

12 月 2 日下午,全市大中学 6000 多人参加了烈士入殓典礼,联大代常委叶企荪主祭,联大教授会特推派周炳琳、汤用彤、霍炳权三教授参加。入殓时,大家失声痛哭,有的女生因悲痛过度而昏倒,主祭亦泣不成声。

12 月 2 日晚、3 日晨,我分别同联大第一支部袁永熙、第二支部许乃炯碰头,主要了解入殓典礼情况,我问校门口那些盯梢的,照相的,来回走动的特务是多还是少?他们反映不见了,我认为敌退我进,入殓仅是预演,乘此有利条件,我们更应有把握地大反攻。3 日,袁永熙把第一支部起草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送我审阅,经我稍加修改后,交袁经民青一、二支行动委员会,再经罢联常委提出,全市中等以上学校罢委会分别开会讨论,通过了《昆明市大中学生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在具体要求上,原提第一、二类条件不变,增加第三类,关于昆明血案部分的要求:(一)严惩祸首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二)抚恤死者,医治伤者;(三)赔偿一切公私损失。省工委派交通员将《为“一二·一”惨案告全国同胞书》送到重庆向南方局

汇报，经南方局电台再转送到延安党中央。1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社论指出：“流血的惨剧是绝对掩饰不了的。当局首先应该严惩杀伤学生的凶手及负责人，立刻接受学生的要求，并付诸实施，以谢学生，以平众怒。”

12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说：“对于昆明的学生表示极其真诚的同情，昆明学生与教授的命运，也就是全国人民的命运，我们声援在苦难中的昆明学生与教授，因为他们的奋斗就是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斗争，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

各界的同情和支援

“一二·一”惨案后，教师大多同情学生。12月1日下午，云大教职员发起声援学生的签名，当晚参加的即达71人。他们发表《敬告各界书》说：“对于本市各大中学同学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在原则上表示衷心的同情与赞助”，认为国民党当局“杀死同学多人”，“实开民国史上未有之恶例”。他们“相信同学们反对内战是出乎忠诚，决非一二流言所能诬蔑”。他们“对于那些以反内战而遭逮捕殴打枪伤的同学，谨致由衷的慰问；对于那些横遭残杀的同学，表示无限的哀悼”。最后要求“合理的解决，俾使内战早日停止，学生早日复课”。12月2日联大教职员56人写信慰问负伤学生，同日，中法大学全体教师表示支持学生罢课。

从12月2日起，联大讲师、教员、助教及联大附中教

来信声援。国民党中央军驻昆明工兵某团一群士兵捐款9600元，附慰问信说：“将我们仅有的薪饷，捐给你们，以表示热烈的同情心。”国民党军队中一个陆军上校先后捐款4.7万元，12月2日来信说：“内战是爱国军人的耻辱，昨天野蛮的屠杀，使身为军人的我感到无限的悲痛，为了保持抗战爱国军人的荣誉，现在向诸位亲爱的同学保证，我决不参加内战，且自即日起辞职，绝不去做屠杀同胞的刽子手。”

12月2日，中国民主同盟云南支部声明：对“摧残文化，蹂躏民权，草菅人命之负责机构及其主使人员，再度提出严重抗议外，同时以最悲愤严肃之态度，声援被迫害者的呼吁和要求。”并“请全省、全国、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尊重人权的人士，一致支援”。在“新联”的发动下，职业青年1500人签名呼吁，主张惩凶，抗议国民党当局暴行。在新闻文化界党组织的推动和民主同盟支持下，文化界《民主周刊》、《时代评论》、《昆明新报》、《大路周报》、《人民周报》、《文艺新报》、《妇女周刊》等期刊联合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

12月2日，省参议会召开临时会议，邀请罢联代表报告惨案经过，并决议请国民党政府保障学生安全。

揭露反动派的阴谋

12月1日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社继续造谣，12月2日国民党中央社电称：“第二军官总队一部分学员经

过联大发生殴斗”。12月3日中央社电称：“联大新校舍投掷手榴弹，系第二军官总队第二队学员所为。”但该通讯社12月4日电却说：“联大新校舍手榴弹，系由院内投出，伤军官总队学员一人。”对在联大师范学院投手榴弹案，中央社又说：“系失业军人所为。”中央社还凭空制造出一个名叫“姜凯”的人，说是他指使“失业军人”所为，国民党当局还演出一场所谓“公审”凶犯的丑剧。

针对敌人的造谣，罢联会指出，所谓“失业军人”并非真正凶手，一切罪行都应由李宗黄、关麟征等完全负责。

对国民党“公审”假凶犯，联大学校当局和罢联会拒绝参加“公审”。

为揭破国民党阴谋，省工委从国民党省党部内一下级职员那里搞到一份参加行凶人员名单，经联大支部用街头壁报等宣传品把它公布出来。

为孤立大学，国民党反动派又强迫中学提前放假。12月6日，李宗黄召集各中学校长会议，决议各中学立即放假，通知学生家长负责将子女领回。昆华女中校方强迫学生离校，大同中学停止开伙，龙渊中学破坏分子窃去学生膳团经费，全校一时断炊。对此，我同何志远等昆明市工作同志研究不同情况，采取了对策。各中学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留校，伙食自办，秩序自己维持，或进入会馆或到联大、云大住宿。昆华女中、五华女中、中山中学、昆华工校、南菁中学、天祥中学、黔灵中学、昆华商校等部分或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云大附中、联大附中等绝大部分同学留校工作。利用这一机会回乡的同学则组织农村宣传队，

到云南外县展开援助昆明的运动。

国民党反动派种种阴谋失败后，蒋介石 12 月 7 日发表《告昆明教育界书》，要学生遵守纲纪，诬蔑学生运动“妨害青年学业，贻误建国前途”，最后威胁学生说：“切不可任令罢课风潮再有迁延，一切问题以恢复常态为前提。”否则他“不放弃安定社会之职责”。

罢联会公开回答，给以逐条驳斥。在社会各界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宣布关麟征停职议处，派霍揆彰代理其职务，并派其教育部次长朱经农和联大常委傅斯年来昆明要学生复课。傅斯年一方面欺骗学生，另一方面挑拨中间派教授来反对学生，联大支部及时给予揭露，国民党阴谋失败。

12 月 9 日，卢汉（云南省主席）发表《告各校同学书》，要学生“即日复课”，“静候法律解决”。

同日，卢汉、朱经农、霍揆彰等代表国民党政府邀请罢联会代表谈判。对惩凶等项要求，则说，“将秉承蒋主席意旨办理。”

国民党政府还经过省市农会、省市商会等向罢联之治丧委员会提出了希望早日出殡的意见。

国民党中央社迫不及待地散布谣言：“学生所提条件，已圆满解决，昆明学潮已告结束”。学生中群情愤慨，有部分积极分子提出罢课到内战结束为止的口号。也有少部分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提出不必待复课条件有结果，即可出殡的意见。

针对当时复杂斗争形势，我同联大支部同志、昆明市

同志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在政策上仍应利用矛盾,中立地方势力,孤立蒋介石,争取在适当条件下复课。

我同袁永熙等同志研究后,经他们去向吴晗教授谈,为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中央嫡系的李宗黄、关麟征,对地方实力派应予争取,但必须有条件地争取,吴晗教授支持学生的意见。

12月10日罢联会公布同国民党政府谈判的经过,以反驳中央社的造谣。对卢汉劝复课的盛意,表示感谢;郑重声明:在国民党“中央应负责处理各点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之前,碍难复课。”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现因各界人士前来吊祭者甚多,墓地亦未能如期建竣,公祭日期,必须延长,原拟即日发引,故特延期举行。”

决 策

国民党中央以关麟征的停职,枪决假凶犯等花招来强迫学生复课失败后,又阴谋组织联大教授集体辞职,逼迫云大校长熊庆来,联大常委梅贻琦下台,还准备强迫联大提前复课,云大提前放假,以釜底抽薪的办法来破坏运动,孤立运动。

12月8、9日,我同交通员王时风碰头,我详细谈了运动情况和对策,要他尽快口头报告南方局,因交通不便,他12、13日才成行。14日,我同联大第一、二支部袁永熙、许乃炯、李凌等以及市区的何志远,还有个别联系的郭沂曾等同志分别碰头,对运动发展形势进行了分析

研究,12月初至“一二九”前后,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参加罢联工作的学生,约为学生总数的1/3强,12月10日以来逐渐下降到1/4左右,一部分工作人员已从工作中退出,一部分在职工作人员有疲倦的感觉。不少中间派同学对运动逐渐冷淡,坐茶馆聊天,看电影消遣,成为他们的主要生活。

就整个运动看,14日前参加公祭的已达10万人次以上,占全市总人口1/3以上,捐款近3000万元。

13至15日我翻阅了最近的《新华日报》,就全国各地支援昆明的形势来看,12月9日起重庆3天公祭,成都“一二九”大游行,遵义浙大罢课一小时,运动已达高潮。12月10日以后国内各省市大规模游行、罢课消息已渐减少,各地各界捐款援助昆明罢课的单位 and 人数亦逐渐减少。

12月14日卢汉前往联大吊唁被难师生,《新华日报》在12月15日第二版新闻中有“卢主席招待学生代表经过”消息,报导了学生代表所提条件,卢汉对学生所提条件例如保障人身自由,赔偿损失,抚恤公葬等一一作了答复。我揣测此消息是否有倾向性,有所暗示。中央多次指示斗争策略是有理有利有节,有节,便是适可而止。我担此重任,须谨慎从事。

14、15日,我分别和联大一、二支部负责同志碰头,支部反映几日前派王汉斌、程法伋去重庆,现未返昆,群众情绪正高,目前复课,转弯太急,难于做思想工作。

了解这些情况后,我到了马市口五华坊与《云南日

报》的欧根商量，我们又一同到绥靖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找到周新民、李文宜等同志，互相交换了情况和意见。周谈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他举例说，守卫省政府大门的警卫营是警备部派的，卢汉进出时，警卫战士轻视他，当他面说，“嘿？这个大块头也当起主席来了！”卢汉向霍揆彰提出要把省政府警卫营换成保安团的。周也谈了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对运动的反映，我把当前我所考虑的问题详细地对他说了，对怎样适可而止，他提出停灵复课的意见。他说，这是老百姓的办法，被仇家打死了人，把丧停在屋里，打官司，官司不赢不出丧。

我从周新民处出来，回到福照街顺便到进修教育出版社孙仲宇处找来一本《“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感到要吸取“一二九”的宝贵经验教训。

我决心按照周新民的意見结束此战役。和省工委及联大的同志碰头后，他们都同意了。1946年2月，我在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到此时，中央青委书记冯文彬在场，他插话说，中央很关切运动进展情况，少奇同志当时曾说，是时候了，该复课了。

停 灵 复 课

1945年12月10日，傅斯年主持召开了联大教授会，作出立即劝告学生复课的决议。11日，联大常委会决定并且布告12月17日一律复课，并禁止校外学生住宿校内。学生闻讯，群情愤慨。16日晚，罢联会在联大举行

反内战座谈会，会后举行校内游行，参加者达 2000 余人。到 17 日学生中无人上课。

从 12 月 16 日起，停灵复课的决定在联大一、二支部、云大支部以及中等学校党组织中传达讨论。与此同时，联大一支的袁永熙将复课宣言送我审改后，再交民青一、二支部以罢联名义提出，经党员骨干，再经民青第一、二支部在盟员中传达。12 月 18 日在联大召开的全市大中学罢委会(学生自治会)全体代表大会。全体代表大会通过修改条件，停灵复课。

这时反动派正在阴谋破坏运动，逼迫联大常委梅贻琦、云大校长熊庆来辞职。傅斯年在教授会上主张做出“教授会辞职的决议”，并说他与梅贻琦辞职。闻一多向袁永熙、洪季凯透露了梅贻琦与傅斯年有矛盾的信息，袁永熙和洪季凯请闻一多做梅贻琦的工作。闻一多以老清华关系同梅谈了 4 个钟头的话，告诉他国民党怎样迫害学生，罢课是出于不得已采取的手段，学生有核心领导，他们顾全大局，热爱民主自由，也珍视联大前途，并把运动的来龙去脉就所知道的告诉梅，要他放心，只要在适当的条件下，学生是会复课的。经过这番谈话，梅改变限期复课的主张，并表示愿意支持学生所提条件，积极同政府当局进行交涉和商谈。18 日，云大校长熊庆来的辞职电报，和 90 位教授讲师限学生必须于 3 日内复课，否则“将与校长同进退”的电报同时见报。云大罢委会负责人侯澄、李济昌及时向熊庆来坦诚建议，表示学生保证一定复课，学生爱戴熊校长，希望不要提出辞职，并且告诉他云大教

授中的国民党党棍正在活动校长位置，其辞职电稿是别人从他的抽屉里拿去发表的，请他勿中奸人之计。熊当时感动得流泪。他说现在才知道学生是纯洁的，顾大局，识大体。经过商量，由云大学生自治会致函报社对熊辞职消息进行更正。

联大、云大争取到校方的支持，罢联会把复课条件交全市中等以上学校自治会讨论。12月20日，召开全市大中学校全体代表大会，经过热烈讨论后一致通过。接着，罢联会代表同卢汉、霍揆彰进行交涉，对所提条件，卢、霍等大都接受了。

12月25日，全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自治会（罢委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停灵复课宣言。

宣言发表之同日，《中央日报》等各报刊登了复课启事，内称：本市各大中学3万同学为反内战争民主举行罢课以来，为时已经一月，兹决定即日起，宣布复课。本市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同学在此郑重声明，对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自当继续努力，对罢课以来各界之同情与支援，深致无限谢意。

12月27日，在罢联会号召之下，全市中等以上学校45所全体学生一律复课。全市中等以上学校教师同时复教。

军事学院八年

萧 克

1978年1月,军事、政治、后勤三个学院正式开始办公。三个学院的重新成立,是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后,军队的教育重新被提到战略地位的结果。1977年下半年,军委连续召开会议,作出整顿军队,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决议,并通过了“办好军队院校”和“调整、重建院校”的文件。到1979年,全军共新建33所院校,连同原来的84所,共计117所,大体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同我主持全军训练工作时期的情况也差不多。

1978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会议,是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也是我军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为我们在各方面工作中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思想理论和组织保证。

拨乱反正,有一个艰巨的任务,就是打破“两个凡是”的框框,清除“左”的流毒,解放思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危害我们党长达10年,

他们倡导个人崇拜并设置很多禁区，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当时，在教学上就有两句话：上了书的不能改，也不能发挥；没有上书的不能说，也不能想。这实际上就是“两个凡是”在教学上的框框。我感到，不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不肃清“左”的流毒，不从思想上彻底拨乱反正，是办不好军事学院的，也就不能完成培养高级军事指挥人才的历史任务。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从此掀起了全国性的大讨论，我们在全院也开展了这一讨论。为了取得好的成果，除召开了有各级领导干部、教员、学员和基层分队代表参加的大会外，还办读书班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和讨论。全院举办了师以上干部读书班5期，各部、系分别举办了团以下干部读书班14期。军、师、团领导干部参加学习班的达92%。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联系实际开展讨论，大家从基本原理上弄清了为什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加深了对“两个凡是”错误的认识。

当时，我在全院大会和各期读书班上多次讲话，反复强调了要搞清以下几个问题：

如何看待已有的定论。毛泽东说过，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不能停滞不前。任何定论都不是终极真理，因为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确与否要接受实践的检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它从实践中产生，又必须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发展。凡不符合新条件的定论，就不能拘守。要彻底改变那种不从实际

出发,不注重现状,不注重发展,而把领袖著作、言论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作法。

如何看待党的历史。林彪、“四人帮”惯于采用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他们以宣传毛主席为名,对党的其他领袖和历史人物,一概否定。好像党的历史就是一个伟人的活动,对这种作法我早就从心里反感。我认为,解放思想就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讲党的创始人,首先要讲李大钊、陈独秀;作为缔造者,毛泽东是其中之一。讲井冈山斗争,讲红军打仗,必须讲毛泽东,也要讲朱德。讲历史,既要讲成功,也要讲曲折,既讲胜利的经验,也讲失败的教训。一句话,存真求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历史中获取真知。

如何看待传统。当时,解放思想,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把过去的经验当包袱,不善于研究新情况,及接受新观念。对战略学、战役学不敢研究讨论,一讲战略,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传统和经验是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然要继续,但继承的意义在于运用和发展。如果把红军在江西时期诱敌深入的办法,机械地搬到现在,就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情况。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城市,没有现代工业,一切取之于敌,敌人来了就“坚壁清野,诱敌深入,撒开两手,请你进来”。未来反侵略战争情况不同,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研究新的作战方法。解放思想就是要打破因循守旧,树立创新意识。

如何看待外国的经验。从1958年“反教条主义”以后,就不敢提学习外国经验了,致使多年来对外军的状况

若明若暗。要迎头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必须打破军事上的闭关自守,敢于向外军学习,特别是敢于向敌军学习,“以敌为师”,为我所用。我始终认为,先进的军事技术、现代化的指挥工具和手段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军队都可以利用。今天,我们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就必须了解外军和外国科学技术状况,做到知己知彼,同时更要吸收外军一切有利于我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才能使我军真正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1979年2、3月份,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错误思潮。这些思潮也反映到学院来,但大多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如有些人对地富摘帽、改正错划的右派、退赔“文化大革命”中没收资本家的财物等政策不大理解,担心变右了;有些人把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同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立起来,从而对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到底好不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对还是不对,解放思想应该不应该等,产生了疑虑。

我们在全院范围内反复深入地进行了三中全会精神的教育。认识实现工作重点转移,是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这样用新的眼光去看待党的政策,对解放思想感受很深,敢于想问题,敢于讲真话,思想活跃了。总之,随着学习的逐步深入,也随着党的方针、政策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效果,三中全会的精神越来越深入人心。

但是,当时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军委有位领导人在一次干部会上讲话,说有人反映政治学院有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三中全会的路线,军事学院也差不多。这个讲话传

达后在干部中引起了比较大的震动。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个材料是从哪里来的。后来听说是某报社记者在参加政治学院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听一位学员讲的，他就整理成“内部参阅件”上报了。

为了实事求是地摸清情况，我们在全院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组织了两个调查组，同总政宣传部的同志一起，在机关、教研室、学员队召开了12次座谈会，还听取了10个党小组的思想总结。在此基础上于1979年9月10日至12日召开了党委会，汇报分析三中全会以来在职干部和学员的思想情况。我在会上提出，对于反对三中全会路线的人，要有名有姓，有具体事实，不能估计和推测。经过三天的汇报和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全院绝大多数同志是衷心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有8个同志对于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对于落实政策，对于理论务虚会，有过怀疑，其中有5个人更严重些（有4个是学员）。

会后，我们将全院干部的思想情况向总政治部写了书面报告。对这件事的处理，军事学院党委统一了思想，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件事也使我感到，拨乱反正，解放思想，最重要的还是肃清“左”的流毒，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打棍子、扣帽子，伤害革命同志。

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同时，我们要负责三个学院的落实政策工作。因为三个学院是从军政大学分出去的，而历史遗留问题又都是军政大学以前的。我们在原军政大学复查的基础上，彻底平反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

一些重要的案件，我常常亲自去翻阅材料，分析研究。比如原高等军事学院副政委林浩，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我把他的材料调来看，罪状无非是对“文化大革命”的那套不满。如有个材料揭发他说过“拿着语录像菩萨念经”，还说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像读总理（孙中山）遗嘱一样，还得背下来”。我感到，他说的是心里话，也不夸张。因此，为他平反，还向军委作了合乎事实的建议。

我们除了解决“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外，还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进行了清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因为牵扯到50年代中后期。十二届六中全会前，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始终掌握一条原则：实事求是。

记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为彭德怀平反昭雪，并将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我最先表示同意。当时很多人都感到惊奇，因为1958年“反教条主义”时，使我蒙受的冤屈尚未平反。我认为，不论彭德怀过去对我怎样，庐山会议批他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又置之于死地，都是党内“左”倾错误制造的冤案。既是冤案，就该平反昭雪！

同样，我也始终认为1958年军队“反教条主义”那条思想路线和做法，是错误的。当时，总政虽然撤销了强加于我的“反党宗派集团”、“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表”等诬蔑不实之词，但并没有从政治上彻底平反。我感到，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错误处理了许多同志，20多年来，蒙受

不白之冤,应该让这些同志解放出来。于是,我向中央和军委反映情况,要求平反。在学院中,1978年和1979年两年,先后为756人平反昭雪(其中一部分是错划的右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另一部分是1958年以来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被冤屈的同志)。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工作,也使他们本人和家庭成员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在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我们还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全面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

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为“以教学中心”的口号正名。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还没有明确提出,但对连年不断地搞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上上下下都很反感了。我总感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田,科学家不搞科研,国家就失去了经济命脉;同样,当兵不习武,军人不学军,军队就不成为军队了。而军队院校是搞军政文教学的,理所应当以教学为中心。

“以教学为中心”这个口号,是50年代初提出来的。1951年5月由我主持召开的全军第二次院校会议,明确提出“为了完成教学计划,还要贯彻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军事学院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员成为现代战争中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所以首先要做好教学工作。从校党委到支部必须明确树立一切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发挥组织力量,将所有部门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林彪上台后,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颠倒“红”与“专”的

关系,使有些人产生了鄙薄业务的思想,出现了“抓政治保险”、“抓业务危险”的错误倾向,部队不敢搞军事训练,院校不敢抓教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党的“左”倾错误,不仅砍掉军事院校,还大批所谓“教学中心论”等,把从5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教学为中心”的院校建设的优良传统彻底否定。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许多人仍然不敢理直气壮地抓军事、抓教学,总怕被扣上“单纯业务观点”和“走白专道路”的帽子。

我认为,要从思想上为“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正名,使所有部门和所有人员的精力集中到教学上去,才能恢复以军事为主的教育训练,也才能真正办好军事学院。5月底,我在检查总结开学3个月的工作时明确提出,学院的工作要以教学为中心。这同工厂、矿山以生产为中心,医院以医疗为中心,研究所以科研为中心一样。

我们要求学院各级党委和各级领导,必须以主要精力抓教学和教学保障工作。贯彻上级指示,布置安排工作都不能离开教学这个中心。领导者不仅要做好组织领导工作,还要亲自主持重要教材的编写,担任一些课题的讲授。各机关、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的思想,通力抓好教学。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明确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彻底澄清了政治与军事,“红”与“专”问题上的思想混乱,也使全院人员真正树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从过去以搞政治运动为主转移到以教学为主,学院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

以教学为中心,首先当然要建立一支有足够数量,又有优良质量的教员队伍。

1972年我到军政大学后,开始部分恢复军事课,从部队和地方“支左”人员中陆续调回一些军事教员,但数量不多。1977年底军委决定恢复军事学院,当时给军事学院的任务是1500学员。这样,原有的教员远远不够,我们又从原在院校任教、学术水平和教学能力较高的同志从其他岗位上抽调回来,继续任教员,同时也从部队选调了一些文化程度高,有一定学术水平的年轻干部充实教员队伍。这样就解决了教员的数量问题。

新的教员队伍组成了,一方面通过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使之热爱教学工作;一方面在调家属和住房等生活方面给予关心和照顾,使他们安心工作,而更重要的则是从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和施教能力上下功夫。

提高学术水平,主要从两方面下手,一为提高专业知识,二为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前一方面采取4条措施:一是以老带新,以强带弱。我们有一批老教员,在院校工作多年,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让他们带新来的教员,在实践中提高。我一再强调,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学科带头人,每个学科都要有二至三个热爱教育事业、精通业务、有实践经验的同志。他们是学术研究、编写教材及教学的骨干,由他们把教研组整个教研室带动起来,整个教员队伍就活了。二是在学术研究中提高。编写一部教材,研究解决教学和部队训练中的一批难题,教员水平就会提高。我们

经常结合教学活动和编写教材,召开学术讨论会,举办学术报告会,在总结工作中探索学术,使教研人员从中得到提高。三是组织教员到部队调查研究,参观见学。通过参加部队训练、演习和作战指挥,学习战役、战术训练经验,熟悉武器装备性能,以提高教员教学水平。四是有计划地送本校或军兵种院校培训,以及采取兴办讲座和报告会的办法,扩大和更新知识。我们先后请了钱学森、华罗庚、朱光亚等著名科学家和各军兵种专家来作各门学科最新发展的报告,使教研人员拓宽了视野,开阔了思路。

在抓教员队伍时,造成尊师重教,讲求真才实学的风尚,制止弄虚作假,投机钻营的坏风气。我对教研人员提出两条:一是要达到“两通”、“六能”。“两通”就是通晓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基本著作;通晓古今中外著名的军事理论和战史中著名的战役、战例,熟悉敌军战略、战术特点。“六能”是能有较高的专业理论和现代军事科技知识;能出色地完成本专业的各门课程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能组织团以上规模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演习;能独立编写高质量的专业教材;能独立地解决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疑难问题;能写会讲。“两通”每个人都要达到,只是深浅不同而已。“六能”不要求条条达到,至少要达到三四条。

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仅对教员而言,也包括在学院工作的全体干部和职工。因为作为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要求所有的教职员工都应具备高层次的知识结构。1982年9月,院党委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还

专门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分期分批为没有达到高中文化的干部、职工补习文化。到1985年,全院600名45岁以下干部及年轻职工全部达到高中文化水平。

在结束补习高中文化以后,我们又对全院干部提出新的要求,45岁以下干部到1990年都要具备大专以上文化水平,教员还要掌握一门外语和电子计算机技术;45岁以上干部,结合自己的工作任务,学习军事科学技术知识、现代管理、军事、政治理论等。要求二级部和学员队的干部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员,由1985年43%到1990年达到90%以上,教研室的领导干部,由66%达到100%。

为了给干部创造学习条件,学院于1984年成立了自修大学,开设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军事大专班、干部进修班、电子计算机班、外语班等14个班次,有640多人参加学习。

全院教员和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文化,提高文化水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风气。各部队来的学员一到校,在这种空气熏陶下,也都认真学习,努力提高。这也就是“水涨船高”了。

有了好的师资队伍,还要抓好教材编写工作。军事学院成立后,教材几乎是白手起家:有的课程没有教材,有的教材是50年代编写的,许多内容已经过时了。编写和修定教材是开展教学工作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我们首先抓基础教材的编写,把教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院领导亲自组织编写审定;第二类由训练部和政

治部牵头编写审定；第三类由各教研室负责编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共编出从营到集团军的合成作战战术教材162种，军兵种教材12种，政治教材34种，科技教材29种。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编写了全军通用的8本战术教材：《陆军师坚固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野战阵地防御战术》、《陆军师热带山岳丛林地带防御战术》、《陆军师海岸防御战术》、《陆军师反合围和突围战术》、《陆军师反空降战术》、《陆军师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战术》等。另编全军通用的8本战役教材：《战役学总则》、《阵地防御战役》、《城市防御战役》、《抗登陆战役》、《反空降战役》、《运动战役》、《阵地进攻战役》、《登陆战役》等。这两套教材不仅解决了教材配套问题，而且结合未来战争的特点，吸收全军学术研究成果，解决了多年遗留的许多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质量较高。

编这么多教材，也不容易。但我们有人才，有胆量，我深信中国一句古语：“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军事学院不是十邑百邑，而是千邑万邑，是中国军事理论人才集中的地方。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两千年前就写出了《孙子兵法》，在我党领导下打了那么多胜仗，要敢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写出新的《战略学》。从1979年开始准备到1983年5月，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编写出了全军第一本《战略学教程》，接着又编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这本战史对中国战场专辟章节，详尽地叙述了中国人民8年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重大贡献，这在所

有战史书中也是第一次。

编写的教材注意突出现代战争的特点,根据培养高层次军事人才的要求,强调合成训练和合成作战。无论是战役教材,还是战术教材,都是合成本,既有陆军内兵种的合成,也有陆、海、空各军兵种的合成。作战指挥和部队行动,既有指挥员的活动,也有司令部的工作;既有军兵种的任务,也有后勤的协同,使战役战术与司令部、军兵种、后勤融为一体。

高水平的教材是建立在有一定高度和深度的学术研究之上的。学术研究对教学有两个直接作用,一是促进教研人员知识的提高与更新;二是以新的知识来充实提高教材的质量。从军事学院成立起,我们一直把开展学术研究,作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学院一成立,就组成了军事、政治两个学术委员会,任务是审查学术规划 and 年度计划,组织重要课题的学术攻关,统一教学中重大学术观点,审查重要课题的教材,审查学术成果,决定奖励等级等。前述教材的成果,就是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号召下产生的。

学术研究要有重点,我提出学院的研究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解决教学中急需的学术问题,直接为教学服务。当时教学和训练中有急需解决的 200 多个问题,分配到各教研室,组织教员研究,研究的成果直接体现在教材和施训过程中,用教学带动学术研究,以学术研究促进教学。二是着眼发展,着眼未来,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军事科学,学习如何打赢现代战争,诸如现代条件下如何使

部队保持生存能力,增强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合成作战能力,加强后勤保障能力等,还要对未来战场进行设计和研究,包括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军队的技术装备、编制、指挥、战略指导等的推断和论证,等等。

我对研究人员提出,要有胆有识,有胆就是要有独创性的见解,对于出现的新事物要敏感。有识就是要有知识,知识渊博,视野就开阔,想像和逻辑思维能力就越强,越会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

为扩大学术研究队伍,我们除了发挥教员的作用外,还让有研究能力的机关干部参加学术研究。同时发挥全军校友的积极性,吸收他们参加学术研究,有时还把重大题目通报全军,征集研究人员。

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以刘伯承名义设立学术奖。刘伯承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自身有丰富的战争经验,又从古今中外的军事典籍中吸取广博的知识,学习勤奋,运用灵活,为人谦虚,深得全院教职员工的崇敬,所以用他的名义设学术奖。我们在校内筹集10多万元,建立刘伯承学术奖励基金,以银行利息为奖金,奖励学院忠诚于教育事业并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的教员、研究员、学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1984年7月,军事学院召开了学术研究成果授奖大会,对1978年以来学术研究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在这段时间里编写教材427份,教学参考资料210份,学术文章和专著771份,翻译资料193份。从这些成果中评出一等奖3篇,二等奖20篇,三等奖176篇,共199篇,占参评

作品 12%。颁奖活动对全院学术研究工作是很好的推动。

1982 年马尔维纳群岛之战,是一场海空立体战争,使我们看到了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对战争形态的改变,看到了现代战争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也使我们更深切地感到加强学术研究的重要和迫切。为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把原属于训练部的理论研究部升为大部,统管全院的学术研究工作。研究部作出近期和长期研究规划,提出措施,列出题目,组织攻关。

战略学是军事学院的主要课程之一。为了以先进的研究成果带动这门重点课程的教学,1985 年 5 月我们又成立了战略研究所,以研究战略为重点,广泛研究全球和地区性的战略问题、世界各国的国家战略、国防政策、军事战略和几个主要军事集团联盟战略,以及与战略有关的重要学科。

军事领域是对科学技术成就利用最多、最快的一个领域。组织学习高科技知识与建立现代化的教学设施,是院校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特别是 60 年代以来,以核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等一系列新技术为重要标志的现代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对军事与战争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军事思想、作战理论、行动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过去打仗主要靠轻武器,就是在抗美援朝中,飞机大炮也不多。建国后我们建立了军事工业,生产坦克、大炮、飞机等重型武器装备,开始正规训练、研究现代战争问题。但一“反教条主义”,把

这些都冲了。十年动乱，教育训练和学术研究都处于停顿状态，使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本来就有的距离更加拉大了。

未来战争不仅是双方人力、物力、财力的较量，也是新技术的较量。高新技术的运用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标志。使用武器的人，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知识，就不能掌握并发挥武器装备的效力；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不具备广泛的军事科技知识，就无法指挥现代战争。为此，军事学院一成立，我们就提出要努力学习高科技知识，并从全军选调军事科技人才，组建军事科技教研室。在总课时中用10%的时间对学员进行军事科技教育，介绍核武器、导弹、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军用卫星、电子对抗、夜视、激光、传感侦察技术、统筹法、运筹学、军事气象学，以及电子计算机、自动化指挥和未来武器发展趋势等。此外，我们还举办军事科技学习班，让全院在职人员，包括院领导、训练部领导和所有教研人员，分期分批参加，补上军事科技这一课。

实行教学内容的现代化，必须要有相应的现代化教学设施和设备，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物质保障。军事学院成立时，我提出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解决电化教学问题，一是课堂教学设备现代化；二是应用电子计算机搞作战模拟；三是建立一套作战指挥自动化系统。自己做不了国内又买不到的就从国外进口。到1985年建立了投影幻灯、闭路电视、电动图板、复式幻灯等课堂电化教学设备，还开发出了电子计算机大屏幕模拟团坚固阵地防御、电

子计算机辅助首长司令部对抗演习及集团军防御战役教学等现代化教学设施。

1985年我们又建起了一座具有相当规模、设备完善的图书资料馆。我认为，军事学院必须建立一座好的图书馆，才有利于工作。军事学院要开展对现代军事科学的研究，对与军事有关的各学科的综合分析，要及时了解外军的情况，必须有供教职员工使用的图书馆。为此，我向有关方面多方请求，使更多的同志理解和支持。图书馆1985年建成，1986年投入使用，后来一些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参观，都对我们图书馆有赞慕之意。

担任军事学院院长期间，我在考虑如何把军事学院办好的同时，对全军如何建立起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面向世界，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院校体系，也作了些研究和思考。

1978年和1980年，我先后出访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当时我是以国防部副部长的身分作礼宾性访问的，但我在访问时注意对这些国家军队特别是院校作了调查研究。看到许多国家都把办军事院校看作是对未来战争的投资，把它摆在三军之首，选拔著名的军事将领主持院校工作，学校的体制都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凡担任军官的，都经过院校培养；凡军官要提升的，也要经过相应院校深造。尤其是注重军官的科学文化教育，如美军军官学校要学习与军队有关的大学课程，经考试毕业，达到大学程度，才能担任军官。由于基础打得好，各兵种军官，可以交叉调动，部队军官及院

校教员及机关参谋,定期交流。服役期满退役,都可以在社会上担任职务和找到职业。

我感到,外军的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我军院校主要是基层院校,培养人才的角度太窄,没有很好地考虑军队发展的需要,更没有考虑干部退出现役以后国家建设的需要。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绝大多数干部文化科技知识太低,对我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很好地运用和掌握;另一方面,大量超编干部,转业到地方不受欢迎,文化水平低是原因之一。同时,在干部提拔使用上由于不强调院校培养,盲目性很大,加上没有严格的制度,给不正之风造成了可乘之隙。

我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提高军官培养起点,建立严谨的教育体系,初级、中级、高级指挥院校和专业技术院校,必须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学科和课程必须与学员未来担任的职务相适应。将来培养出的干部,第一有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和使用新装备的知识;第二转业后能胜任四化建设多方面工作的需要。一句话,既能治军,又能治国。

为此,从1980年起,我多次向老师们汇报请示,争取他们的支持,经常与一些高层领导研究,并得到他们的理解。我多次在军委机关总部召开的一些会议上大声疾呼,还以书面形式向军委陈述我的意见,提出改革军队院校教育制度的具体建议,主要是:

把基层军官培养成大学水平。从现在起把基层院校逐步纳入大学教育轨道,学制为4年,以大学层次为培养

目标。学员毕业发大学本科文凭,这样就做到每个基层军官都具备大学文化程度,全军干部的文化水平就提高了。

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请专家论证,提出4年制陆军初级指挥学校科学文化课程设置方案。用60%至65%的时间学习大学的基础课程(理科、文科、外语等);20%至25%学军事(学会使用营以下兵器技术,学会从单兵、单车、单炮到营的战术,养成教育和体育训练贯穿学习始终);15%学政治(党日在外),如果加上党团日时间则政治活动时间占22%强。地方大学政治教育为10%,考虑军队的特点,应加强政治课的比重,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史、军史和政治工作,党的基本路线和时事政策等。

采取这样的教育制度,干部的基础打好了,干部文化科学知识和业务水平高了,也就解决了我军干部工作长期存在的难题。干部知识面宽,工作适应性就强,在部队、机关、院校以及军兵种之间交流,能很快地熟悉业务,适应工作。如果转业到地方也会有较强的适应能力,成为国家建设人才。

改革教育制度,也受旧的习惯势力影响。有的看不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军队已经成为知识密集的社会集团,对军人的素质要求更全面了,特别是对军官的要求更高了。说什么战争年代没有进学校学习还不是照样打胜仗,这些同志既没有看到变化了的情况,也没有看到那时领导我们打仗的人都是有学问的人。毛泽东、周恩来、朱

德、刘伯承、叶剑英和许多领导人都是懂政治、懂军事、知识渊博的人物，许多是经过国内国外军事、政治或其他学校培养出来的有学识的高才。是他们指挥我们打胜仗的，我们也是在他们教育培养下学会打仗和治军的。

另外还有一点，我党我军历来就重视办学校培养人才。不论战争多么频繁、环境多么艰难，我们的军事学校、随营学校、教导队等一直没有间断过。今天，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军队的作战指挥和训练管理变得异常复杂，干部不进学校培养很难具备全面的素质和技能。

1980年3月，我在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就着重讲办好学校是训练好军队的先决条件，是战略问题，关系到我军建设的全局。要办好学校，一要思想上重视，二要多下点本钱，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应多支持和保障学校。根据现代战争的要求和未来战争发展的趋势，必须建立起完整的院校体系。学校要上下左右相衔接，不遗漏，不重叠。基层指挥院校学制为4年（海军、空军为5年），中级为2年，高级为1年或2年。要大力提高干部的知识水平，尤其是基层学校，要根据现代战争对干部科技文化知识的要求，设置必要课程。干部的使用要同学校培养挂上钩。

1982年底，在为召开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作准备时，我又提出三个问题：

一、院校训练体制。全军指挥学校要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重申了各类基层干部要由军事院校培训和各级主官须经相应院校培训的制

度。建议从1983年起,步兵排长一律由陆军学校培训。指挥院校实行三级制(陆军学校训练尉官、高级陆军学校训练校官、军事学院培养将官),专业技术院校两级制。地方能办的院校军队尽量少办,如医务学校,可招收地方医科院校毕业生到部队服役。

二、从1982年起,用7年时间使全军基层指挥院校达到大学水平。

三、办好学校要舍得下本钱。在人力上,要把优秀干部调去办院校,教员要在全军范围内选调;学员要择优选送,学校有淘汰学员的权力。物质上,保证训练经费、图书资料费等,新式武器装备优先发院校。

1983年,召开全军第12次院校会议,我在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根本问题是办好院校,培养干部。我认为,当今时代在新的技术革命浪潮下,国防建设和军队作战变得越来越复杂,对战争驾驭者的素质要求空前的提高了,培养一支军政素质高,专业技术造诣深,指挥能力强,知识渊博,完全适应现代战争要求的军官队伍,是搞好军队建设和进行胜利战争的关键。

各国都非常重视军官的培养,干部训练主要靠院校,这是各国军队建设中的一条共同规律。我列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各国办院校培训军官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的重要。苏联在卫国战争中,战事那么紧张,还坚持干部要经过院校培养,只是缩短学制,训练强度加大。仅总参军事学院就培养了1354名中高级指挥员,对卫国战

争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我军有自己的长处及特点,但在办好军事院校与军队现代化的关系上,在干部队伍的结构上,则与外军有许多共同的规律。我军应该借鉴。

在这次会议上我还着重讲了提高干部科学文化水平的问题。我感到我们的领导干部,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工作也很努力,但有些人文化水平低,科学知识不够,与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不相适应。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我军将有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人才的培养是比经济建设周期更长的“基本建设”。如果不从现在起抓紧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尽快改变我军干部队伍科技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就会延缓我军的现代化进程。一句话:“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忧辱”。应该只争朝夕,尽快起步。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行的。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和智谋不断运用于战场的历史。缺乏知识的军队总免不了要吃亏。日俄战争时,速射武器的威力早已显露出来,而俄国军队仍采用密集队形冲击,结果遭受大量杀伤。列宁在1905年1月写的《旅顺口陷落》一文中,对沙皇俄国军队失败原因作了生动的论述。他说,尽管俄国用“亿万卢布购置和建造顶好的军舰”,但由于“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不熟练、缺乏训练的人”,“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的”。“因为现代战争和现代技术一样,要求质量高的人才”。这就说明科学

文化知识对军事现代化建设何等重要。有了好的武器装备,还要通过有知识的人去使用、管理,并运用于各种战斗活动中,才是真正现代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能不对干部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出严格的要求。陈毅说过一句很好的话:“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文化,就和1927年需要军队一样。”这句话有多么大的现实意义啊!

经过许多同志的努力,从1982年开始全军部分初级指挥学校纳入了大学教育的轨道,开了一个令人快慰的好头。

1985年国防大学成立,我从军队训练教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还是认为,对于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乃至整个民族,文化是重要的。这个思想,我和不少同志交换过。现在,在回忆录中,把这个问题记下来,以备对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志参考。

南昌起义军主要领导人、 部分参加者脱险行踪考

王 玉 强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军迅速南下广东,准备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北伐。由于反动势力过于强大、起义军没有集中兵力等诸多因素,起义终归失败。在这一过程中,起义军主要领导人、部分参加者脱险行踪如下:

1. 朱德、陈毅一部

起义军南下至广东大浦县境内时,根据前敌委员会的指示,朱德率军官教育团和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共约4000人留守三河坝,监视、阻击梅县之敌,主力则南下取潮汕。

10月6日,朱德率部与敌激战三天三夜后,撤出三河坝,南下至饶平茂芝时,与起义军主力余部会合,方知潮汕失守,主力失败。朱德只好带队离开茂芝,“又折转北上,在武平旧城和敌人一个师打了一仗,然后转到江西安远县的天心圩。”^①

10月底,朱德率部转战到达大庾,“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同时,把所有的人合编为一个纵队”^②,称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纵队共800余人,编为7个步兵连、1个重机枪

^① 朱德同陈奇涵、杨至成等同志的谈话纪要,1962年6月,见《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4页。

^② 同上。

连、1个特务连。纵队主要成员有：纵队司令朱德（化名王楷）、政治指导员陈毅、参谋长王尔琢。林彪担任其中一个连的连长，粟裕任五连指导员，以及杨至成、赵尔陆等人。朱德部队后来到了崇义县上堡，进行了一个时期的整训，期间与伍中豪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一个营会合。朱德等人在滇军石范生部隐蔽休整了一段时期后，发动了湘南起义。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在井冈山会合。

2. 周士第、李硕勋、陈兴霖等人

周士第是第二十五师师长，在朱德率部到达天心圩时，他离队出走。对此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私自脱离。

第二种说法是受党委委派。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讲到，朱德、周士第所部“及退至信丰时，兵士疲倦已极，士第等又未得着党的指导和消息，虽然派赵自选去，恐亦未曾赶上。因此士第及三个团长与李陶等均先后离队他去（闻系该军党部决定的）……”^①

对于这个报告的来源，聂荣臻曾回忆说：“关于二十五师的情况，在我抵达香港不久，二十五师的杨心余来到香港，他向我汇报起义失败后这个师的情况……周士第等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周士第同志不久来到了香港）”^②。可见，聂荣臻的报告是基于杨心余的汇报而写的，况且周士第不久就到了香港，与组织取得了联系。

杨至成回忆说，在天心圩，朱德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他说：“同志们，你们的师长、团长我派他们去执行任务去了”^③，至于什么任务，没有详细说明，总之讲明周士第是被派出去的。

^① 聂荣臻：《南昌起义失利后部队情况的报告》（1927年11月4日），见《聂荣臻军事文选》，第5页。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75页。

^③ 杨至成：《艰苦转战》，参见《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9页。

周士第自己曾回忆说,我离队是在天心圩,当时部队总还有一两千人。我是和党代表李硕勋一块走的,去找党去^①。他还在一首诗中写道:“义举南昌,战鞭粤闽,分途找党,话别天心。”这首诗在周士第1964年5月写的《李硕勋烈士》材料中也有提及^②。

1928年1月,周士第在香港找到广东省委负责人李立三,汇报了情况。由于身染疟疾,周士第到了马来亚治病。1929年冬,他在上海参加了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后在十九路军工作,参加过上海“一·二八”抗战和“福建事变”,直到1933年12月底才脱离第三党奔赴中央苏区。1935年10月,周士第重新入党。但1979年7月,中央军委批准的《周士第悼词》中,他的入党时间是从1924年他第一次入党算起的。悼词中还说,周士第在“南昌起义以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③。

李硕勋起义时任第二十五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10月底,受第九军党委委派到上海找党组织。找到党组织后,他被中央委任为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担任白区工作。他的离队,大家的说法还是比较一致的:受党委派找上级党组织。

陈兴霖(陈子坚)起义时任第二十四师政治部主任。潮州失利后,东渡韩江,在饶平附近与朱德所部会合,“一天行进到信丰以东的一个村子,朱德找我说,武汉上海你都熟吧?我说都呆过。他说,我打算派你去找党组织,报告我们部队离开广东后一直到现在的情况。这些情况,你都经历了。为了保密和安全,不必写信了,你务必在九江、武汉和上海等地找到党组织,找到党中央更好……”^④。陈兴霖离队后先到赣州,再乘船到南昌,经九江、武汉,后到上海。不久,他找到了党组织,汇报情况后留在了上海。

① 周士第1979年3月20日谈话,参见《南昌起义研究》,第514页。

② 《南昌起义研究》,第514页。

③ 197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④ 陈兴霖:《南昌八一起义回忆》。

3. 林 彪

林彪当时任第七十三团七连连长，在行军途中曾找到陈毅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天心圩军人大会后，他脱离部队向梅关方向而去。但因为反动民团沿途紧密搜查，找不到出路，林彪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4. 董朗、颜昌颐一部

在朱德率部留守三河坝时，叶挺、贺龙带领起义军主力部队在9月下旬攻占潮汕，经揭阳向汤坑西进。留守潮汕的少数部队在敌人围攻下损失惨重。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在第七十团团长董朗及颜昌颐率领下，“经甲子港到海陆丰，图与农民结合”^①，后该部改编为红二师，董朗任师长，颜昌颐任党代表，成为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的主力军。

5. 周恩来、叶挺、聂荣臻、杨石魂

叶挺、贺龙的主力部队在汤坑前线失利后，加上潮汕失守，指挥机关与作战部队脱离，整支部队处于混乱状态。叶、贺率主力余部与前委机关在普宁县流沙会合，于10月3日召开流沙会议，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向海陆丰撤退，作长期的革命斗争。起义军主要领导人在地方党组织下纷纷撤离。

一直与周恩来、叶挺在一起的聂荣臻回忆说：“我们没法找到杨石魂同志……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

^①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

我们出海。”^①

到香港后，杨石魂将周恩来安排下来治病后就走了。聂荣臻同广东省委接上了关系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后来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就把家属从上海接到香港”^②。这中间，叶挺实际上回过上海，李维汉负责的组织部和秘书厅曾接待过^③。叶挺到上海后又受中央委派回香港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工农红军总指挥，但他只是在暴动当天晚上才赶到广州。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长期侨居海外。

周恩来由于患疟疾，行动不便。据聂荣臻回忆，他们是从甲子港上船到香港的。但据当时中共陆丰县南塘区委书记黄秀文回忆是由金厢港乘船赴港的。“一九二七年十月初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一封由秘密交通站转给我的信，里面写着：‘我陪同两位负责同志来到南塘，拟在金厢雇船去香港，希你设法完成这个任务。杨石魂’”^④。“当时共有五人，即周恩来、叶挺、杨石魂同志，还有两位同志我不知姓名”^⑤，这不知姓名的两位同志中的一个必定是聂荣臻。周恩来被转移到金厢洲仔黄厝寮村，后到溪碧村养病。“在溪碧住了一个晚上，随即又转移到金厢黄厝寮，在黄秀文同志那里住下。这时船也搞到了……并已开来洲仔对出的海面停泊，当晚我们从洲仔布置好，用小艇把周恩来、叶挺、徐成章等同志一起护送上‘浮雕’船后，杨石魂同志要我和他一起把总理一直护送去香港”^⑥。“全国解放后，一九五一年

①②《聂荣臻回忆录》上，第73、74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76页。

④⑤黄秀文：《难忘的日子——记一九二七年周恩来同志到陆丰》，载《工农兵》1959年第8本。

⑥ 刘志远：《关于周总理一九二七年经陆丰转去香港的经过情况的补充调查》，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3辑，第19页。

的秋天，周恩来同志还特地派人到陆丰寻访黄秀文他们，表示问候”^①。“周恩来同志在黄秀文家住了半个月，船工通知可以出海了。一天傍晚，周恩来、叶挺同志在黄秀文同志护送下从金厢州渚村上船”^②。

周恩来到香港后，治病之外，还参加了广东省委会议。“十一月初，广东省委召开研究有关广州暴动的重要会议，他决定参加，我陪着他去。……周恩来同志在养病期间，和我谈了‘八一’南昌起义的经过，谈了‘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他还告诉我是叶挺、聂荣臻、杨石魂等同志和他一起来香港的”。“周恩来同志参加省委会议不久，因工作需要，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会议”^③。周恩来参加完广东省委会议后，接到中央举行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的来信，“通知恩来务于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④。“那天，只有我和杨石魂同志送周恩来同志上船。是在九龙深水埗上船的”^⑤。

周恩来回到上海后，即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1931年止^⑥。

6. 刘伯承、贺龙、林伯渠、廖乾五、彭湃夫妇、徐以新、文曼魂

据林伯渠回忆，他“跑至惠来县流沙开会，准备到海陆丰去。就在这时候，我们已陷入重重包围中，只得遣散残余的部队，与贺龙、刘伯承、彭湃诸同志化装逃至香港，时已11月。”^⑦

① 《回忆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2辑，第31页。

② 《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第56页。

③ 范桂霞：《永世难忘的经历——从护理周恩来同志到参加广州起义》，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7辑，第251页。

④ 《中央致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信》，1927年10月23日。

⑤ 范桂霞：《回忆周恩来同志一九二七年在香港养病的经过》，见《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第10页。

⑥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纪录》（1946年9月），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辑，第14页。

⑦ 《林伯渠自传》，见《人物》1982年第2期。

1
3
E
2
1
年

徐以新回忆说：“我随贺龙、刘伯承、林伯渠、廖乾五、彭湃夫妇和文曼魂等带二三百名战士冲出重围后，到了神泉港附近的一个村落。贺龙同志要部队与地方党取得联系，坚持斗争，设法回到湖南，待他到上海后，再与他们联系。我们与部队分手后，即由彭湃同志带到一个地下关系人家，换装扮成广东的老乡和中小商人模样。……我们到神泉港后，又由彭湃通过地下关系，租到了一条可载百十人的大渔船，在海面走了三四天到达香港”，然后分四路换乘小船进港上岸^①：

贺龙、刘伯承与一个警卫员一路：到香港后二人由地下党交通高天波安排与吴玉章同住。10月下旬，贺、刘二人乘船抵上海，与中央取得联系。

贺龙于1928年1月受中央委派重回湘鄂西，拉队伍打游击，搞土地革命。

刘伯承于1927年11月受中央委派赴苏联学习，进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因成绩优异被提前推荐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

林伯渠、文曼魂和一个警卫员一路：林伯渠到香港后，因不能继续在国内工作，受党派到莫斯科去。“先至上海，经党中央指定与蔡和森、李立三、张国焘同往”。因两次在沪上船未果，便只身一人转道日本到海参崴，经远东到达莫斯科。1928年秋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②。

彭湃夫妇和一个警卫员一路：进港后，彭湃于1927年10月15日参加了南方局及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担任南方局委员。会后被派往闽南，旋即返回香港组织海陆丰第三次武装起义，领导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

廖乾五（起义时任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第二十军党代表）、徐以新和一个警卫员一路：到港后，根据上级指示，廖乾五要徐以新与

^① 访问徐以新，1979年2月13日、16日。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存原稿。

^② 《林伯渠自传》，见《人物》1982年第2期。

吴明、许继慎和湖南的女同志做收容工作。

廖乾五由香港返回上海，住在新大沽路，与中央取得联系。1927年10月上旬，廖乾五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小组组长，主要从事机关内部工作。

徐以新后来到上海，接上关系后被派往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7. 张国焘、李立三、贺昌

张国焘在10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他到流沙开紧急会议，“而又为敌所截击，我军遂一败不可收拾，弟等即于是处四散逃至海边，雇民船逃香港矣”^①。

张国焘、李立三、贺昌等人离队后进入甲子港，然后雇民船逃往香港。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其他同志所采取的逃难途径，多少是和我们相似的。……周恩来、谭平山、贺龙、叶挺、刘伯诚（承）、郭沫若、恽代英、林祖涵（伯渠）等也在这一两天内先后离开部队，从海上逃向香港上海”。

张国焘等人在香港与地下交通取得联系后即分头行动。

张国焘不久乘船赶往上海，在《我的回忆》中，张国焘写道：“李立三这时也到上海了，他是不是和我同乘一艘船，我不知道”，他们在李维汉的住所内相遇。1928年5月下旬，张国焘经大连、哈尔滨、满洲里、远东，到了莫斯科，参加了中共六大。

李立三在香港参加了南方局及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作长篇发言，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八一”革命的经过与教训》一文。11月初，他与林伯渠一同赶往上海，参加了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李立三受命赶赴香港，恢复并主持广东省委工作。1928年5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①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载1927年《中央通讯》第7期。

贺昌在香港与有关同志共同组织营救、接待起义军同志。11月18日,以广东省省委常委名义参加在香港召开的省委会议,筹备广州起义。年底,奉中央命令前往湖北工作。

8. 谭平山、吴玉章、姜济寰、姜治芳、吴鸣和

流沙会议后,吴玉章与其侄吴鸣和“和林伯渠、贺龙、刘伯承等同志都分开了。……我们又碰到了谭平山,有了这个广东佬,我们才得以安全地走到海边。”^①

姜治芳回忆说,郭亮曾安排他与父亲姜济寰“紧跟谭平山一步不离,谭平山到那里,你们就跟到那里”^②。

这样,谭平山、吴玉章、姜济寰、姜治芳、吴鸣和等人,“从惠来城附近的小村庄出发,步行一夜到了甲子港……找了一条小鱼船开赴香港……”^③

姜济寰、姜治芳在香港停留了两天,即改搭“新疆”号商船到了上海。

吴玉章从香港到上海后,于11月受中央委托前赴莫斯科,到莫斯科后为呈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而起草了南昌起义的报告:《八一革命》。

谭平山到香港不久即转赴澳门。1928年初回到上海,才得知已被开除党籍,多次要求恢复党籍均遭拒绝。1928年春,在上海筹组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即第三党。

9. 恽代英

恽代英从甲子港乘船赴香港。1927年10月15日,参加了南方

① 吴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忆》,载《中国青年》1962年第9期。

②③姜治芳:《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1977年11月),见《南昌起义》,第412页。

局暨广东省委联席会议，被任命为南方局委员、广东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宣传部长，负责主编广东省委《红旗》半周刊，在香港主持广东省委日常工作，参加领导了广州起义。

10. 郭沫若

郭沫若在起义时任革命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流沙会议后，和几个人一道脱离队伍，找到了一位向导，从神泉港到了香港。1927年末，郭沫若回到上海，因病入院。1928年2月下旬，携全家一道赴日本。

11. 徐特立

徐特立在起义时任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主力入潮汕后，同周逸群率部守潮州。他外出筹款回来时，潮州已为敌军攻占。不得已从甲子港一带乘船经广州、香港回到上海。受中央委派，于1928年1月与贺龙、周逸群、郭亮等准备赴湘鄂西。中途在武汉因病逗留，后返上海治疗。痊愈后中央派他去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2. 陈赓、周逸群

陈赓起义时任第三师六团二营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重伤。主力从潮汕退走后，他在护士帮助下，乘船到香港，后又经汕头转赴上海。陈赓到上海后，入院治伤，“伤愈，即参加上海秘密工作”^①。

周逸群（第三师师长）在潮州失守后从汕头乘船赴上海，向党中央书面汇报了南昌起义情况。1928年初，同贺龙等人同赴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

^① 陈赓：《我的自传》（1944年5月），见《陈赓日记》，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

13. 张曙时

流沙失散后，张曙时从甲子港雇民船到了香港，在香港向党组织提出赴苏学习。得到同意后，他与徐以新一道赴上海。在上海与党组织的联系突然中断。直到1932年，张曙时才由邹铭三、王学文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根据党的指示，他利用自己原来的身分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

14. 郭亮、柳直荀

郭亮起义时任农工委员会委员，据姜治芳回忆，“我问郭亮他自己怎么办，郭说，他同柳直荀一块儿走小路到内地去”^①。柳直荀起义时在农工委员会工作，驻潮汕后在第三师担任政治工作。

郭亮、柳直荀等人绕道至韩江，误乘海盗船，后遇英国太古公司商船搭救至西贡。10月底，他们从西贡回到香港。11月回到上海，因病人院治疗。

1928年1月，郭亮同贺龙、周逸群等人赴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

柳直荀作为中央特派员，往来于河南、湖北、江苏、陕西等省，负责传递文件，巡视工作。

15. 唐天际

唐天际起义时任第二十军特务营副连长，汕头失利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后经潮阳到汕头乘船赴上海，找党未果，旋赴武汉，在武汉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取得联系。他后来被派往湘南，领导安仁农民武装，参加了湘南起义。

^① 姜治芳：《父亲姜济寰与我参加南昌起义的回忆》（1977年11月），见《南昌起义》，第412页。

16. 萧克

萧克起义时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四连连长。潮汕失利后，他回到了湘南，与临武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生活，后来参加了湘南起义。

17. 陶铸

陶铸在起义时任第二十四师七十一团二营六连连长。流沙失散后，他由甲子港乘船赴香港，被扣留，旋引渡广州，逃出后在广州与党取得联系，参加了广州起义。

18. 贺锦斋

贺锦斋在起义时任第二十军第一师师长。潮汕失守后，他率第一师作为先头部队开往海陆丰，后与指挥机关失去联系。根据多人回忆，所部被缴械。

贺锦斋后来离开部队回到上海。根据党的指示，他又从上海转赴湘鄂西，作为贺龙等人的先锋重举红旗，领导了湘鄂西的武装斗争。

19. 张太雷

张太雷没有直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参加了“八七”会议后，南下追赶部队传达中央指示。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起义军进占汕头后，“不两天，张太雷奉着中央的使命，由香港潜来汕头……在汕头和我们朝夕相处了一星期，在退出汕头的时候，又和我们同行了一段路程，才化装转回汕头……”张太雷于9月27日即有给中央的报告：《张太雷致中央紧急信——汕头的军事活动》。可见，此时张太雷已在汕头，相距10月1日汕头退却约有1个星期。另据张国焘10月9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太雷绮园（即罗绮园）诸兄先第一日起程

返港”^①。张国焘是参加完10月2日的流沙会议后才脱离部队的。又据参加过流沙会议的陈公培回忆，“张泰来(太雷)和那位外国同志好像并没有随军离汕，而是直接由汕头转香港，因为我记得流沙会议中并没有他们参加”^②。因此10月1日，张太雷离开汕头返香港，这个日期可以确定。

张太雷于10月15日主持了南方局暨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会后不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了11月9日至10日的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中央于10月23日致信南方局并转广东省委：“太雷已到此(按：指上海)”，“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③。张太雷夫人王一知回忆说，她到上海生孩子，“在搬家的第二天(10月20日)就生产了。孩子生下来没有几天，太雷忽然回来了”^④。

张太雷参加完会议后不久即返香港领导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2日，张太雷在广州起义的战斗中牺牲。

20. 蔡廷锴

蔡廷锴在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蔡廷锴非同志，意志摇动，故于南昌暴动时有扣留他之提议，不果，致后有进贤之叛。其师中同志有为团长、参谋长者，后被扣留。”^⑤

部队从南昌出发不久，到达进贤李家渡时，蔡廷锴即率第十师脱离大队，折回“赣东河口……通电脱离共产党”^⑥，投靠了南京政府。后第十师扩编成为第十九路军，1932年进行了上海“一·二八”抗战。1933年“福建事变”后，该军为蒋介石瓦解、收编。

①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

② 陈公培：《起义军在普宁》，见《南昌起义资料》，第353页。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82页。

④ 王一知：《回忆太雷》，见《回忆张太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⑤ 刘伯承：《南昌暴动始末记》中的《参加南昌暴动兵力概要表》。

⑥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21. 卢德铭所部

南昌起义时卢德铭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他在武汉接到了周逸群从南昌发来的电报，通知南昌已经起义。卢德铭即率全团 2000 余人乘船东下，但到奉新县时得知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考虑到与起义部队相隔太远，追赶不及，决定改变原计划，转赴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铜鼓。该部“未赶到南昌起义，后由赣西入湖南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①，参加了秋收起义。卢德铭任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 年 9 月 23 日，牺牲于江西萍乡芦溪。

^① 《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60 页。

1105

刘邓大军在鲁西南

田浩存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大踏步进退,开展运动战,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连续进行了几次大规模战役,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8月10日至21日,进行陇海战役,对陇海铁路汴(开封)徐(徐州)段之敌实行宽正面反击作战。攻克县城5座、火车站12个,破毁铁路300余华里,歼敌1.6万余人。战役一举打乱了敌人的进攻计划,配合了中原、华东我军的作战。迫使敌人不得不从追堵中原我军和投入华东战场的部队中,抽调重兵向汴徐段增援。

8月底,蒋介石以30万大军从徐州、郑州向刘邓大军发起进攻,妄图钳击刘邓大军于鲁西南地区。刘伯承、邓小平利用徐州、郑州之敌钳形攻势尚未合拢之机,诱敌整三师冒进,于1946年9月3日至8日,进行定陶战役。在菏泽、曹县、定陶、东明结合部以大杨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歼敌整编第三师、四十七师等部4个旅共1.7万余人,俘敌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锡田。

1946年9月29日至10月7日,进行巨野战役。战役在龙固集、章缝集一带展开,歼灭号称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5000余人。

1946年10月29日至31日,进行鄆南战役。在鄆城县以南的富春集、苏屯、大史庄一带,采取以优势兵力先包围、后分割歼灭的战术,向敌人发起进攻。歼敌第一一九旅全部及第二十九旅、八十一旅一部共8500余人,俘敌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

1947年1月1日，刘邓大军突然大踏步前进，出其不意地插入敌人纵深部，进行巨金鱼战役。至9日，先后攻克巨野、嘉祥，包围金乡。敌暂编第四纵队中将司令张岚峰被俘。16日，在定陶以北的西台集地区歼灭由菏泽出援之整编第六十八师主力，攻克成武。战役历时16天，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个半旅，连同地方团队共2.64万余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在鲁西南与苏北的作战，给徐州之敌与国民党控制的陇海路以严重威胁。

1947年1月24日至2月4日，为拖住冀鲁豫战场国民党军主力王敬久集团，配合山东我军攻取莱芜，进行豫皖边战役。在陇海路两侧先后攻克定陶、单县、曹县、柘城、太康、鹿邑、杞县、亳县等8座县城，收复了陇海路南北广大地区，共歼敌1.6万余人。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7年6月，我军一年来的胜利，使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的“全面进攻”被粉碎后，改为“重点进攻”，在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的同时，对晋冀鲁豫解放区实施蓄谋已久的黄河战略，企图以黄河天险来阻挡我军的南进。

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及时制定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为实现这一战略意图，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在处于敌要害之鲁西南地区实施中央突破，跨越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打开战略进攻的南下通道，直趋大别山，从而达到我军的预期战略目的。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12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从张秋镇至临濮集300华里宽正面上，发起渡河作战，以偷袭和强渡相结合的战术，一举突破敌人黄河防线，拉开了鲁西南战役的序幕。

7月1日拂晓，我一纵和冀鲁豫军区独立一旅迅速完成对郟城的包围，7月2日，肃清了四关之敌，兵临郟城城下，积极准备攻城。

我军一举突破黄河防线，大大震动了南京国民党军事统帅部。蒋介石为挽回败局，立即自豫北、豫皖苏抽调第三十二、六十六、五十八三个整编师和六十三师的一五三旅，在王敬久统一指挥下，从陇海铁路分两路北援。其一五三旅于7月4日进到定陶，与退守菏泽之敌六十八师组成西路；其三十二、六十八师经单县、金乡北进，与在嘉祥的七十师组成东路，并以其五十八师及六十六师的一九九旅驻在金乡为后应。企图以五十五师坚守郓城，吸我屯兵城下，以东路军结成重点攻势，从巨野向西拊我侧背，和西路军形成钳击之势，迫我背水作战，将我军消灭于黄河、运河交叉之三角地带，或将我重新逼退黄河以北。

刘伯承、邓小平根据王敬久主力尚远在单县以南，郓城守敌战斗力较弱，敌人分路北进，便于我在野战中各个歼灭等情况，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的战术，果断地决定，首先围攻郓城，吸引敌人援军，先啃掉较弱的定陶、曹县西路之敌，然后各个击破王敬久集团。

7月7日晚，我一纵等部对郓城之敌发起总攻。经一夜激战，全歼敌五十五师师部和二十九、七十四两个旅1.5万余人，攻克郓城。

围攻郓城的同时，我二纵奔袭曹县，守敌闻风而逃，7月5日收复曹县。10日夜，我六纵对定陶发起总攻，全歼守敌六十三师之一五三旅4000余人，收复定陶。

这样，战役第一阶段宣告胜利。敌人拊我侧背钳击我军的计划完全失败，我军开辟了北起黄河边的郓城、鄄城，南至陇海铁路北的定陶、曹县、金乡的广阔战场，长驱直进敌军主力之侧背，完全处于主动地位。

7月10日，在我定陶之战告捷的同时，敌东路援军第七十师、三十二师、六十六师三个整编师，已分别进到巨野东南方向的六营集、独山集、羊山集地区。各师彼此间隔20至30华里，形成了一条断断续续的“一”字长蛇阵。

这时，刘邓首长根据毛主席关于“要放手消灭敌人，歼敌越多对山东粉碎敌人重点攻势，乃至尔后跃进大别山均极为有利”的指示，决心抓住战机，不给敌人调整部署的时间，连续作战，挥戈直指东路援军，斩断其长蛇阵，猛烈扩张战果。

7月13日，我各纵队迅速完成了对敌人的分割包围。王敬久发现其部队被分割包围后，进退维谷，举棋不定。先令六营集之七十师向南、羊山集之六十六师向北，靠拢独山集之三十二师。后又改令三十二师向北靠拢七十师，会合后一起向南靠拢六十六师。我一纵抓住三十二师向北运动的机会，以追击和截击等手段，在运动中分割兜击敌人，歼敌一四九旅。敌三十二师师部仅带残部一四一旅到达六营集。

14日，我一、六纵开始对六营集紧缩包围圈，并发起总攻。当夜8时，敌遭猛烈攻击之后，果然以三十二师为左翼，七十师为右翼向东突围。入网之敌1.9万人，在我四面围攻下，迅速被全歼于六营集以东方圆10华里的洼地之内。

这时，在敌人的这条长蛇阵上，只剩下龟缩于羊山集的六十六师。这个师装备精良，战斗力比较强。他们依托的羊山集，座落在起伏五华里的羊山制高点“羊身”山脚下，北面靠山，三面环水，易守难攻。敌人在羊山集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企图凭险死守待援。

蒋介石为挽救在鲁西南战场上的败局，于19日飞往开封坐阵指挥。立即调重兵驰援羊山集；同时严令王敬久就近率五十八师及六十六师之一九九旅，立即由金乡北渡万福河，解羊山集之围。这时，在万福河北岸阻击敌人的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旅和七分区部队，根据刘、邓指示，在正面敞开一个缺口，诱敌先头部队一九九旅北渡万福河，然后切断其与五十八师的联系，突然将敌包围，将敌人全歼。

23日，中央军委致电刘邓：对羊山集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歼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10天左右，直出大别山。刘邓首长经过分析，决心集中全力，迅速歼灭该敌。

27日夜,我军对羊山集发起总攻,以二纵一部由西向东攻击,以三纵第七旅和六纵第十六旅由北向南攻击,以三纵一部由东向西攻击,并调用野司榴弹营、一纵炮兵团,加强火力,重点夺取羊山各制高点。经一昼夜激战,全部夺取村北制高点,将敌压缩于羊山集村内予以全歼。至此,历时28天的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

鲁西南战役共歼敌4个整编师部及所属九个半旅,共计5.6万余人,俘敌中将师长宋瑞珂、陈颐鼎,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罗哲东等高级将领。鲁西南战役的胜利,为千里跃进大别山打开了南下通道。8月7日,刘邓大军由鲁西南地区出发,分东西中三路南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大别山区。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全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

0
1
2
3
4
5
6
7
8
9

毛泽东与“党政干部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 骏

60年代初期,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且大力倡导,身体力行,对当时我们党认真纠正“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努力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学习红军,严明党纪,初拟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并没有实现人们预期的美好愿望,通过大干快上,使国家迅速富强起来,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相反,无情的现实却把一个巨大的灾难抛给了当时中国的每一个人:时至1960年,整个国家的经济已陷入了全面衰退的境地,粮食大幅度减产,物价飞涨,人民缺吃少穿。作为重灾区的农村,情况更是严重,很多人家早已断粮,不少老百姓四处逃荒,有些地方发生了浮肿病,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面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一方面采取一些应急的补救措施,调剂粮食,运送衣物,实行“瓜菜代”等,帮助受灾的群众渡过难关;另一方面则认真研究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纠正一些“左”的错误做法,重新制定切合实际的政策,力图从根本上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被动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当时把主要精力放在重灾区农村的工作上面,1960年11月3日,中央制定并颁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

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①，明确提出了巩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十二条措施。同日，中央又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紧急指示信”的指示》^②，要求各级干部认真学习、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

然而，积重难返，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已给农业生产和群众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时各地上报的反映困难和问题报告仍然不断。从这些报告以及有关同志的谈话中，毛泽东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一度有所收敛但现在又大肆蔓延的“共产风”是造成当前农村经济生活困难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一些干部对中央的政策置若罔闻，拒不听从中央的纠“左”号令，更是加重了这种困难局面，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纠正这种状况。11月15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③，严词要求省、地、县、社各级领导干部痛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实际上，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针对当时“五风”危害严重，而许多干部又不认真执行中央纠“左”政策的情况，毛泽东就指出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一切行动听指挥”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两条现在“普遍适用”。12月24日，中央专门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经济形势等问题。会议开始不久，毛泽东就指示他的秘书胡乔木借鉴红军的历史经验，尽快起草一个在新形势下普遍适用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稿子，交给会议讨论后下发全党，以帮助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努力纠正工作中出现的“五风”错误，带领群众，克服困难。

时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胡乔木领受任务之后，立即找来了宪法和刑法草案、党章以及各省一些类似的规定等材料进行研究，并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0页。

② 同上，第677页。

③ 同上，第693页。

与很多同志交换了意见，很快就拿出了一个初稿。初稿的三大纪律是：（一）有事同群众商量，永远同群众同甘共苦；（二）重要问题事前请示，事后报告；（三）自己有错误要检讨纠正，别人做坏事要批评揭发。八项注意是：（一）保护人民安全，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偿命；（二）保护人民自由，随便罚人抓人关人搜查要法办；……^① 1961年1月8日，胡乔木将初稿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稿子上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标题，随即批示印发给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组同志讨论。

1月9日当晚，不顾一天的繁忙和劳累，毛泽东参加了中央核心小组讨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会议。会上，他首先回顾了当年制定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过程。

1927年10月，在江西永新三湾，毛泽东对他率领的秋收起义队伍进行了改编，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为了克服队伍中存在的一些旧军队的恶习，进一步巩固这支新生的人民军队，在遂川县荆竹山，为部队规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个红薯，打土豪要归公。根据实际情况，第二年又增加了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等八项注意。几经修改，1947年，由解放军总部统一规定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正是靠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的军队才变成了一支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具有铁的纪律的钢强队伍，才逐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从而不断战胜敌人，发展壮大。可以说，认真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是我们军队战无不胜的法宝。我们应该要永远牢记这一历史经验，毛泽东深情地说。可是，现在我们的不少党员干部却自以为是，不听中央的统一指挥；随便调用社员和生产队的财物，有的甚至无缘无故地打人罚人，……这样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说到这里，毛泽东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因此，现在我们要学习

^① 毛泽东：《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1961年1月9日）。

红军，制定一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大家对照着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与群众一起把生产和生活搞好。

毛泽东的讲话在与会的同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大家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制定“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毛泽东又提出了自己对草案的修改意见：一、草案太复杂，不如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简单明了，使人难记。二、有几条执行起来可能起反作用，如打人要法办，打死人要抵命等等，不好公布。应当从正面提，要什么提倡什么，不要什么不提什么……^①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其他小组也对草案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不少同志还根据自己了解的实际情况对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各小组讨论之后，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大家的意见，对草案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最后，经这次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中央于1961年1月27日正式下发“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三大纪律是：（一）一切从实际出发；（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同劳动同食堂；（二）待人和气；（三）办事公道；（四）买卖公平；（五）如实反映情况；（六）提高政治水平；（七）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八）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央要求“目前只在党内公布，印发到公社和生产大队，立即照此实行”；同时希望各级党组织“提出修改意见，于三月底以前报来”。

首倡调查，身体力行，结《农村六十条》硕果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下发以后，毛泽东大力倡导，带头执行。

“五风”的重又盛行，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纠正错误必须首先要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在1月9日的小组讨论会上，

^① 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群众,不调查研究,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①。他建议将草案中的三大纪律第一条改为“一切从实际出发”,经过修改后的八项注意第八条也改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当时的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就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总结了近几年来沉痛的教训提出,做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他说,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过去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情况明瞭,因此这个决心就大,方法就对,解决问题的措施比较有力。但是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只有正确的方针政策,但情况不明,决心不大,方法不对,还是等于零。……现在首要的问题是搞清情况,要分批、分头摸清每个省、市、地委、公社的情况。这个会开完,我就想到一个地方,做点调查研究工作,不然就不摸底。最后,毛泽东郑重地提出,请同志们回去之后,都要搞点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我们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②。

毛泽东是从不食言的。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就着手实施他的调查研究计划,他让秘书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等各带一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等地农村,分别调查一个最坏的和最好的生产队,弄清情况,再到广州与他会合,向他汇报。

1月21日,三个调查组各7人离开北京。1月26日晚,带着急于了解农村真实情况的紧迫心情,毛泽东也乘火车离开了北京,经天津、济南、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24日到达广州。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抓紧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① 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30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1月13日)。

大力倡导调查研究。在途经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和广东时，他分别听取了当地领导人的汇报，还同一些县委书记作了谈话，着重询问了农业生产和老百姓生活中的问题，督促干部们要下去做调查研究。在江苏南京，他对当地负责人说，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彻底克服掉。

实际的调查，使毛泽东对农村的情况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到广州后，他收到了中央广东调查组送给他的一份《调查纪要》。《纪要》指出：“公社各级的关系，在解决了自下而上的‘共产风’问题后，似乎应当注意更适当地解决队与队之间、社员和社员之间在分配上的某些平均主义。”《纪要》具体举例说：新兴县里洞公社蒙坑大队，是由原来的两个高级社合并起来的，一个有副业收入，一个劳动力一天挣1.2元，另一个收入低，只有0.7元。合并后，收入都降低了，只有0.4元，两个队的社员都有意见。而且这其中，按人口平均分配的供给部分就占了总分配数的80%，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还占不到总分配数的20%。结果，劳动力强的与劳动力弱的一样吃，能挑百斤泥的人没有劲了，劳动力弱的也不积极，有些人就‘走自发’，谁也瞧不上工分了。《纪要》提供的这些情况和所作的分析，受到了毛泽东的重视。他觉察到1960年11月3日中央发出的《十二条》，要解决“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实际只解决了“调”（即无偿调拨生产队的财产）的问题，没有解决“平”（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的问题。于是他立即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三南”（中南、华南、西南）会议，研究讨论如何解决“两个平均主义”问题。最后，他接受了田家英的建议，决定在《十二条》的基础上，搞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条例，把公社各级组织，特别是各级干部和社员的职能、权利和义务，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都规定好，以切实解决平均主义等问题。2月25日，毛泽东邀集陶铸、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等人开会，指示由他们组成一个班子，进行农村人民公社条例的起草工作，于3月10日完成。

3月15日，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工作会议，对这个条例草案进行

了认真的讨论和修改。22日，大会通过了第三稿，这就是1961年3月29日由中央正式下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草案共分10章60条，又称“六十条”。草案主要是对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社、队规模问题，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生产队管理问题，责任制问题和评工计分等问题，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从而在制度上制约了“共产风”、“两个平均主义”等的产生和蔓延。

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原准备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写进《农村六十条》，但当时各地的修改意见还没有报齐，最后，在《农村六十条》第八章《干部》中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内容写了进去。《农村六十条》颁布以后，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对于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顺乎民意，坦诚纳谏，终解食堂之累

“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下发后，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都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从各地上报的意见看，不少基层干部对八项注意中第一条“同食堂”很有意见，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公共食堂是“大跃进”中兴起的一个新兴事物。1958年8月1日，《红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介绍湖北京山县常年办食堂经验的文章，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第一是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收入；第二是节约了粮食；第三是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的开支；第四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文章号召大力兴办公共食堂。毛泽东当时对办食堂也持肯定态度。于是乎公共食堂就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兴办起来。随着“大跃进”的深入，不少地方的食堂办不下去了，自动解散了。本来，办不办食堂应根据农村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同时，这也是个无关紧要的生活问题。可是，在当时的形势下，这却被看成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后，一些不愿参加食堂的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以“大辩论”为名的过火斗

争和断粮打击。为了巩固公共食堂,1960年,中央先后发出一系列文件,强调公共食堂是必须坚守的“社会主义阵地”,要求各级党委把安排好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并提出“政治到食堂,干部上伙房”是办好食堂的关键。在强迫命令的高压下,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数的88.6%,河南省甚至高达99%^①。对于公共食堂,人们真是苦不堪言,苦不敢言。八届九中全会中,毛泽东派出的三个调查组都带回了社员要求停办食堂的意见,毛泽东的态度也有所松动。2月6日,他在听取田家英等人的汇报,就食堂问题发表意见时说,这个问题要继续调查研究,办食堂要符合群众的需要,可以多种多样。尽管如此,坚持办食堂的基本原则并没有改变,3月广州会议制定的“六十条”仍然规定:“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这一条还详细介绍了各地办好公共食堂的经验。

3月广州会议之后,在毛泽东的进一步倡导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都深入农村进行调查。实地的调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问题的焦点对准了公共食堂,这促使毛泽东开始认真考虑应该如何解决公共食堂问题。

4月10日,刘少奇通过在家乡炭子冲大队的调查,在长沙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对食堂问题的意见,原来讲食堂有优越性,下来一看,不是一回事,三分之一的劳动力都忙着做饭,还烧硬柴砍树,破坏山林……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②。毛泽东听后,陷入沉思。

4月26日,毛泽东收到了在韶山进行调查的胡乔木写的一份报告。报告说在公社讲解《六十条》时,遇到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食堂问

① 中央办公厅:《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60年)。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9页。

题。从群众反映来看,大多数食堂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为发展生产的障碍,成为党群关系中的一个疙瘩。主要是因为它同工分值降低、社员收入减少、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又在群众的每天生活中引起许多不便。因此,胡乔木建议这个问题愈早解决愈好。毛泽东看后,立即把这份报告批发给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并单独给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写了一封信,嘱咐他立即将报告及材料印发给三级干部会议讨论,并且要和群众商量。然后把大家的意见如实反映上来。

5月7日,周恩来在河北省武安县调查后,打电话告诉正在上海的毛泽东:绝大多数社员甚至全体社员,包括妇女和单身汉在内,都愿意回家做饭……毛泽东将这份文件也转发给各个地方党委参考。

5月10日,毛泽东又批转了邓小平、彭真的来信。信中说,食堂问题在北京郊区比较复杂,居住分散的队不办,常年食堂一般主张不办^①。

不少中央局和省市的调查组通过调查,发现80%到90%的社员都赞成回家吃饭。

……

大批来自实践、从不同角度反映广大干部和社员对食堂问题意见的调查材料,终于使毛泽东在公共食堂问题上的态度有了根本性改变,同时全党在这个问题上也取得了共识。经毛泽东提议,1961年5月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农村六十条》作了重要的修改,取消了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等规定,新条例的第36条重新规定:“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

会议之后,全国各地开始陆续地解散食堂。由于“大跃进”中搞了几个“大办”,特别是“大办钢铁”、“大办工业”,不少日用品,包括火

^① 《邓小平、彭真同志五月十日给主席的信》(1961年5月13日)。

柴、食盐、锅子、碗筷等，都严重脱销，有的地方已经很长时间见不到了。这时候如果再“一哄而下”地解散食堂，势必给社员的生活带来新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指示各地应该有秩序有计划地停办食堂，一方面，要尽可能地保证口粮到人，分发到户；另一方面，则应积极地组织安排日用品的生产和调运，确保每户能正常地开伙做饭。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食堂的解散工作很快就顺利完成了。广大社员和干部无不拍手称快^①。

就在5至6月召开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各地上报的意见，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也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删去了“同食堂”一条，并对其它条文作了较大的修改。最后，会议一致通过将修改后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正式写进“农村六十条(修正草案)”，作为第八章《干部》中的第47条。修改后的三大纪律是：(一)如实反映情况；(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三)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一)参加劳动；(二)以平等的态度对人；(三)办事公道；(四)不特殊化；(五)工作要同群众商量；(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七)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八)提高政治水平。这里，除了将“同劳动同食堂”改为“参加劳动”外，还有将“待人和气”改为“以平等态度对人”；“买卖公平”改为“不特殊化”；以及其他一些位置上的调换，如将原来的第五项注意“如实反映情况”改作三大纪律中的第一大纪律，将原来的第一大纪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改为“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并移作第七项注意。“同食堂”等的删改，表明了我们党不仅在实际工作方针上有了切实的转变，而且在对待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了重要的突破，显示了整个党的政治理论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① 江渭清：《庐山会议以后的严峻岁月》，《群众》1996年第8期。

330
X
X
X
X

认真学习，提高政治水平，通晓经济规律

“大跃进”中“五风”的盛行，除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少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低，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基本规律搞不清楚。对此，在1月9日讨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小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许多同志不懂得什么是等价交换、价值法则、按劳分配，对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大集体与小集体的界限，也划不清。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就发生“共产风”，“一平二调”农民的东西。他说，现在我和农民的关系不等价，其中的买卖不公，是很大的不公平，有的甚至根本不是什么买卖，而是压级压价。长期这样下去，我国5亿多农民不满意，我们的政权也不可能巩固。因此，全党干部应当加强学习，提高政治水平，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弄清价值法则，搞清楚这些原则^①。最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八项注意中增加了第六条“提高政治水平”，并将八项注意中的三、四条分别改为“办事公道”和“买卖公平”（后来，修正草案将第四条改为“不特殊化”）。

毛泽东一贯强调干部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大跃进”开始后不久，他多次提出广大干部要加强学习，学习理论，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弄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针对各地在大办公社、大炼钢铁的过程中，乱子出了不少，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于1958年11月在郑州召开了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多次讲话，严肃批评了一些干部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否定商品生产，搞产品无偿调拨，剥夺农民的错误。同时，他还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说“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就是因为政治理论水平低，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认识不清，他建议大家认真读两本书：《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

^① 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30页。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要求每人每本书用心读三遍，特别“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随读随想，加以分析，“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会上，他亲自带领到会的人读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谈了很多观点，澄清了一些具体错误。

为了进一步纠正“左”的错误，统一全党的思想，中央决定于1959年7月在庐山召开一次扩大的政治局会议。6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预备会上，毛泽东谈了19个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许多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不懂得经济规律，因而多付了些代价，多花了些钱，多花了些劳动力，刮了一阵子“共产风”，这也好，干部受到了教育，全国人民受到了教育，有了这个教育，就能读进去书了。他要求从中央到县，各级领导干部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他说，这本书总结了苏联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帮助。他提出8月份用一个月的时间读书，或者实行干部轮训^①。

庐山会议后不久，毛泽东身体力行，专门组织了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人成立了一个读书小组，带头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活动从1959年12月持续到1960年2月，毛泽东和读书小组成员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在边读边议的过程中，毛泽东结合实际，多次谈了他对中国经济建设的看法和意见：“大跃进”运动的基本问题之一，便是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因此要工农业并举，农轻重平衡……无疑，这是毛泽东结合实际，学习理论，得出的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一种深刻认识。这种认识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出，

^① 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30页。

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前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提高广大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帮助广大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他说,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过去我们搞民主革命,长期开展学习运动,现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9月,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①。《决定》指出,“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纪律、违反政策的错误,从而提高干部的政治水平,增强党性。”从11月开始,中央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对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各级各方面领导干部约16.3万人进行了轮训,训练的内容主要是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等材料,同时还有《农村六十条》、邓小平主持制定的载有“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工业七十条》以及《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科研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有关文件。这次轮训,确实是一个“读书、思考和总结经验的机会”。通过学习,广大干部的政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有了较明确的认识,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广大干部的党性,正常了党内外的民主生活。

严于律己,勇担责任,坚持民主集中制

“大跃进”中“五风”的盛行,不但使生产和经济建设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也使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特别是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必须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有鉴于此,胡乔木在草拟“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53页。

意”的初稿时，将三大纪律的第三条拟为“自己有错误要检讨改正，别人作坏事要批评揭发”，在1月9日的小组讨论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一条很重要，但是这样写可能起反作用，应该正面提问题。他建议改为“实行民主集中制”，他说什么时候也不能破坏民主集中制，要永远坚持民主集中制^①。

长期以来，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大跃进”开始后不久，通过到农村的实地视察，是毛泽东发现了办人民公社中“乱子出了不少”。于是毛泽东带头犯了错误，又带头改正错误。从1958年11月初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初庐山会议前期为止，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全党进行了历时8个月的纠“左”。这种对“左”的错误的纠正，虽然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对保证生产和经济建设的基本正常进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最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不但能及时认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还能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曾说过，1958年、1959年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党的主席，应该归我。1960年6月14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明确表示：这几年中，“我本人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1959年完成3000万吨钢；12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2000万吨，又在上海会议同意了1650万吨。例如1959年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主张对一平二调的问题的帐可以不算。到4月，因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启发，才坚决主张一定要算。……如此等类。”11月28日，在一份文件的批语中，毛泽东又写道：“他（毛泽东本人）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这份文件后来公之于

^① 顾龙生著：《毛泽东经济年谱》，第530页。

全党。毛泽东这样公开地进行自我批评，表明了他愿意带领全党改正错误的一片真心，这在全党干部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教育作用。

在1962年1月召开的有县委书记参加的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再次作了自我批评，带头承担了“大跃进”错误的责任，他说：“去年6月12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在大会讲话中，他重点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说，实行不实行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如果在人民内部不实行广泛的民主，干部和群众就不敢讲话，正确的意见就集中不起来，就不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在人民内部不实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可能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是法西斯专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不可能正常进行下去。他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很重要的就是要在党内实行民主，因为我们是执政党。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服从多数。他批评有些省委、地委、县委“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这是很错误的。毛泽东还讲了“霸王别姬”的故事，他说：西楚霸王项羽不爱听不同意见、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项羽终于失败，并且说“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他同时还指出，光在党内实行民主还不够，在人民群众中也必须要有充分的民主。就是要让群众讲话，让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他特别强调，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是充分发扬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毛泽东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示范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地方的领导干部都以不同形式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邓小平在

讲话中也着重谈了民主集中制问题，他还提出了要对权力实行监督的重要观点。刘少奇在修改自己的讲话时，亲自用铅笔重写了几大段话，加进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强调这是几年来犯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甚至是“全部原因”。他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要求广大的党员和干部要坚持和发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特别指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概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必须自觉地严格遵守。在这次大会上，大家畅所欲言，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上下通气”，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反省和总结，从而真正达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统一全党行动的目的。“七千人大会”对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促进调整工作的深入进行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七千人大会”以后，通过全党上下的共同努力，经济形势特别是农村的经济形势开始进一步好转。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对《农村六十条》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对其中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三大纪律是：（一）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令，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二）实行民主集中制。（三）如实反映情况^①。同1961年6月15日颁布的修正草案比较，除把认真执行党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令一条从原来的第二条改为第一条外，主要是将实行民主集中制从原来的第三条改变为第二条，这充分表明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党对坚持和加强民主集中制的高度重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②，在其中第十四章干部中的第五十四条，除了作了少许的文字改动外，也依然按照原来的次序全文收录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献选编》（1958—198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645页。

^② 同上，第984页。

刘少奇二三事

郑超麟

五卅运动以前，共产党内做工人运动的重要干部，我只知道北方有张国焘、罗章龙、李震瀛、张昆弟等人，南方有李隆郅（立三）、项德隆（英）等人，但不知道有刘少奇。

五卅运动以前一个多月，我同蔡和森夫妇一起住在上海的中央宣传部。一天，有一位客人，说湖南话，带着爱人和小孩来拜访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他们很恭敬地招待了他，我在另一个房间，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客人走后，我问警予：“这人是谁？”警予说：“就是刘少奇。”她看见我好像不知道刘少奇是什么人，于是解释说：他在安源做工人运动的，很能干，此次从湖南出来，要去广州参加“全国劳动大会”。当时，彭述之生伤寒病住在医院，我去医院看他，告诉他刘少奇来看望蔡和森，他于是告诉我刘少奇这个人。原来，刘少奇是1920年同那二三十个青年团员一起去苏联读东方大学的，但在1922年我们从西欧去的人未到莫斯科以前，他就同其他许多人回来了。

彭述之又讲，刘少奇在莫斯科时同他很要好，他们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全国劳动大会开完后，刘少奇、李立三以及其他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一起回到上海，这意味着以后刘少奇也将在上海做工人运动。

果然如此，1925年5月30日南京路屠杀之后两三天，上海总工会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就通过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罢工了。

同时，《热血日报》也出版发行。

我参加了《热血日报》的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闸北香山路附近，中央“工农部”（实是职工部，因为并不搞农运工作）的机关设在香山

路一条弄堂内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里，这就是五卅运动的“司令部”。陈独秀每日上午都在那里听各方面汇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我下午有时也到那里去串门，刘少奇以及那些做工运的干部就住在楼上。刘少奇主持的总工会设在宝山路宝山里，离此不远。

大家都知道上海总工会在五卅群众运动中发挥的重大作用，许多人以为李立三领导有方，其实不是。李立三是著名的“大炮”。在群众开会时作鼓动工作，以及代表总工会同虞洽卿接头，曾去北京会晤财政部长李思浩（虞洽卿介绍）。上海总工会一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我只觉得总工会本身工作有条有理，但我从未去宝山里串门，谈不出刘少奇是怎样处理一切事务的。

这里，我想说一件没有人知道的事情。中央秘书处当时是任作民负责的，有个秘密机关设在宝通路南端靠近淞沪铁路的地方，石库门房子，坐西朝东，大门就开在马路边，我去过一次，陈独秀有时来这里同任作民一起处理工作。当时，工人群众拥护总工会，奉命或自发地注意周围有什么政府或流氓的破坏活动。一次，一个工人看见有一个老头子和一个青年人在这个石库门房子里鬼鬼祟祟，不知搞什么事情，于是几个人破门而入，将这二人捆起来送到总工会去。出来处理的人正是刘少奇。刘少奇装做不认识这两个人，严肃盘问了他们，最后释放他们回去。

此事，不是陈独秀或任作民告诉我的，而是一个做交通工作的同志私下告诉我的。

我同刘少奇只是互相认识，从未在一起工作、一起开会，更未曾一起讨论理论或实际问题。但有一次，也是在五卅运动期间，我编好了《热血日报》，无事，便去工农部机关串门，在楼下客堂间看见了陈独秀正在同几个做工运的同志（其中有刘少奇）谈话（不是正式开会），我便坐下旁听。原来讨论的是要不要停止罢工。先一日或二日，上海总商会已经下令停止罢市了，《热血日报》发表文章，骂总商会背叛群众，并声明工人和学生们仍要战斗下去。但刘少奇向陈独秀说的

是另一种意思，即认为商人既然停止罢市，我们继续罢工也是不能持久的，不如停止罢工。他分析形势，说得很清楚，陈独秀便同意了他的主张。第二天，总工会就下令复工了。我记得这次谈话时，李立三并不在场。

“文化大革命”时，我被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内，一天有一个干部来找我，要我揭发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我于是将这件“停止罢工”的谈话说给他听。我只说事实，别人可以作不同的结论，例如，可以作出软弱，妥协，破坏罢工等的结论；也可以做出有远见，敢负责，避免更大牺牲等的结论。

后来，1927年在武汉，“湖北省总工会”名义上是以向忠发为委员长，事实上也是刘少奇主持的。那时我也在武汉，而且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可是连刘少奇的面也未见过，因为省总工会不是湖北省委管的，是中央直接管的（或是汉口市委管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位干部要我证明在“七·一五”以前，刘少奇就被国民党逮捕而叛变，我只能回答说：据我所知，“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汉并未捕人。想不到后来给刘少奇平反时，我这句话竟被引为证据，证明刘少奇不是叛徒。

谢子长在陕北的最后岁月

郭 洪 涛

谢子长同志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在西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与谢子长同志并肩战斗了两年多时间，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子长同志既是领导、战友，又是师长，对我影响甚深。在他诞辰 100 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我对他深切的怀念。

一、初识谢子长

1933 年我从太原监狱出来后，来到了北平。听到陕北的一些同志讲到谢子长，才了解到谢子长的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就提出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并认为这是当前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他和唐澍、李象九、白明善（乐亭）等同志领导了陕北第一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之后，他又和唐澍、刘志丹同志领导了渭华暴动，这是西北第二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因为没有根据地的依托，都失败了。从陕北同志那里，我还知道，谢子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组建了西北抗日同盟军陕甘红军游击支队，在西北第一次打出红旗，建立了农村根据地。

1932 年冬天，谢子长被陕西省委王明路线的执行人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撤销了游击队总指挥的职务，与阎红彦同志一道被开除了军籍。谢子长在蒙冤受屈之际，毫不灰心，继续从事兵运工作，并在 1933 年参加了吉鸿昌、方振武等人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他来到北平。1933年底，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委任他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西北搞军事工作。

考虑到陕北的干部十分缺乏，为开展工作，谢子长多方物色干部。恰巧那时我在北平，他就到了沙滩我居住的蓬莱旅馆，对我谈了陕西的情况，他说：陕北反动军阀采取极端反动的高压政策，残酷地镇压革命；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一支队埋了枪；陕北特委遭到严重破坏，毕维周等6位负责同志被敌人杀害，陕北正处在革命的困难时期。但我们又都认为，陕北的敌人统治势力很薄弱，这么大片地方，只驻有国民党杂牌军一个师，地方没有坚实的基础，只靠民团维持乡间的统治。老百姓深受苛捐杂税之苦，有革命的愿望。谢子长希望我和他一道回陕北开辟工作。

他对我说：“清涧、渭华暴动的失败和安定一支队的埋枪，都是没有根据地的依托。有了根据地，就有了群众的支持，敌人进入根据地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对我有利则消灭之，无利则避之，使我军完全处于主动的地位。这也是走井冈山道路，用农村革命根据地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获得革命胜利的办法。”接着，他又说：“我搞军事工作，你搞地方工作，同心协力地把咱们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建设起来，绝不能让好不容易点燃起来的革命之火熄灭掉。”听了他的一番话，我很同意，当即表示：只要组织同意，我个人没有意见。子长同志高兴地和我握手告辞，并说准备尽快向党组织报告。

很快组织上同意我回陕北工作，担任陕北特委组织部长。子长同志先我于1933年12月上旬返回陕北，先到清涧，后由陕北游击队三支队队长白雪山派人护送到安定地区。我则在12月下旬回到陕北工作。在陕北特委和谢子长同志的领导下，陕北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

二、陕北游击战争的发展

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后转到曹家洼村）召开党

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党团组织分开，分别自成系统；恢复和发展一、二、三支队；落实建立安定一带、绥靖边、神府边三个根据地的各项具体措施，并要创建绥、米、佳、吴边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

根据陕北特委的决定，谢子长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游击队，他积极发动群众，克服困难，很快恢复了红一支队，与其他四支游击队一起，建立了安定一带、绥靖边、神府边、绥米佳吴边四块苏区根据地。

根据陕北游击战争日益发展的形势和斗争的需要，1934年4月4日，陕北特委在佳县南区神堂沟召开陕北党团特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扩大陕北红军游击队，为创建一师红军而斗争；扩大已有的根据地并将几个苏区连成一片，建立苏维埃政权，广泛武装群众，组织群众，进而实行分配土地。

会议结束后，我于6月去了安定，找到贺晋年，他介绍我找到了谢子长。我向谢子长汇报了陕北特委的工作。听完汇报后，谢子长认为陕北的群众基础好，并建议陕北游击队南下，与红二十六军主力汇合，让红二十六军一部到陕北，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我向子长同志汇报完工作后，又返回清涧布置工作，调二、五支队到安定和一支队汇合。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岭正式成立了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由谢子长兼任总指挥，我兼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总指挥部下辖一、二、五支队。一支队队长谢绍安；二支队队长白雪山，政委王怀德；五支队队长崔正冉，副队长王子文，政委马万里。总指挥部成立后，即率一、二、五支队和赤卫大队（队长薛兰斌），一举攻进了安定县城，歼敌数十人，并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的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近百人。攻打安定县城的胜利，震撼了陕北各地，扩大了党和游击队的政治影响，对于推动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展，起了重大作用。

三、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 第一次分区“围剿”

在取得攻打安定县城的胜利后,我和谢子长同志遵照陕北特委的指示,率领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 200 多人,到南梁与红二十六军汇合,以取得红二十六军的帮助,配合陕北游击队打击敌人。1934 年 7 月,两军汇合后在南梁附近的阎家洼子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谢子长、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王世泰、贺晋年、龚逢春和我,以及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连以上干部、陕北游击队总指挥所属的支队长、政委以上干部。

在这次会议上,因为高岗的品质恶劣,大家一致同意撤销其职务,送上海学习。四十二师政委一职由谢子长同志兼任。会后,谢子长与我商量,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政委仍由我兼任。

当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南下与红二十六军汇合期间,陕北军阀井岳秀的八十六师倾巢出动,并配合地方民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进合击各根据地,烧杀、抢掠、破坏村庄,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分区“围剿”。面对这一严重局势,陕北特委及地方党组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佳县成立了第六支队,在府谷成立第七支队,在横山成立第八支队,并发动赤卫队、少先队及广大群众与敌人展开了艰苦的反“围剿”斗争。

1934 年 8 月,由谢子长统一指挥的红二十六军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赤卫大队进入安定一带。17 日,子长同志率部在景武塌消灭了敌八十六师姜梅生团的一个连。23 日,在绥德张家圪台歼敌两个排。在获得这两场胜利后,我军进入绥靖边无定河岸苏区根据地。当时敌人一个连在黄河和无定河汇合处的河口镇设立了一个据点,这是埋在苏区的一颗“钉子”,非拔掉不可。红军主力在稍作休整后,在赤卫队配合下,进攻河口镇,重创敌人,迫使他们逃回清涧

县城，我军收复了河口镇。

在河口镇战斗中，谢子长不幸胸部负伤，但仍继续指挥战斗。后因伤口剧痛，他才揭开衣服指着伤口对我说：“我负伤了。”我马上对他说：“你先走，我随部队撤退。”战斗结束后，谢子长率红三团和一支队到安定地区。红三团南下陕甘边时，子长离队养伤，陕北特委派薛兰岗同志带一个中队负责保卫。

四、几个苏区连成一片

粉碎敌人第一次“围剿”后，陕北特委于1934年9月，在清涧寺塬里召开了陕北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谢子长、贺晋年、王世泰、黄罗斌、马明方、崔田民、李铁轮、高长久和我。会议通过讨论，一致决定：正式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和分配土地；将红军游击队一、二、三支队改编为红军一、二、三团，并继续组建新的游击队。会后不久还讨论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问题。

寺塬里会议后，谢子长就主持了安定的分配土地工作。到1934年底，除神木、府谷、佳芦边苏区外，安定一带苏区，绥、靖、延川边苏区和绥、米、佳、吴边苏区共有14个县，纵横数百里联成一片，建立起了各级苏维埃政权。由于分配了土地，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各县都成立了游击队，红色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但是敌人并不甘心失败。在1934年的秋冬，蒋介石又陆续调集6个师，发动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除原有的井岳秀部一个师外，又调高桂滋部一个师，深入绥德、清涧、赤源苏区；冯钦哉部一个师，到南线宜川一带；孙楚、李生达两个师，到吴堡、绥德沿黄河一线；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师，到长城一线。

鉴于当时敌军压境，我向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张子华同志（化名黄汉）建议，将陕北的红军一、二、三团组成一个主力师，并调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来陕北，和陕北军民一道开展第二次反“围剿”的斗争。我看到谢子长伤重，主持工作有困难，建议调刘志丹同志北

来统一指挥，黄汉同意了我的主张。1935年1月底，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赤源县白庙岔正式成立。同时，陕西省工农民主政府也成立了。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红一团、红二团在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配合下，在秀延南沟岔、清涧高家村、延川贺家湾打了三仗，三仗皆捷，俘敌百余人，缴获枪支百余支，其中有9挺轻机枪，红二十七军第一次有了轻机枪。三次战斗，有效打击了敌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步胜利。

1935年2月1日(或2日)，刘志丹同志来到赤源，我讲了话，欢迎刘志丹同志到陕北，随即领他看望了谢子长同志。2月5日，在周家硷召开了两个特委的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崔田夫、高岗、马明方和我。会议先讨论并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两地的军事指挥。在讨论中，谈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归谁领导的问题，于是又决定成立西北工委，统一陕北和陕甘边两个根据地党、政、军及群众工作的领导。会议还对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记得在这次会议上，谢子长同志被任命为军委主席(还有一说是刘志丹任军委主席)。

两军统一后不久，谢子长于2月21日因伤重逝世了，时年39岁。由于他的名望和威信很高，惟恐噩耗传出影响红军指战员和群众的情绪，当时没有宣布，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宣布他逝世的消息。西北工委为了纪念谢子长同志，把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子长同志是一位为群众谋利益、深受群众爱戴的革命家，老百姓亲切地称他为“谢青天”。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了一位十分敬重的老领导和老战友，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革命领袖和军事领导人。子长同志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傅颐 整理)

1941年日本对苏联的立场

姜 杰 左凤荣 译

编者按：该文译自俄罗斯《近现代史》1996年第1期。文中的25件情报材料是由俄罗斯对外情报部新闻处顾问弗·尼·卡尔波夫提供给《近现代史》编辑部的。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情报材料的客观性有待进一步考证，本辑刊译仅为研究1941年的苏日关系提供一个参考。

序 言

还在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前，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的危险的策源地就已经形成了。日本统治集团提出“亚洲人的亚洲”这一侵略性的口号以后（这一口号暗指建立它在亚洲大陆的独占统治地位），便于1931年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满洲遂被占领，出现了对蒙古和苏联的威胁。在这种形势下，诸多复杂的任务摆在苏联情报机关面前。

20年代末，驻汉城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伊·契恰耶夫通过可靠的情报来源，得到了《田中奏折》的副本，其中载明：“在我们民族发展的计划中，显然有同俄国在蒙古草原再次交战的必要性，以便拥有北满洲的财富”。日本人打算一旦同苏联发生战争，就占领苏联的滨海地区、远东、后贝加尔地区。哈尔滨情报机关的同事弗·布金很快收到了这个文件。中央对它的真实性没有怀疑。

1936年11月25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并附有一份秘密议定书。这份秘密议定书的第一条款规定了德国和日本在反苏斗争中的共同措施。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

了这个具有鲜明反苏倾向的联盟。

鉴于来自“轴心国”侵略的直接威胁，国家安全机构情报部门的领导向在日本和其他国家情报机关提出的任务是：揭示日本对苏联及邻国的战争计划，揭示日本政府的外交意图及其国内局势的发展。

卫国战争一开始，远东情报机关面临着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必须对军国主义日本能否站到希特勒的德国方面作出明确回答，因为这会使苏联的处境复杂化。获得关于日本军阀的两个集团，即主张立即同苏联进行战争的陆军指挥部和倾向于先占领东南亚，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侵略我国的海军将领们之间的斗争的可靠情报，对于对外情报机构有重要的意义。

建议读者注意在1941年3月至12月期间克格勃的秘密领导人从日本、伦敦、哈尔滨、上海和重庆发回的密码电报，当时要解决的问题是远东能否发生战争。无疑，回答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国家安全机构对外情报部的这些情报电文的内容和它的领导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第一主管局局长帕·姆·费金在其上面所作的标记，以及情报均被立刻报告给斯大林、莫洛托夫、朱可夫和其他领导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按照当时通行的规则，对外情报机关领导人的密码电报要转到中央并报给领导人，然后，做出与原文相近的摘录，而电报原件则按规定程序销毁。因此，在对外情报机关的档案卷宗上被保留的只是依据情报电文作的消息摘录。这些消息的内容符合原文。

从本文发表的对外情报机关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在日本统治集团内两个派别的斗争中，东京逐渐放弃了侵略北方的计划。克格勃侦察人员的电报证明，1941年放弃进攻苏联并非像今天某些人力图论证的那样，是由于东京爱好和平，恰恰相反，日本军阀没有这种和平爱好。一切都在于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地区红军给日本军阀上了很好的一课，他们惧怕了红军的威力。对此，驻新疆的日本领事的电报中已经谈到了，他明确地提醒本国外交部，对俄国人的闪电战是

不可能的。

然而，苏联对外情报机关揭示日本军国主义计划的活动，没有仅仅限于1941年。1942年初，希特勒再次要求日本参加反苏战争。2月25日和3月4日，我们的情报机关向国家国防委员会报告，在大臣内阁会议上，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大臣们在答复这一要求时得出结论，在结束对美国的太平洋战役前，展开对北方的军事行动是不适当的。

国家安全机构的对外情报机关密切地监视着东京对苏联的每一步行动。关于日本对我国侵略的现实性问题，直到1943年也没有离开议事日程。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主动权在东线牢牢地转到了苏军手中，歼灭希特勒只是时间问题时，这个问题才被从对外情报机关的任务中取消了。

在发表苏联对外情报机关档案部关于1941年日本立场的某些材料的同时，我们希望这些材料对于历史学家和所有对这一复杂时期苏日关系感兴趣的人都将有所裨益。

弗·尼·卡尔波夫

第1号

1941年3月10日来自伦敦的报告

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政府在没有接到苏联方面肯定的保证以前（为这个保证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完全必要的），不想对苏联采取任何行动。与此同时，日本人宣称，他们期望德国人帮助其得到苏联方面的这些保证。

第2号

1941年3月17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谈到最近日本的外交意向，其中之一就是能否同美国进行战争的问题。情报界人士告知：

1、在同希特勒谈判时松冈洋右表示，如果美国最近宣布对日战

争的话,那么日本将在这种情况下同美国作战。

2、日本希望利用欧洲战机,以和平方式达到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目的。但日本政府也明白,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向南方的推进无疑会引起同美国和英国的冲突。

3、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日本力图做到:

——调整同苏联的关系;

——建立新的国家内部机制;

——在军事方面使军队和国家做好准备,哪怕达到美国的水平也好。

日本人认为,第一点和最后一点已经实现了。至于第二点,那么在这里什么也没做成,因为政府的努力遇到了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反抗。

4、海军认为同美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冲突发生得越快,对日本就越有利,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海军之间的力量对比会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日本被认为将在下列情况下对美国开战:

——美国对德宣战;

——德国和英国之间决定性的战斗开始的时候(这正是在南方扩张的最佳时机);

——如果美国完全停止向日本出口材料,特别是石油。

第 3 号

1941 年 6 月 24 日英国驻东京大使给艾登的电报摘录

德国大使向松冈洋右施加了很大压力,企图达到其使日本积极站到德国方面来的目的。他答应日本对滨海地区的要求和它所想要的一切。日本的参与是表现在武装行动上,还是表现在采取不准载有给养和其他物资的轮船驶近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海参崴)的措施上,目前还不清楚。

为了对抗德国人的阴谋,英国大使提出的方案是:艾登亲自写信

给松冈洋右,陈述在苏德战争中奉行严格中立对日本有利的理由。

第4号

1941年6月26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随着苏德战争的开始,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大概会出现以下情况:

日本现在还没有积极打算反对苏联,例如:宣战和站到德国方面。尽管尚不清楚这一政策今后怎样改变,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企图。对苏联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没有宣布自己明确的态度。日本想静观战争的发展。据说,日本这种政策被解释为有下述原因:日本不准备同苏联宣战。不应该急于参战,如果将来需要这样做的话,那么这发生得越晚,带给日本的牺牲就越小。近来,由于担心同美国开战,日本有许多议论要重新认识三国军事同盟。5月30日,松冈洋右在外交政策讲话中承认,这种意见相当盛行,也相当广泛。如果日本对苏开战,那么美国将对日本开战,日本将被迫在两条战线上作战。简而言之,日本现在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对外政策,因此它对苏联的态度还未确定。日本权威人士认为,日本向南方的扩张不会很快实现,因为海军对此非常谨慎,至于北方,陆军对此也未准备好。

第5号

1941年6月27日来自哈尔滨的报告

鉴于德国已进攻苏联,日本对该消息的最初反映是:

当地的日本上层人士保持沉默。一系列的事实表明,他们期待着西方这一重大事件发展的结果。根据我们在哈尔滨得到的情报资料,德国最后通牒式地要求作为“轴心国”的日本在4天之内决定自己的立场。这些情报通报说,日本开始向蒙古边界集结陆军和炮兵,加紧战备。在日本居民中间,担心同苏联开战的恐慌不安在加剧。据一份没有得到证实的资料,日本正在征召后备军。

第 6 号

1941 年 7 月 7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政府早已获悉德国人要进攻苏联,该政府的立场也早就明确了,即要站在德国一方,但要选择有利时机。

日本外交部决定把所有外交部工作人员的家属撤回国。今年 6 月 27 日,根据外交部的建议,政府下达了指令:在必要的时候解决所有外交部工作人员家属返回日本的问题。

至于日本今后的政策计划要点,这里的人士认为,日本将开始向南推进,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北进军。权威的政治家们预测,日本政府将宣布对苏德战争奉行中立立场,但这一立场不会持续长久。

在经济界传出消息,似乎苏联提出把萨哈林岛给日本,以保证日本的中立。

总的意见是这样的:早晚都要同苏联开战,但现在不是时候,必须用较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成果。

第 7 号

1941 年 7 月 5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日本政界提供的信息。

很快将完成在南方作战的准备工作,此后会按照下列计划在这一方向迅速发动进攻:向印度支那南部派遣军队,给泰国以军事援助,进而进攻新加坡。利用一切可能,避免同美国作战。如果无法逃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也要不惜同美国开战。

对苏联的政策,目前由下列因素决定:不久前缔结了中立条约,撕毁条约会引起居民的不满,进攻北方的准备尚未完成,因此,日本应该持中立立场。一旦在亚洲建立新秩序的工作顺利完成,日本终究要开始同民主国家和苏联的战争,所以向北方推进的军事准备应该加速进行,目的是在任何时候均能与苏联开战。

第 8 号

1941 年 7 月 7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形势开始明了,日本政府决定不卷入对西伯利亚的直接军事行动,而代之以决定向南方推进。为此目的,日本军队被从法属印度支那北部调往南方。来自其他地方的军队正在秘密集结。同时,政府决定最近召集国会特别会议。情报资料指出,在国会议员中,有 70% 赞同向南方推进,只有 30% 赞同向北方推进。情报资料补充道,日本人无论如何都不想向北方推进,他们清楚,为此需要不少于 2 至 3 个月的准备工作。

第 9 号

1941 年 7 月 10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我们的情报,停泊在横滨和横须贺港的日本海军,7 月 7 日几乎全部启锚并开往南方港口。海军军官在相互交谈中说,现在是向南部沿海国家发起进攻最有利的时机,因为苏联正忙于同德国作战。

对 1941 年 7 月 10 日报告的补充:

现在日本正进行秘密动员。征招年轻人入伍,因为老的基于军人已经疲劳了,他们宣称:“我们打了 4 年仗,而海军却发福了,现在让他们去战斗吧。”

海军直至最后一艘舰艇都开向南方,但具体开到哪里,尚不清楚。

第 10 号

1941 年 7 月 12 日来自上海的报告

根据日本海军界提供的情报:

——到今年 3 月 15 日,日本海军正式编制共有 435 艘舰艇,全部服役的官兵有 11 万人,这占其战斗力的 75%;

——排水量为 2900 至 3200 吨的舰艇有船员 1500 人,而“纳甘

达”号 1500 人。在战时其人数可能增加 25%；

——在日本港口现有 14 个所谓海港守备队，共有人员 23 万人；

——在日本统治下的东部岛屿上的常驻海军兵团属于日本第六舰队，计有 15 万人；

——专门的空降兵部队现在增加至 6000 人。

日本海军官兵总数为 36 万人，由 6 个年龄段构成。有一定年龄限制的最高限额的海军后备军超过 50 万人。

第 11 号

1941 年 7 月 24 日来自上海的报告

根据来自中国方面的情报，发现日本军队从华中向北方调动。但军队不是全部调走，而是在原地留下了一部分。

至于说到日本最近的计划，据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的意见，日本人准备向南方扩张是伪装，目的是转移人们对其准备进攻苏联的注意力。为此，日本人将有两个月的最长期限，但其前提是在此时间前德国人不致失败。

第 12 号

来自东京的报告(原文未注明时间——译者注)

谈到日本的内外政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东京的情报人员说，根据得到的情报，松冈洋右和平沼骐一郎之间的分歧是日本内阁辞职的原因。政府，尤其是御前会议不喜欢松冈奉行的政治路线。丰田贞次郎接替松冈任外相表明日本现在的微妙形势和奉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坚定意向，也就是说日本不仅要有对苏联的外交自由，而且有对德国的外交自由。日本将会得到德国方面不愉快的意外的消息，这是可能的。现在，由于解决中国事件的极端必要性和注意到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之间缔结军事同盟的可能性，日本最终将站到德国方面。当远东发生战争时，日本不可能指望德国现实的援助，

而单独与4个强国作战将是艰难的。对苏联，日本将试图通过谈判促使苏联让步，也就是说，苏联要从边境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撤走军队、保障萨哈林岛上石油的正常开采、可能还有出卖北萨哈林岛，来换取日本的中立。日本今后的政策将取决于苏联对日本的这些要求到底持何种态度。

第13号

1941年7月27日来自重庆的报告

似乎开始明朗，7月2日和3日的御前会议讨论了日本对苏关系问题，在会上，松冈和军事大臣好像反对那种使日本反对苏联的主张，他们的论据是：

- 日本还没有在军事和经济方面准备好反对苏联的大规模战役；
- 如果日本反苏将导致与英国、美国的关系紧张；
- 破坏中立条约对日本不利，因为这会引起日本国内的强烈不满。

第14号

1941年8月29日来自哈尔滨的报告

来自莫斯科的一位日本外交官在8月27日一次与当地日本人的非公开谈话中说：“当然，德国人失算了”。他把德国人征服苏联的行动称作是“希特勒的冒险”。根据驻莫斯科的日本大使馆的意见，苏联能够坚持到春天。这一消息使那些期待日本立即参加反对苏维埃联盟的当地日本人十分扫兴。在私下谈话中，这位知名的日本人士（吉泽）说，一般说来与苏联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开战时间取决于西方的战事发展情况，他暗示：“在春天到来前我们可以平静地生活”。

第 15 号

1941 年 9 月 20 日来自上海的报告

根据我们的情报,日本军界领导人认为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问题已经决定了,并在等待有利时机。德国人确信,在他们占领列宁格勒后日本会加入进来。如果日本政府脱离了轴心国,那么军队内部会发生政变,甚至刺杀天皇。

确认了对苏联战争的可能性后,日本开始搜集有关在远东的红军、在堪察加、鄂霍次克、白令海峡的海空军基地以及铁路线上的军力部署等情报。日本总参谋部确信,符拉迪沃斯托克将在 9 月被封锁,与此同时,将从朝鲜和蒙古向上乌金斯克发动进攻。

总参谋部一位对与苏联的战争持否定态度的知名军人也声明说:很明显,这是不可避免的。从他的话可以得知,在满洲集结了 20 个师及坦克部队的兵力。所有从福摩萨(台湾)、江南和福建诸省调出的步兵正在向中国北方开拔。

第 16 号

1941 年 9 月 26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在东京的苏联克格勃的间谍首长报告说,一位日本有影响的政界人物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阐述他自己对发展日苏关系的看法:

“你们应该明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不像你们感觉的那么好。在最近一周,德国多次要求日本起来反对苏联,并占领西伯利亚。但是,日本不想这么做。天皇本人反对与苏联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德国对日本的立场十分不满。来栖大使在很长一段时间未能见到里宾特洛甫,因为后者不想见到他。奥特也不满并对丰田贞次郎十分憎恨。在日本有许多国务活动家认为缔结三国军事协定是个错误。内阁逐渐改变了对协定的态度,因此,近卫首相任命一位来自海军的人物任外相不是偶然的。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么做(几天前逮捕了准备刺杀近卫的 4 个人)。”说到日本近期政策,他宣布,日本主要

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解决延续了4年之久的中国事变。“你们自然会问我，为什么日本进行动员并把大批军队集中到苏联边界？我这样回答：政府内存在两种意见，一种赞成最好把军队集中在苏联边界；另一种赞成用和平途径解决一切问题。

此外，我们调遣这些军队是鉴于日本正在与美国谈判，为了给美国留下这种印象。美国害怕苏联与德国单独媾和。我们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我们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中，苏联可以使我们多一个筹码。至于谈到苏联本身，我们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苏联能够公开声明拒绝援助蒋介石。假设这种情况出现，那我们将是日苏关系骤然改善的见证人。”

第 17 号

1941 年 10 月 23 日来自伦敦的报告

从驻远东的英军武装力量总司令发给英国军部的电报中得知：

1、日本现在开始明白，与美国、荷兰人或者我们之间的战争大概将是与三个强国同时进行的战争，显然也是与俄国的战争。

2、日本现在集中军队用以对付俄国人，但是不可能突然调动位于南方的军队，尽管日本人可以在我们不知不觉中把空降兵从日本海域派到那里登陆。我们更多地断定，日本在目前情形下不那么想在南方被引入大规模战斗，所以，日本现在应该对压力很敏感。无疑，这种压力不应该太大，以致于使之迫使日本铤而走险，尽管这些冒险会失败，但这将迫使我们承担极其不愿承担的义务。现在具有利用日本暂时弱点以利于我们的可能性，这种机会不要错过。

3、现在下列因素使日本人很不安：

——大不列颠和俄国之间的军事协定；

——在大西洋和近东我们状况的改善；

——美国和“轴心国”之间关系的紧张，根据他们的看法，在远东存在着大不列颠和荷兰人之间达成军事谅解协定的最大可能性。

4、还要注意到下列情况：

——他们对德国在冬天到来前能否迫使苏联接受和平没有信心；

——对他们来说，拥有一定时间来结束在北方的战役是必要的，其目的是腾出手在南方活动，即便是俄国的反抗（在西方和东方）的失败将成为既定事实也要这样。

——也要考虑到从11月到次年1月南中国海域的恶劣天气，——我们认为日本能够马上制定某种南进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可能性很小。

5、所以，在增加我们的防御措施方面我们现在应该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的战略态势，为的是削弱日本战略地位。

6、……为此目的，我们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应该迫使日本从法属印支撤回自己的军队，如果可能的话，则向日本人做出某些经济上的让步，这些让步不仅可以被他们用来挽救自己的声誉，而且也吸引日本加入同盟国阵营的第一步。这些在削弱日本与“轴心”强国亲密关系方面必要的预先措施，曾被德国自己在进攻俄国时所实施。

7、日本应该明白，德国的许诺一文不值，站在轴心国行列意味着做德国的一个卒子。毫无疑问，日本人应该怀疑，总的看德国能否赢得战争，况且日本国内局势正在恶化并陷入了日本总在担心的“封锁”，由于日本采取错误行动而使这种“封锁”开始成为现实。现在日本自己未必能够找到某种成功地摆脱业已形成局面的出路。

8、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最近几个月日本将努力避免在南方的战争……假设日本能从法属印度支那撤军，我们的战略地位会得到很大改善。因此，我们要与美国一道对日本施加压力以迫使它从那里撤出自己的军队。在我们不具有足够的力量以实现和支持政治压力之前，这种压力应该以经济为基本手段。

9、与经济压力相适应，还应该采取一定的军事和秘密的措施，这些措施本身不是迫使日本人采取极端行动，同时，在谈判时加强我们

的力量以减少日本采取敌对反映的可能性。

第 18 号

1941 年 11 月 3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可靠来源获得的情报，日本还没有打算北进。在近期坚定地决定南进。日本现在得不到石油而靠自己的储备过日子。这种情况不能长久坚持下去。唯一的出路是南进。

材料提供了有权威的日本政治家对日苏关系的预测。比如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大仓金茂男爵——上院议员，阐述了自己对日苏未来关系的看法。在他看来，德国将占领俄国整个欧洲部分并沿乌拉尔山脉划界，以后德国不可能再继续向前推进了。苏维埃政权将继续存在，并以西伯利亚为基础。苏联为了坚持斗争，将需要英美的援助或者被迫与德国媾和。在美国援助下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巩固对日本构成了现实威胁，日本将被迫与苏联开战。因此，日本早晚要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最好现在，恰值苏联与德国战争遭到削弱时就这么做。无疑，远东的红军还很强大，与之作战不那么容易，这是制约因素。

第 19 号

1941 年 11 月 14 日来自伦敦的报告

消息来自英国驻东京大使给本国外交部的电报。极端分子主张现在就对日本政府施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的压力。与此相应，完全可以相信，内阁或者被迫辞职，或者改变现在的立场转而奉行战争政策。战争的辩护士确信，日美之间的谈判只是幌子，因为美国和大不列颠在事实上坚决执行彻底扼杀日本的政策。这种情况和增加对蒋介石的援助一起没有给日本留下任何选择余地，如果它只是想保持自己强国地位的话，只有“突破”这种局面。近卫内阁的组建就有削弱日美间紧密关系的意图，况且现在事态的发展迫使日本恢复与

“轴心国”的紧密合作，这种合作在松冈时存在过，尽管日本大多数民众不喜欢这么做。在日本外交界，人们认为，如果近期日美谈判中不能出现某种有利的转机，军队将把国家推到战争的边缘。然而现在日本人期望，日本人民的基本群众对于把国家拖入更大规模战争的反对立场将具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军队的战争政策瘫痪。

实质上，只有在最后一刻国家才能采取断然措施，但是这是冒险的游戏，必须使美国和大不列颠试图拖延时间而不要把事情弄到在现阶段发生冲突的地步。人民的反战情绪和有利于使日本脱离“轴心国”的趋势在发展，如果这能再持续几个月，军队的影响将会衰落。

第 20 号

1941 年 11 月 5 日来自伦敦的报告

根据我们得到的材料，驻新疆的日本使节向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馆发去的电报说：俄国人从远东调走了 20 万军队，但至今这里仍有将近 100 万士兵，2700 架飞机，2500 辆坦克和 3000 辆装甲车。但满洲军队只能够提供 80 万士兵。因此，十分清楚，闪电战在反对俄国人的战线上行不通，在结束中国事变前不允许向俄国发动进攻，对此，这里的所有人都明白。因此，日本人要避免进行危险的军事调动，但不会有人反对南方调动一定数量的军队。

第 21 号

1941 年 11 月 19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来自日本的材料已经清楚，如果日美间的谈判不会导致理想的结果，那么日本人将占领泰国。为该战役而进行的一切军事准备已完成。向印度支那派去了新的日本司令。已不可能再拖延解决这个问题了。日本人认为，现在北方没有人威胁它，而美国未必为了泰国而在太平洋开战。据日本权威人士的看法，日本在今年要解决建立“共荣圈”的问题，但要从南方而不是从北方开始。甚至在最难以预料

的转折时刻日本在春天前也不会对苏联采取行动。

第 22 号

1941 年 11 月 25 日来自东京的报告

根据我们的情报,驻中国的日本大使馆政治部长官小野宇己声称,谋求在太平洋的和平及与中苏的亲善是日本新政府的政策。不仅美国和英国,甚至还有德国人都企图把日本拖入对苏战争。当然,日本需要石油,如果与美国的谈判毫无成果,那么日本将不得不占领荷属印度。日本国务活动家的看法就是这样。根据另外一些日本外交官的看法,日本的燃料储备最多够用一年。军人的愿望是占领苏联的远东地区,这是空想。在英美圈子里,人们企图推动日本向苏联的萨哈林进军,但萨哈林的石油不能保障日本的需要。

根据日本人的说法,英国人和美国蓄意传播日苏将发生战争的传闻。日本清楚地知道,冬天在西伯利亚战斗多么艰难。此外,西伯利亚不能给日本提供汽油、铁和橡胶。

第 23 号

1941 年 12 月 5 日来自伦敦的报告

从 1941 年 11 月 27 日日本外交部给自己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得知:日美间的谈判陷入了死胡同,日本政府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日本政府要求大使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会晤,秘密地向他们通报目前已形成的局面。民主国家正在东方简直像专制君主那样行动。他们调动军队并迫使日本做出极端的抉择。这些可能引起武装冲突,很显然,这比预想得更快。……一旦与民主国家开战时,日本将在远东继续牵制俄国人,如果俄国人和民主国家结盟进攻日本,那么日本将坚决反抗。

日本政府要求大使向希特勒说明,日本的主力将集结到南方,而在北方将放弃预先计划的行动。

第 24 号

1941 年 12 月 22 日来自上海的报告

根据可靠来源提供的材料,力图吸引日本与苏联作战的德国人在东京加强了活动。德国人指出,斯大林至今对中立没有表态,美英的代表在莫斯科利用一切手段把苏联争取到自己一方来,因为没有苏联,英美将被日本击溃。如果苏联和民主国家结成联盟,那么胜利将在他们一方。

在东京存在着另一种看法:如果苏联恪守中立,那么“轴心国”将在结束与英美的战争后,应该以联合的力量最后消灭苏联。如果日本被迫与苏联开战,那么日本也只能在不大的疆域内,假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堪察加进行战斗。日本把符拉迪沃斯托克看成是东方的直布罗陀,并担心这一地区被美国人占领。日本人认为,堪察加像远东地区一样,应该中立,这样就使日本免去了从背后遭袭击的危险。

在日本,许多人都在考虑,首先消灭美英还是消灭苏联的问题。经过认真研究他们得出结论:现在莫洛托夫——松冈协议两国都在遵守,没有理由使其中一方破坏该协议,已经决定在太平洋开战,同时加强关东军,以使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占领远东和使日本的后方不会受到威胁。

但是,这并不排除在苏联表现出对美英的同情、甚至秘密帮助他们的情况下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日本人确信他们有证据证明莫斯科正在采取两面性的立场。

按照关东军盛行的看法,苏联只是在等待时机。如果苏联能够粉碎德国人,那么它会站到民主国家一边并在紧要关头给日本以打击。关东军界猜测,日苏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朝鲜和满洲方面的日军要时刻做好准备。关东军司令部认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远东苏联是不需要的,这些地区最终应该脱离苏联并入日本。

日本人说,俄罗斯的道路是通向南方,通向波斯和印度,如果苏

联把自己的力量转向那里,那么这将只会受到日本和“轴心国”的欢迎。在上海的日本海军界人士认为,堪察加现在正成为观察日本人动向的重要地区,因为美国人和莫斯科达成协议,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日本人将不得不提防美国人利用堪察加而亲自占领苏联沿海地区的时刻将会到来。但是日本人认为,日本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很困难,况且德国人正遭受失败并将被击溃。

我们认为,日本人没有放弃与我们作战的想法,尽管他们对这一想法感到恐惧。对日本在1942年春天可能进行反苏战争的情报应持分析的态度。因为不能排除日本在1月或2月开始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再次重演旅顺口事件的可能性。同时对日本在小范围内开始反对我们的行动也要注意。

第25号

1941年12月24日来自哈尔滨的报告

在有权威的日本人圈子中有一种说法,与日本的战争问题完全取决于苏联的立场。如果苏联给美国提供基地或者有迹象表明苏联消极加入到英美方面,日本人将马上与苏联开战。这未必会在春天到来前发生,因为事实上堪察加的空军基地在冬天不能用。与此同时,日本人神经质地注视着苏联的行动,特别是艾登到达莫斯科一事,此举似乎是有意把苏联拖进对日战争。这一切都说明形势十分微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日本在冬天不想开战。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五十年评述

(1946—1996)

张会才 韩凤琴

前 言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50年,是战后日本中国研究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始于本世纪20年代末的战前日本中共党史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日本的中国研究,始于19世纪后期,到19世纪末、本世纪初才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当时称之为“支那学”。

“支那学”在创建之初,不少学者曾经进行过严肃的、认真的学术研究。但是,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实施,“支那学”就其总体而言,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服务的。战前的日本中共党史研究,表现得尤为明显。

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学者中西功讲得十分简洁、明快。他说:“百年来,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基本上是错误的。当然,这不是说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水平不高,恰恰相反,战前日本有世界一流高水平的研究和调查。然而,战前日本的统治阶级执行的是世界上最拙劣的对华政策,而且他们通过战争和暴力破坏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从本质上讲,他们对日本自身的认识就是错误的,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为了挽救业已垂死的帝国主义日本,只允许研究工作对他们的政策有利,他们培养和宣传的是为其所用的中国观。”^①

① 中西功:《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日本青木书店1969年版,第1—2页。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给“支那学”以巨大冲击，从而使战后日本对中国（主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原有的一些纯粹为军国主义服务的研究机构，如“东亚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被取缔；一些学者力图摆脱政府的控制。在研究机构的结构和人员的组成上进行了重新组合，逐渐形成了多层次的中国研究体制。

第二，“支那学”的名称被一些学者所摒弃。于是，“中国学”、“中国共产党史”的名称代替了战前的“支那学”、“支那共产党史”。这些名称变换本身，反映了越来越多的学者抱着重新认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他们在反省过去的研究，探寻研究中国的新领域和新道路。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日本“中国学”，尤其是“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战后50年，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重建”阶段（日本投降至50年代中期）；二、“展开”阶段（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三、“探索”阶段（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期）。

从宏观分析，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50年的特点可以用16个字加以概括。这就是：一个中心；两条道路；三次论战；四大学派。

所谓一个中心，是指研究的重点。战后日本的中共党史研究往往以人物研究为重点。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以毛泽东研究为中心；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则以邓小平研究为中心。

所谓两条道路，是指研究的方法论。一条道路是借鉴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经过独立思考，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建设事业的成就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对中共党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另一条道路是借用西方政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常常采用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所谓三次论战，是指研究的焦点。第一次论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后，由承认不承认人民共和国引发的；第二次论战是围绕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展开的。这次论战异常激烈，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第三次论战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围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怎样理解邓小平的路线展开的。这三次论战，最后导致了日本中共党史学界的分裂和重新组合，同时推动了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

所谓四大学派，是指学者的背景。这四种背景是：中国背景、美国和日本政府背景、日本共产党背景、京都学派背景。

“重建”阶段

从日本投降后到 50 年代中期，是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建”阶段。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宣告了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近代中国观的破产。日本旧“支那学”虽然曾经以相当大的规模对中国进行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感情，对中国革命政党，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深入的研究却极为有限。因此，战争的失败，事实上也就宣告了旧“支那学”的终结。

—

当旧“支那学”崩溃的时候，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日本中国学家们便开始反省战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了。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日本《世界》杂志于 1949 年 8 月出版一期专辑：《如何观察中国的现状——支那学者的回答》，记述了在思想上反省的状况。

京都大学教授贝塚茂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业已是决定性的了。”他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指出，必须把中国革命作为世界史中的革命运动之一环来理解。为了正确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史学者应该成为世界史学者，中国史学者“必须自身来一次革命。”东京大学

2014年12月

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松本善海指出，“中国研究者自身的反省是先决条件。”他指出，重建中国研究的基础在于反省过去。专门研究中国法律的东京大学教授仁井田陞认为，“中共革命，是中国许多‘革命’中的一部分，但我要说它才真正称得上‘革命’——国家权力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他高度地评价了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他还指出，应该反省以前的方法，探索研究中国的新方法。^①

1949年出版的《中共三十年》一书作者大久保泰在书的序言中指出，“关于日中关系，必须清算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思维方式。我们的研究应该站在全新的立场上重打鼓另开张。”^②

按照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的说法，战后初期的赎罪意识，构成了战后中国形象的基本形式^③。

战后日本出版了一些战前无法出版的日本革命者研究中共党史的著作以及进步的文学作品，大量翻译和介绍中国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著作。目的在于让日本国民和学术界听到中国人自己的声音，从而真正理解中国，反省过去。这是思想上反省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成为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重建”阶段的基本特征。

“重建”阶段日本翻译出版中国的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著作有：岛田政雄译《毛泽东的青年时代》（1950年），毛泽东选集刊行会译《毛泽东选集》（1952、1953年），尾崎庄太郎译《实践论》、《矛盾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2年），鹿地亘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52年）。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抗日文学作品有：鹿地亘译周立波《暴风骤雨》（1951年），岛田政雄译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1952年），安藤彦太郎译郑振铎《烧书记——日军占领下的上海知识分子》（1954年），竹内实译吴运铎《把一切献给党》（1955

① 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门》（下），山川出版社1983年版，第493、494页。

② 大久保泰：《中国共产党史》（上卷），原书房1971年版，第1页。

③ 竹内实：《日本人的中国形象》，岩波书店1992年版，第174—176页。

年)等。

另外,1949年至1956年,日本旅行者前来新中国的人数有两千余人。当时,出版有45本游记。

所有这些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共党史著作以及有关中国的译著等的出版,对打开日本国民和日本中国学者的视野,反省战前的中国观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此期间,原有的中国研究机构也进行整顿改造,加强了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也成为其中的主要内容。

二

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建是艰难的。但是,尽管如此,日本学者还是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解放区工作的野坂参三等一批日共党员,在日本投降后先后回到日本。应该说,战后最早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介绍到日本的,是日本共产党系统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做这项工作的。

在日本,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著述是很受欢迎的。当时日本出版了不少研究文章和著作,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和中国革命。如岩村三千夫于1948年写的《毛泽东的思想》一书,高度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毛泽东相信他的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版。岂止如此,我们越放眼于亚洲,就越发感到毛泽东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亚洲版的代表。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国革命所处的条件同亚洲各国及其民族解放运动所处的条件基本上是一样的。”

贝塚茂树在195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一书中,把孙文与毛泽东作了比较。“孙文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孙文始终是一位充满幻想的浪漫主义者,他忘记了观察脚下的现实。而毛泽东既是一个热烈的浪漫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极其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不仅如此,也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同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人道主义相结合的胜利。我在写毛泽东传时,就是想通过研究他的思想来阐明这种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很好。一方面由于我们在1951年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等,使日本人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另一方面,斯诺的《西行漫记》在1952年被译成日文,对这种形象的树立起了很大作用。宇野重昭在1971年出版的《毛泽东》一书中记述了《西行漫记》的作用,他认为斯诺对毛泽东的描述给50年代的许多日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影响很大,使他们深受感动。

宇野重昭认为,当时毛泽东的形象是“与斯大林不同的明快的大众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家,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思想家”。

松村一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进行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1952年《思想》杂志第9、10、12期上,他以《矛盾论》为中心,比较精确地论述了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和特点。

他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如果不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我们就不能谈论马列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马列主义哲学具体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实际,并具有中国民族的形式,而且还具有国际意义。”

松村一人指出,毛泽东哲学的根本特性是哲学家的群众化与民族化。“毛泽东的《矛盾论》(以及《实践论》)的意义不只在于它的理论正确并包含有新的内容,而在于它集中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斗争经验,因此,不仅对某些所谓的专家,而且对一切为推动历史前进而奋斗的人们来说,它成了他们工作与经历中需要经常掌握的指针。毛泽东吸取理论的源泉,首先是广大人民为本国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进行斗争的经历,因此,这样的集中也可以深入到所有人民的最主要的工作中去。

“毛泽东在其著作里反复强调要学习群众的智慧和语言,批判地

继承从孔子到孙中山的历史遗产，而毛泽东本身就在这方面作出了榜样。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中都贯穿着对中国思想遗产的深入继承。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怎样把马列主义哲学变成了与民族血肉相连的哲学的。

“哲学同本国的革命理论相结合，哲学贯穿于以解放为目标的经常的斗争之中，哲学同民族的智慧相结合，这就是毛泽东哲学的第一个根本特征。”

松村一人认为，毛泽东哲学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它彻底地打破了对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毛泽东在理论上创造出了克服一切公式主义并符合于复杂的客观世界的辩证法。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明确地提出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并将其加以解决。因此，毛泽东辩证法理论中的新内容，给马列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的新的理论财富，正是这样创造出来的。牢牢地掌握这一点，是发现毛泽东辩证法的新意义的关键。”

“对于重建”阶段取得的研究成果，日本学者并不满意。山根幸夫认为，日本战败后发表了不少基于新立场研究中国革命的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然而，相当一部分都是些应时文章。总之，研究上的贫困令人悲叹。他指出，尽管中国革命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是日本的研究成果却十分薄弱。他期待今后的中国研究不要只局限于部分人，而应该新人辈出，呈现真正研究的局面^①。

山根幸夫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笔者认为，战后日本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建”阶段仅有10年时间。日本在思想上反省，研究机构上重组，做了不少工作，翻译出版许多中国的著作，并且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其中以两部中共党史研究专著为主要代表。

1、中西功的《中国共产党史》

^① 日本史学会编：《日本历史学界的回顾与展望》（第15册，中国近现代），山川出版社1987年版，第2—3页。

中西功,1910年出生于日本三重县农村,1929年作为公派留学生进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在校期间,因参加学生运动而遭逮捕。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回日本,在无产阶级的科学研究所和中国问题研究会工作期间,第二次被捕,不久获释。1933年返回家乡三重县从事农民运动。1934年在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工作,后由尾崎秀实介绍进入“满铁”。1936年与“满铁”的大塚令三一起进入原江西苏区,收集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资料。1938年再次同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联系,并成立秘密的反战组织。1939年参加“满铁”调查部的“支那抗战力量调查委员会”。1942年在上海被捕,后被引渡到东京警视厅,判处死刑。在狱中,中西功坚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史》。日本投降后,他于1945年10月出狱。战后,参加筹建中国研究所,并任《人民》、《民报》编辑。1946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47年当选为参议员,并任共产党国会议员团主事。1948年作为共产党代表参加建立拥护民主主义同盟工作。1950年,因与共产党主流派发生矛盾被开除出党,组成中西派。1955年恢复党籍,曾在共产党中央劳动组合对策部任职,1958年至1963年任神奈川县日本共产党委员会委员长。1960年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被捕。1966年后继续研究中国问题。1973年8月病逝。

中西功有关中国的著作有:《中国共产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暴风雨中》、《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等。

中西功的《中国共产党史》除了序篇外,共分四卷。序篇概括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第一卷从已经结成的统一战线的角度论述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孙文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第二卷论述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研究了在变化的革命形势下,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是如何犯错误的,造成了怎样的悲惨后果,有什么惨痛教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问题。第三卷研究了苏维埃革命问题。即在激烈的斗争中,中共得到了哪些锻炼,苏维埃革

命和它的政策为什么必然要发展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的领导人从中学到了什么。中西功特别把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随着客观形势变化所采取的策略变化以及苏区政策问题上。他自己认为，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贡献的话，那主要就表现在这一卷里了。第四卷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共产党”。

日本投降后，中西功在狱中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史》分成四册在日本公开出版，书名分别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人民社，1946年6月）；《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北斗书院，194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民族统一战线——1935至1937年的中共》（大雅堂，1946年11月）；《武汉的革命与反革命》（民主评论社，1948年4月）。

《中国共产党史——苏维埃革命时代》即《中国共产党史》第三卷。原由11章组成，第一章，“新阶段与新形势”；第二章，“苏维埃革命的基本问题”；第三章，“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方略”；第四章，“暂时失败到再度高涨”；第五章，“李立三路线与党内斗争”；第六章，“苏维埃革命的大发展”；第七章，“激烈的内战”；第八章，“苏维埃政策的诸问题”；第九章，“白区工农运动与抗日反帝斗争”；第十章，“苏维埃革命的紧要关头和北上抗日”；第十一章，“大西迁和西北新根据地”。

可惜战后正式出版时，只收录了第一章至第三章。

笔者认为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正确地认识了苏维埃革命时代

中西功所论述的苏维埃革命时代是指土地革命时期。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阶段，是中国革命一个小的战略阶段，一个特殊的阶段。第一次大革命最后的防御阶段（1928年8月至12月），实质上是苏维埃阶段。即（一）民族资产阶级叛变革命，转向反革命方面。除了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所有的政党都成了反革命；（二）小资产阶级民众极度动摇，只有工农大众在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下继续捍卫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工农大众把反帝斗争同彻底排除

一切封建剥削结合在一起，特别把土地革命作为这次斗争的主要内容，同帝国主义和地主政权（军阀或国民党政权）相对立。在这个时期，中国革命必然要转入苏维埃阶段。

他指出：实际上，苏维埃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工农大众和城市贫民参加的统一战线，反帝与反对国民党政权，实行土地改革三者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这个阶段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同。因为它是完完全全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所以它必然遭到帝国主义、地主、及民族资产阶级和叛变的小资产阶级各政党的联合攻击。1928年至1937年的苏维埃革命是以极端落后的深山僻壤为根据地，在艰苦的、不利的恶劣条件下进行战斗。

（2）独到的高度评价

中西功以独特的视角高度评价了苏维埃革命时代。他写道：在恶劣的条件下，中国革命通过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逐步发展起来。中国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实践在政治、组织和军事上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中国无产阶级学会了组织无产阶级斗争，领导农民斗争和军事斗争。但是尚未学到领导艺术。十年苏维埃革命的艰苦奋斗，真正使中国无产阶级得到了巨大锻炼。第一次大革命的遗产是宝贵的，但却无法同苏维埃革命相比。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苏维埃革命，积累了经验，认识到必须建立革命政权，必须组织革命军队，必须制定战略策略。不仅如此，通过对革命的巧妙领导，在撤退时有效地保存了实力，为革命向新阶段转换打下了基础。

中西功还写道，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不是在延安，而是在瑞金的艰苦奋斗和大西迁中奠定的。如果没有江西的艰苦奋斗和经验教训，也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苏维埃革命的意义，无论怎样高度评价也不为过。

中西功接着指出，对1935年中共的政策转变，是在吸取苏维埃革命全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发展，是一个划时代的新阶段。离开苏

维埃革命,就谈不上今天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决不仅仅是环境的变化。

苏维埃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划时代新阶段,主要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无产阶级单独领导反帝斗争和土地革命。

由于资料的不足,作者对土地革命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没有谈及。同时,对一些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2、小岛祐马的《中国共产党》

小岛祐马,生于1881年。1907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律科,1912年从该校哲学科毕业。1918年任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讲师,1922年任副教授,1925年赴法国留学,研究中国哲学,1931年获文学博士。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36年任该校文学部长,1939年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41年退休,1942年获名誉教授。1966年病逝。

小岛祐马与宇野哲人、诸桥辙次三人被誉为日本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史的“老前辈”。

其主要著作有:《古代支那研究》、《中国革命的思想》、《中国共产党》、《中国思想史》等。

小岛祐马的《中国共产党》(日本弘文堂,1950年)一书由六章组成,各章的标题是:序章;第一章,“民族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第三章,“苏维埃运动的挫折”;第四章,“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第五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第六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概评;年表。其研究特点是:

(1)从社会变动中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小岛祐马认为,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起源,首先应该从研究五四运动开始。因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民族运动的基础。他还认为,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所以必须研究新文化运动。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5月发生的,当时共产国际并未插手五四运动。在这场运动是举国性民

族运动这一点上,可以说它为共产国际撒播共产主义的种子创造了条件。

(2)重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小岛祐马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很感兴趣。他的理解是: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叫民主主义革命,第二阶段叫社会主义革命。现阶段首先要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要暂时放一放。小岛祐马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它具有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环开展斗争才能取得成功的性质。它与以往的民主主义革命有很大不同,因此它作为中国革命的历史性特征,称作“新民主主义”。小岛祐马在书中从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三个方面,详细地介绍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内容。而且,他高度地评价说,“有人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在理解世界共产主义方面,是1917年以来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发表的最为重要的文献,我想恐怕可以这样说吧。”

(3)客观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意义

在日本中国学界,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问题,曾发生过一场争论。竹内好在1949年12月号《思考》杂志上发表的《剖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篇评论中指出,“当国民想看到这一历史事件时,那些原‘支那学’学者们却在旁边用手挡着不让看,这种做法实在令人难以容忍。叫嚷邻国的赤化威胁我们国体因而出兵侵略的军阀已不复存在,因而与其附和的‘汉学’家们悄然无声,这是件好事。但是拒绝现实派的‘支那学’学者蛮横无理,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日本国民依然难免于灾难。”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

而小岛祐马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已经掌握了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政权。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重大的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对立,是处在所谓两个阵营的冷战状态。正当将来的世界是被共产

主义赤化,还是被资本主义席卷这样两者必择其一的重大时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不能不耸动世人之耳目。”“今天苏维埃俄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人口,总共不过6亿左右。世界其他地区,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这些物质文明落后的地区的人口有15亿。这15亿人口的动向,将在今后世界战争(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的发展中扮演决定性角色。在这15亿人口中,具有高度文明,拥有极大的经济潜力,而且占有三分之一人口的是中国,它确定的任何方向都将左右未来世界的命运。因此,吾人不可莫不关心。”

由于资料不足,特别是受作者立场的制约,小岛祐马的《中国共产党》一书,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有些论述不符合历史事实

关于西安事变,小岛祐马在书中写道:“有人讲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是周恩来。西安事变开始时,共产党方面的一致意见似乎是处死蒋介石。但因为有了莫斯科的指示才突然变成救命论的。”

关于“皖南事变”,小岛祐马引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新四军进入政府指定的防卫区域之外,并企图在南方立足。因此,国民政府命令新四军解散。然而,新四军非但不服从这一命令,新四军和八路军还依然增加兵力,巧妙地回避战斗,将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向长江以北及日军后方广大地区扩张。”

此外,作者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说成是1920年9月(应为1921年7月);把一二九运动的开始时间说成是12月10日(应为12月9日)等等。

(2)议论不够客观

小岛祐马说,“中国革命,作为民族运动得到了大众的支持。但是,作为社会运动却几乎游离于社会的实情之外。这场运动是由部分职业革命家领导的,作为社会运动,并非是民众自发的运动。少数农民即便参加了革命军,但是大多数农民对运动并不关心。”

作者的论断,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两大任务——反帝反封建

给割裂开来,是有失偏颇的。

然而,小岛祐马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以一位中国思想史学者的独特视角,概述了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长达 28 年的发展历程,实属不易。虽然书中有些史实欠准确,有些议论不够客观,但是就总体而言,他在中共党史研究上还是取得了初步成果的。

(待续)

新书选介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该书根据中央档案馆和其他有关部门收藏的有关周恩来的文献资料、周恩来的台历日记等史料，详细记述了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职务期间的重要业绩、主要思想和作出的重大贡献，从另一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走过的曲折道路。全书共156万字，分上、中、下三卷，1997年6月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薛暮桥回忆录》：本书记录了作者90年的历程和60多年经济理论研究生涯，以回忆录的形式介绍了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专著，重点突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者参加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及理论研究，反映了作者经济思想形成和发展、成熟过程。全书共35.5万字，1996年7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宋任穷回忆录》(续集)：此书记录了从“文化大革命”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26年期间，作者在第七机械工业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的主要经历，并选录了作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讲话21篇。全书27.3万字，1996年8月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作者记录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40余年的所见所闻，以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经历。全书共8个部分，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相当章节反映了毛泽东的晚年时期。全书共15.9万字，1996年9月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邓子恢传》：该书记叙了邓子恢 1896 至 1972 年半个多世纪的历程，重点描述了邓子恢主持中南局、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时，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道路的经历和思想观点。全书 52 万字，1996 年 7 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邓小平传》：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撰著，武市红等译。英文原名为《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该书叙述了 1904—1993 年邓小平的主要历史活动，展示了一位“农民的儿子”到“国家领导人”到“光荣离休”的革命历程。作者的着眼点及书中 2/3 的文字篇幅是对邓小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革命历程进行评述。由于作者是国外人士，其立场观点与国内学术界有不尽一致之处。全书 20.1 万字，1996 年 12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该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亚太所主持的 6 卷本《战后中日关系史丛书》的第二本，较完备地搜集了中日双方拥有的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方面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包括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是研究 1945—1970 年中日关系的重要参考资料。该书 1997 年 5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6—1949)》：薛衔天编。此汇编分为 1917—1924、1925—1932、1933—1945、1946—1949 四卷，收入了大量文献资料，以中苏两国国家关系发展变化为主线，按专题编排，各卷互相衔接，又独立成书。本卷围绕前苏联从东北撤军和交收旅大等重大事件的交涉，反映出二战后新的世界格局下中苏关系的发展去向。该书 1996 年 6 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